

目

•学苑聚焦•

南海珠还 神州同庆

——广东社科界举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学术理论座谈会
..... (5)

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张 磊) 扬眉吐气的
盛大节日(曾牧野) 满怀豪情 信心十足(夏
书章) 伟大的胜利(张江明) 铭记过去,放
眼未来(李 翀) 庆香港回归,颂“一国两制”
(施汉荣) 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光辉范例(刘
嵘) 欢庆香港回归,学好基本法(黎学玲)
香港回归后粤港经济合作新走向(雷 强)
“九七”后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新特点(郑佩
玉) “一国两制”得人心,香港经济全面好转
(郑天祥) 香港回归的历史意义(李龙潜)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把握机遇(梁琼芳) 研
究香港 借鉴香港(冯增俊) 百年的期待(饶
芑子) 文化也要互补共荣(张 绰) 香港回
归与文化共荣(张振金) 回归前后的香港语
言生活(詹伯慧) 从香港即将回归想到的(桂
诗春)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回顾(邓开颂)
香港回归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刘泽生)

“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广东实践”征文

广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章海山(23)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广东社会发展..... 黄明喜(27)

•经济•

论中国商品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毛蕴诗(31)
西方劳资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 周长城(35)
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 陈广汉(39)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1997 年第 5 期

录

企业家:特殊的劳动力及其独特的价值内涵
..... 邓伟根 蒋盛辉(43)

•历史•

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钟少华(46)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陈桐生(52)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 杨仁飞(56)

•文学•

试论新历史小说的比喻结构与动机..... 林 明(62)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樊宝英(67)

•教育•

关于依法建设教育强省的思考..... 朱源星(71)

•书评•

步出书斋..... 徐中玉(75)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
——读《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有感
..... 高齐云 黄椰婴(76)
内容丰富 刻意求新
——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 魏宏运(78)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创造性成果
——评苏新春的《当代中国词汇学》..... 宋永培(80)

•学术动态•

坚定信心 抓住机遇 再上台阶
——广东省理论工作会议综述..... 刘小敏(82)
“审美心理流变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 刘学兰 朱艳卿(84)
本地学界刍谈“广东社会语用建设”..... 王 可(87)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46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 Guangdong Circles of Social Sciences Hold a Symposium for the Coming Return of
Hong Kong's Sovereign Rights to China (5)
- A Thought Outlin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rality in
Guangdong Zhang Haishan(23)
- On the Socialist Conceptions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uang Mingxi(27)
- An Internationalization Trend of Chinese Commodity Market Mao Yunshi(31)
- Basic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Labour – capital Relations in Western Countries
..... Zhou Changcheng(35)
-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Harmoniousness: Choice of Policy
..... Chen Guanghan(39)
- Entrepreneurs as a Special Labour and the Intension of Their Value
..... Deng Weigen and Jiang Shenghui(43)
- An Informal Talk about the History by Oral Account in China Zhong Shaohua(46)
-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View That Sima Qian (about 145AD or 135AD – ?) Study
from Kong Anguo (The West Han Dynasty) as His Master ... Chen Tongsheng(52)
- Sino – English Trade of Tea in Guangzhou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 Yang Renfei(56)
- A Trial Talk about the Metaphor Structures and Motives of the Neo – historicalist Stories
..... Lin Ming(62)
- Aesthetics of Acceptance and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 Fan Baoying(67)
- A Consideration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 to a Strong Province of Education
Depending on Law Zhu Yuanxing(71)
- Walking out of a Study Xu Zhongyu(75)
- A Philosophic Study from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Gao Qiyun and Huang Yeying(76)
- My Impression of 'Sun Zhongshan(1866 – 1925) and Chinese Public Revolution'
..... Wei Hongyun(78)
- A Book Review o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logy' by Su Xinchun
..... Song Yongpei(80)
- The Points from a Meeting on the Theoretical Work in Guangdong Liu Xiaomin(82)
- The Opinion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Change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the
Pattern of Curr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Liu Xuelan and Zhu Yanqing(84)
- A Primary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Pragmatic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 (reported by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Wang Ke(87)

南海珠还 神州同庆

——广东社科界举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学术理论座谈会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时刻,《学术研究》杂志社于1997年4月9日邀请了广东社科界部分专家学者举行了学术理论座谈会,与会者从经济、历史、哲学、文化、语言、教育、法律以及社会学各方面论述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现将部分发言予以刊登,以表庆贺。

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张磊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沧桑世变,被称作“东方之珠”的香港即将回归祖国。追溯和反思它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华儿女无不心潮澎湃:既为它的屈辱的遭际而悲愤,更为1997年7月1日这个光辉的日子而快慰。

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殖民主义者所侵占,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发端。严峻的事实是:古老的中国从中世纪末叶进入近代时期,舞台帷幕的开启既非生产力的飞跃所促使,亦非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导致,而是为英国侵略者发动的肮脏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烁作用迫使近代中国逸出了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原有的封建主义枷锁之外,又增加了殖民主义的新桎梏。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是成为这种畸变的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并且往往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帝国主义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肆无忌惮地欺凌压榨中国,把它推向贫困落后的悲惨境地。因之,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摧毁侵略者在华统治的墙角——封建专制主义,代之以共

和制度;要之,挣破双重镣铐以拯救和发展中国,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必然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任务。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异常昂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爱国主义当然有其共性,但也有着不同的层次。爱国主义,确切地说具有完全意义的爱国主义,应是激情和理性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激情促成了理性,理性升华了激情。对祖国命运的铭心刻骨的关怀,必然体现为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救亡和富强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彼此溶汇,相互激扬。爱国主义由是蕴涵了深广的社会内容,洋溢着时代精神,既是对历史传统的承诺,更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处于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爱国主义,更鲜明地显示了这个特色。

从鸦片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中国的爱国反帝斗争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权力为朽败透顶的清朝政府所控制,主要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而逐步与之结成同盟,充当“列强的鹰犬”,甘当“奴隶总管”的角色。清朝政府的抵抗大抵是消极的,对侵略者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当然,封建地主阶级与侵略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及其代表确在民族危机深重时刻主张抗击外

敌,甚至积极投入了正义的战斗。但是,除掉少数的优秀人物外,他们的爱国主义并未蕴涵着先进的社会思潮,难以完满回应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挑战。清帝国崩溃后,代替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的是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的统治以及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后者与前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之在对外的态度、方针和政策上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能防止民族危机的加深,更谈不上收复丧失的权益。

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还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农民阶级和方才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是反侵略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他们保家卫国的英勇和热情,在相当程度上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但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他们的眼界和观念,使得他们的爱国主义不能与先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相结合,提出和实践科学的民族解放纲领。资产阶级维新派也把这个课题作为主要活动的内容,他们正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使爱国主义与维新思潮和运动相溶汇、相激扬,从爱国走向变革。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赖以凭藉的物质力量,又对帝国主义存在着轻信与幻想,因而未能取得真正的重大成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爱国主义跨出了新步伐,与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潮和革命运动相溶汇、激扬。他们竭力避免中国被奴役的厄运,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奔走呼号。从爱国走向革命,以武装斗争为手段,打倒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军阀统治,以便拯救中国——这就是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对帝国主义既缺乏深切的认识,又从未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政权,以致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未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口号和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之,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不能得到充分反映和取得重大成果。

随着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到来,根本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历史。这主要是由于爱国

主义与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相溶汇、相激扬,即附丽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几经曲折与反复,终于完成了近代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通向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这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爱国主义深化和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致令人民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高扬的爱国主义,结出了前所未有的硕果。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业绩,就是范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永远过去。

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崩溃,使得中国人民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特别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就,从而,为祖国统一和最终消除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完备的条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部分,“一国两制”准则成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为理想的方案,既尊重了历史和现实诸因素,也反映了香港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意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香港回归指日可待,它新的历史篇章即将翻开。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香港,必将对祖国和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爱国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必将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香港问题的妥善解决,即为明证。

扬眉吐气的盛大节日

□曾牧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香港回归,是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盛大节日。我是1985年3月,与我的几位同事应邀第一次出访香港。此次访港,对于

这个被誉为“东方明珠”的国际大都市，获得良好的印象。但是，深夜反思，又不免有“失落感”，因为正是在这块土地上，记载着英国殖民者 1842 年 8 月 29 日强迫我国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的这一段中国人民的屈辱的历史！人家说香港怎么好，但是我心想：这个“东方明珠”还是别人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着“百年奇耻、一朝洗雪”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一愿望，自 1984 年中英两国政府草签“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经过 13 年风风雨雨的中英谈判、较量，终于平稳过渡。香港回归，指日可待。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胜利，我认为首先应归功于祖国的日益强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光辉成就。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昔日的侵略者、殖民主义者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其次，应该归功于世纪伟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构想。

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对着来访的英国首相庄重地宣告：“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回旋余地。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中国在 1997 年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为了解决这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治港的 16 字方针：“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保持繁荣。”

字字千钧，既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原则性，又蕴含着斗争方法灵活性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和平解决香港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而且为今后解决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复杂争端、为人类社会和平进步事业树立了榜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正是“百年奇耻今朝雪，两制丰功举世钦”。（福建书画家语。引自 1997 年 2 月 24 日《广州日报》）

香港回归后其前景如何？我说：还是繁荣的、美好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会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以及具体体现“一国两制”的“香港基本法”等大政方针，排除种种干扰，管治香港，管好香港。许多令人欣喜的信息以及有说服力的数字，预示着香港未来的美好前景。

叶落归根，人心所向。预祝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明天更璀璨！

满怀豪情 信心十足

□夏书章

（中山大学）

香港回归祖国，值得热烈庆祝。这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举世所关注和瞩目的大事。

我们满怀豪情，信心十足，尽情欢呼香港回归。

若问豪情何来，试请抚今思昔，重温一下两度世纪之交的历史：中国是在什么情况下从 19 世纪进入 20 世纪的；再对照当前即将从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的光景和发展势头；怎能不深感今非昔比更精神振奋呢？！香港在强加于我的不平等条约下被侵占，到理直气壮地回归祖国，便是这段历史转折的见证！

信心十足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不仅许多外国观察家们早已肯定港人对未来表示乐观、香港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且事实和统计正不断显示：香港移民回流比例大幅度上升、香港地区大规模的外流人数减少、持外国护照的香港人还在回流，以及投资者坚定地等待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等。总之，对于香港必能平稳过渡和保持繁荣，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者的干扰、阻挠、设置障碍，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破坏。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但是可以断言，此辈的丑恶表演只会在全世

界公众面前大丢其脸而不能得逞。在回归之前和回归之际搞点不可告人和别有用心的小动作的事已经有过,结果如何,有目共睹。回归之后,有《基本法》为依据、作准绳,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相信必将取得预期的成功。

在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同时,我们也热烈庆祝具有时代意义的世界突破性创举、中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诞生。

伟大的胜利

□张江明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

香港回归祖国是一件有世界影响的大事,也是香港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主要表现为三个伟大的胜利。

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由构想变为现实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倡导者。这个构想,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他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这个构想,能为两方以至三方所接受。首先英国能接受。因为香港回归社会主义中国以后,还保持50年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英国的利益不仅没受损失,还可继续发挥英国资本在香港的作用,可以得到更大利益。其次,香港人民能接受,有50年从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不会感到突然改变,能够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瓜熟蒂落。对我国来说,可以继续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旅游、信息中心地位,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构想,能使香港平稳过渡回归祖国,保持繁荣昌盛,使香港在国际上稳定,在经济上稳定,在人心上稳定,有利于加强香港同

我国尤其是广东的经济合作、交流,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因此可以说,这个构想,是个科学构想,是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也是个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构想。

二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包括广东人民和香港人民一贯来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南京条约”和割让香港的。从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开始,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发扬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牺牲,艰苦战斗,打败英军对虎门的进攻。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鼓舞着广东和香港人民不断地进行为收回香港所作的英勇斗争。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他们积极支持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繁荣,是香港人民的依托和靠山。可以说,香港回归祖国,也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是对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对香港的侵占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复杂的斗争,一方面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利用英国的资金、科技和经营管理经验等,加强同英国尤其同香港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同英国的强权政治和仍然霸占香港进行斗争。这种强权政治在某些港督的所作所为中也有所表现。邓小平同志以远大的战略眼光,高超的斗争艺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同英国进行了又团结又斗争,争取香港按照“一国两制”回归祖国。

香港回归祖国是一件大喜事,很值得热烈庆祝。我们对香港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而任务则是艰巨的,还有不少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也可能出现某些干扰。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指导,经过共同努力奋斗,是可以使香港更加繁荣稳定,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铭记过去,放眼未来

□李 翀

(中山大学)

1997年7月1日,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在翘首期望的日子。这一天,被割让了155年的香港将回归祖国。

在等待着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在沉痛地反思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古代史是一部自豪的历史。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曾经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然而在近代,中华民族落后了。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发动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迅速提高。但是,中华民族却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停滞不前。中国的科学技术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中国的农业文明与西方国家的工业文明不可同日而语。当西方列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轰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人才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相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在强权政治的年代,落后就意味着被凌辱。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这段耻辱的历史开始,香港被割让是这段耻辱历史的标志。

在等待着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禁为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并日益强盛而感到振奋。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时候,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孜孜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华民族的现代史是一部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奋起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并走向发展。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和政府,又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繁荣富强之路。80、90年代,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成为了世界上任何强国都不敢轻视的国家。正是中国的强盛,使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不可争议的结局。

在等待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虽然在1997和1999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祖国,但是祖国统一的大业并未完成,海峡两岸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我们要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纲领下,最终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另外,虽然我国总体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但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人均产值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我们要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保持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使中华民族重新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中华民族曾有的荣耀已经过去,现在的落后是事实,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创造中华民族未来的辉煌。

庆香港回归,颂“一国两制”

□施汉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用和平手段和“一国两制”方式收回香港,洗雪了百年民族耻辱,在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征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昔日英帝国主义用炮舰来侵略中国,用鸦片贸易来毒害中国人,把殖民统治强加给香港;今天,中国用和平谈判的方法和极具创意的“一国两制”方式,促使英国统治者不得不“光荣”撤退,结束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换言之,昔日英国殖民者用海盗式的暴力和毒品,在世界的东方制造了一场“历史的错误”;今天中国则用和平和智慧纠正了这一“历史的错误”。这是我们时代的奇迹,是人类文明的可喜进步。同时,这显示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宽阔胸怀和非凡的政治智慧,闪耀着东方文明的光芒!

香港胜利回归的经验证明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一国两制”,是实现我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最佳途径;是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实事求是、大智大勇的产物;是对传统的理论桎梏的突破和令人瞩目的理论创新。“一国两制”的明显特征是,在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中国之内,允许小部分地区继续

实行资本主义。这就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是能够容纳资本主义的;而且,它所容纳的不仅仅是当地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包括与原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绝大部分上层建筑(港澳地区的殖民主义部分除外)。这样,在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个当代的大难题上,就出现了历史性突破,即破除了过分强调“社资两制势不两立、绝对排斥、水火不容”的形而上学偏见,转而运用实事求是、对立统一、和平共处等观点、原则和方式方法,来正确处理两者关系,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国家学说。

香港回归后,将按“一国两制”方针,结束殖民统治,废除英人治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港人真正当家作主的开始,是香港真正民主的开始。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和港人地位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香港从此跨进了历史新纪元。

香港回归后,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这主要是保留原制度中的成功“基因”,让它“遗传”到未来的特别行政区去,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更高水平的繁荣。

运用辩证法 唯物论的光辉范例

□刘 嵘
(中山大学)

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大好事。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语言”、“新办法”、“新事物”。想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伊始,诸多疑虑和非议。到如今,“一国两制”已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称道。人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何以能提出如此重大突破的新理论。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以下凡是打上引号的,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确是如此,“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个光辉范例,突出地表现为:

一、“一国两制”“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一国两制”的“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核心问题,主权问题。这是“历史的实际”所决定的。邓小平在1982年谈判时说:“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国两制”的“两制”,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

基本的实际情况,是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生产力所决定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香港基本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比较发达,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内地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但处在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物质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因此,实行“一国两制”,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人难以接受;英国方面也可能以此为借口,制造混乱,繁荣的香港“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如今,实行“一国两制”,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内地实行社会主义,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变,香港作为自由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使香港保持繁荣发展。邓小平建构的“一国两制”,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因而,成为反映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又得人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二、“一国”的“两制”是相反相成的。那么,“一国”之中搞“两制”,在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岂不是白白送了一小块“地区”给资本主义,有损社会主义吗?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不懂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的关系。

过去,在以革命和战争为主题的时代

特征的国际条件下,往往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看成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常常把“对抗”、“斗争”看作“对立”的唯一“形式”。“左”的典型说法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当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特征的国际条件下,国内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看待“两制”之间的关系呢?邓小平的英明在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不仅看到“两制”间的对立关系,一再提出要保持头脑清醒;而且敏锐地从“两制”的“对立”中,看到统一性,存在着“同一”、“共同”、“一致”的“共同点”;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合作”等的统一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互补”、“互利”、“互荣”的“互相促进”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香港和中国的统一关系: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需要香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仅符合香港人的切身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邓小平说:“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两制”之间是对立的,却是“互利”的;“两制”之间是“相反”的,却是“相成”的。毛泽东在60年前写的《矛盾论》中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明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邓小平正是创造性地运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它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芒。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理论,‘不愧是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光辉范例,运用自如,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欢庆香港回归, 学好基本法

□黎学玲

(中山大学)

香港回归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一国两制”,从小平同志的伟

大构想到国家立法机关的精心规范,开始在当代中国变为现实了。

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和香港的回归,我感受最深的是从法律和事实上洗刷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耻辱。我们祖祖辈辈都清楚,19世纪中叶,英国利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割让了香港和九龙和租借了新界,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法上,武装侵略、武力胁迫,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非法行为,非法行为不产生任何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我国人民从来就不承认这三个非法的、不平等的条约。香港基本法在其序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是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不提那三个条约,强调的是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收回香港。这部法律和香港回归的事实本身就是对三个非法条约的否定与洗刷。

香港回归后,香港能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香港居民的自由和权利有没有保障,一直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只要认真地看一看香港基本法,看一看我们党和国家为香港回归所做的一切,这些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香港基本法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法律基础,是香港居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保障。它把“一国两制”的构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规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生活方式各方面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将“一国两制”化为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具体条文,确认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并且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针,绘制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明细的蓝图。可以预言,明日之香港,在基本法的运行轨道上,依靠我们香港同胞自己的治理,一定会比今日更为美好。

香港基本法不仅规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而且解决了一国两制下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并存的问题。

它是一部跨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法律。基本法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的,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同时它又规定了体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些原则,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回归后,香港和内地在一国两制下是两个不同的司法区域。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仅享有独立的行政管理权、而且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在法院组织、审判程序方面不与内地发生关系,但在司法行政事务方面有许多事情如司法文书送达、传讯证人、查验证物、拘捕犯人、执行判决等等要与内地发生关系,这就需要两地司法机关的互相协助。为此,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这一原则规定,为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司法协助奠定了法律基础。

欢庆香港回归,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也要和香港同胞一样学好基本法,遵守基本法,落实基本法。在基本法保驾护航之下,我们内地人与香港同胞共同迈向新世纪,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香港回归后粤港 经济合作新走向

□雷 强

(中山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经济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辱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粤港的经济合作如同香港与内地其他地区的关系一样,发展为一个国家主权内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不同地区的关系。只不过因为地缘、人缘关系,粤港经济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这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两

个不同地区的关系,可以得到同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使两地经济合作得到广泛和深入的发展,粤港两地经济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与融合;两地合作中需要政府之间协调的重大问题能够顺利进行,消除了过去英国管治香港时期两地协调发展的障碍,使合作可以顺利和有效地进行。在上述前提下,香港回归使粤港两地经济合作出现一些新情况、新走势。

一、粤港在经贸合作上向深领域、新形式发展。例如:(1)内地、广东的企业集团可与香港中资企业合作开拓跨国经营和新路子。’97前后,香港中资企业运用商品经营与资产经营相结合方式,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使自己的实力迅速壮大起来。香港不少中资企业在近几年致力于企业化、多元化、集团化和国际化建设上卓有成效,已组成名实相符的企业集团。通过对境内外、特别是对内地有前途的企业,用收购、兼并方式纳入自己集团范围内整顿、经营,待经营成熟、壮大,选择好时机,分拆上市再壮大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集团自己在境内外已建立起各种生产基地、金融机构、运输公司、销售渠道及国外分批中心,形成生产、运输、销售、融资一条龙发展。这样的企业集团跨出海外,进行跨国经营,就踏实得多。内地大企业集团及有实力的专业外贸公司可以与之合作发展跨国经营或学习它们进行海外经营之道。

香港中资企业在内地进行收购、兼并、分拆上市等业务,可以帮助内地企业明晰产权、重组企业,改善经营,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可以带动国企改革。

(2)当前,香港和广东(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都处在升级换代的转型期,粤港合作发展制造业的樽颈,已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的硬件)为主转向有关政策、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诸因素(投资环境的软件)为主上。要花大气力在这四方面下功夫,才能够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走上升级转型继续发展。

二、要以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高度来

确保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职能。’97后,香港仍实行自由港政策,保留独立关税区的地位,继续保留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经贸组织的单独缔约成员身份开展工作与活动,内地任何系统与机构都不应干预、削弱它的作用,这是关系到香港经济能否独立发展的重大问题,亦关系到如何发挥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经济的桥梁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内地报刊书籍在理论和文字表述上,恐怕也要策略一些,尽可能不要混淆独立关税区与经济特区、内地的区别,以免影响香港在国际上独立关税区的形象与职能。

三、’97以后,在两地政府加强协作下,粤港科技合作开发高新技术与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发展会加快进行。但也要看到这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要通过市场进行,要双方政府大力扶持,发动社会上各部门、各团体,达成共识,齐心协力来进行。

“九七”后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新特点

□郑佩玉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

今年7月1日香港即将回归祖国,这使国人为之扬眉吐气,世人也为之瞩目。自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和香港经济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兴衰与共的相互依存关系。以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为标志,两地经济合作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于香港回归祖国,它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便演进为一个国家主体内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为此,两地经济合作将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1、由于香港主权回归,消除了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障碍,使两地经济合作成为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内地是香港的后盾,香港是内地对外的窗口和桥梁。两地合作直接受到中央

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这是实现两地经济合作健康而广泛深入发展,繁荣两地经济的根本保证。

2、“九七”后香港政局将更加明朗,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保持香港经济自由、法治、公平竞争、廉政、效率和信息灵敏等优势。这将会进一步消除港人的疑虑,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进一步扩大他们在香港的长线投资,外来投资者将会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作为进入内地的桥梁。

3、“九七”后,港人当家作主,享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力。这使港人更加关心内地经济建设,内地广大人民更加关心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两地可以根据繁荣经济的共同需要,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推动两地经济合作的发展。

4、“九七”后,香港仍实行自由港政策,保留独立关税区地位,继续保留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经贸组织的单独缔约成员身份。维护香港这些特殊地位,有利于发挥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经济联系的桥梁作用;有利于两地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

5、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两地经济合作有利于内地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国际经济接轨,使两地经济可以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原则下,在两地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合作的优势。

6、“九七”后,使两地经济合作中需要政府之间协调的重大问题能够顺利进行,清除了英国管治香港时期中,两地协调发展的障碍,从而有利于克服过去经济合作中存在的分割性、分散性、盲目性和缺乏长远利益考虑等不足。

上述经济关系的变化,将使两地结构性的经济合作日趋融合。科技合作将迅速展开;通过科技合作改造两地传统产业将有新的发展;共同合作开拓高科技产业将迈出新的步伐。生产领域合作的发展,为两地贸易关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作为内地对外贸易的中介作用将

走向多元化,其地位进一步提高;香港作为内地融资的基地日益重要,金融领域合作将更加广泛。上述产业的融合发展必然要求信息和交通运输领域合作的配合,并推动旅游业合作的蓬勃发展。因此,两地经济的紧密融合,必将为香港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际贸易、金融、交通运输、信息与旅游中心地位提供坚实的基础。香港作为国际商业服务中心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亦将大大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

“一国两制”得人心, 香港经济全面好转

□郑天祥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

政权交接前夕,人心与经济的波动是不足为奇的,香港的经济在1995年底进入低谷,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全面好转。股市、楼市节节回升,上市公司市值全年上升48%,1996年底,大型住宅楼宇价格,与1995年10月的低位比较,增幅达37%。消费市场随之兴旺,私人消费开支1996年增加4.4%,是继1995年0.8%的增幅后的显著回升。失业率从1995年第四季的3.5%高峰,下跌至1996年第三、四季的2.6%,就业不足率由1995年第四季的2.3%,降至1996年第三、四季的1.4%至1.6%。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从1996年第一季的3.3%,上升到第四季的5.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24490美元的历史高点。前几年被英国挑起“中英争拗”、“居英权”等掀起的“移民潮”每年达五、六万人,现时已转变为“回流潮”,回流人数约占移民数的四成左右,成为推动楼市需求的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迹象是港元存款的大幅增加,1995年为15.3%,1996年为19.5%。这些除了受国际、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外,主要反映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的政策信心增强,这是邓小平英

明构思与决策的成果。

展望1997年,经济增长令人鼓舞,据港府今年3月预测:1997年经济增长将比1996年更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6600美元,增长8.6%;转口贸易增长10%(1996年为8%)、港产品出口几乎零增长(1996年为负增长8%)、进口增长9%(1996年为4%)、私人消费开支增长5.5%。

面对大好经济形势,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历史时刻日益临近,总会使某些人不高兴、不甘心,会抓住一切机会兴风作浪,香港经济也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诸如经济转型乏力、金融业脆弱多风险、地产过热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等都需要港人全力以赴。不过,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已定,人们将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7月1日历史时刻的到来,这一天,标志着中华民族从弱到强、从分裂走向统一,迈出关键的一步。

香港回归的历史意义

□李龙潜

(暨南大学)

1997年7月1日行将来临,香港回归祖国,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奋斗牺牲都是为了祖国统一的大业,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日益强大,才能实现对香港行使主权,维护祖国统一,洗雪国耻。因此,我们热烈欢迎香港回归祖国。

香港回归祖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是香港从此结束了殖民统治时代,揭开了“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的新纪元,香港将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首先实施成功,为解决澳门、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必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且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首先,在中央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引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作为自由港的地位50年不变。这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规定了的。这就为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次,由于香港背靠祖国内地,香港回归后,和内地关系更加密切。内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力量增强,有力地带动和支持了香港经济的发展。祖国内地人口众多,具有广阔的商品市场,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香港来实现。香港作为祖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港,将会更加发达,更加繁荣。其三,香港具有现代国际贸易和金融组织需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水电、通讯服务以及文化科技等,这将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条件,从而吸引着大批资金流入香港,现在香港注册的外资企业、世界大银行和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越来越多,使香港国际化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此外,“港人治港”,即“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1页)于是香港盛衰,深感有责,因而会更自觉地热爱香港,建设香港,更积极地继续发扬港人的勤奋、创业的拼搏精神。因此,香港回归以后,在我国政府和人民与香港特区政府和广大爱国爱港的港人共同努力下,就能克服许多面临的挑战,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让这颗“东方明珠”更加光彩夺目地展现于世界。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把握机遇

□梁琼芳

(广东教育学院)

再有两个多月,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和大家一样,无比自豪和兴奋。

150多年前,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香港主权的丧失,揭开了我国长达100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受尽耻辱

的民族历史。是中华民族众多的志士仁人经历无数艰辛和牺牲,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在这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又经过近50年的艰难曲折,终于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香港主权的回归。回顾历史,深感成就来之不易。我们将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更加珍惜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的回归,正处于世纪之交。内地正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两大转变”,并积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便尽快向实现初步现代化的目标迈进。而香港将在主权回归的转变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只要我们善于把握香港回归祖国这个历史契机,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为我国(包括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失时机地去创造、奋斗,内地和香港的未来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粤港两地唇齿相依,长期以来在地缘和人缘方面关系特别深厚。粤方在劳力、市场、原材料资源等方面腹地优势深厚,港方在资金、管理、技术与国际信息方面优势明显,更应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搞好优势互补,广东方面我们应先打好合作的基础,善于学习香港经验。广东应注意上质量、求效益,避免急于求成、形式主义与华而不实。就以教育与人才方面而论,香港20年前已经实现“普九”,现已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同龄人中大专入学率达25%以上,职业训练和教育的系统健全,各类学校的设施比较完善与均衡发展,较好地融汇中西方教育的先进思想、经验与模式,教学质量较好而发展稳定与均衡。我们要加强研究与学习。又如香港人才资源较好,劳动人口中有专业学历者达13.5%。在金融、保险、证券、商贸、信息、运输、房地产和制造业等方面都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国际型人才队伍和丰富的技术、管理经验。由于改革开放与内地设厂,他们有接近10万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粤工作,带来了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因此,

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搞清自己的需要,学习对方的长处,才能上质量、求效益。

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学习香港的“基本法”,弄清它的精神实质和政策界限,认真贯彻“一国两制”的精神,充分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益。在与香港同胞的合作和交往中,真正做到情况沟通、政策互利、共同发展。这样才有利于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研究香港 借鉴香港

□冯增俊

(华南师范大学)

香港是当今世界的热点之一,香港的巨变受到广泛的关注,被世界称为“香港现象”。在香港主权回归在即这一重大历史时刻,认真研究香港,剖析香港现象,进而推动交流理解,达到借鉴吸收和合作发展,对广东推行现代化是很有意义的。

香港现象的成因复杂,除了一定的国际环境外,最重要的莫过于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办教兴区,用良好的教育系统支撑着并促使经济的不断飞跃。因此,研究香港,必须总结并借鉴香港办教兴区的经验。

研究香港,还因为香港能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的现代转型,促使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依据经济发展需要,逐步建立起以人才需求规划为主导的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香港工业化的每一转型、升级都是由教育铺垫和推动的。因此,必须研究和借鉴香港遵循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推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研究香港,还在于香港把实施教育规划与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教育这两者有效地协调结合起来。规划较好地集中了市场从不同方面传来的信息和要求,并为社会不同阶层参与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机会,也从而有效地注入了政府办教兴区的行政行为,并成汇聚中西办教经验,研讨现代教育策略,及早对未来的跨越性发展作出积极反应的焦点。规划使香港教育配合经济

稳步发展,使民众在参与中提高现代教育意识,并积极投资教育,捐资办教在香港已成一种优良传统。香港除了建立完善、庞大的教育决策体系外,还建立了近百个不同的教育咨询委员会,逾百个教育社团组织,正是这些机构,为科学规划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教育的局面提供了重要条件,并不断营造出现代教育改革热潮。

研究香港,还在于香港作为儒家文化的本土而以生动的实践证明了韦伯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无缘的断言的大谬,展示了教育上中西文化撞击、交融、汇合以至演化创新,从而促使香港从百劫之中兴起并创造出长达3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世界奇迹,被评为世界经济最有发展前景的地区。

研究香港,还在于可以凭借这一窗口审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在中国本土上的具体实践形式,如何借举办教兴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较快的飞跃,又如何借助教育力量消除突变式发展使原发展逻辑中断所造成的震荡和缺乏磨合所引发的失误偏差等;并将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极其有用的经验。

研究香港,更在于香港与广东相邻,文化同根,言语同音,教育上也迫切需要交流和合作。唯有研究,方得了解,才能交流并进而借鉴和合作。

百年的期待

□饶芃子

(暨南大学)

香港自开埠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一直处在历代王朝的设置 of 行政机构管辖之下,而且还是中外交通的海上要道和文化交流的窗口。在明清时代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中,香港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发展较快,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其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使香港落入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在英国统治香港期间,港英当局在学校里推行殖民教育,一些学校不教中文,一些学校被限制授中文课时数,从各个方面淡化中华文化。但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同胞与内地亲人的血缘关系,并未因为他们身受殖民主义统治而割断。香港虽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社会,主体还是华人,他们关心祖国的命运,在中国历次的革命运动中,都有香港同胞参加,在抗日战争期间,香港还成为内地抗日救亡的据点之一。例如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大批内地知识分子南来香港,这些人中有章乃器、郭沫若、萧红、叶灵凤、端木蕻良、范长江、茅盾、戴望舒等,他们同香港文化界爱国人士一道,创办刊物,宣传抗战,使香港成为抗日的宣传基地。中国抗战的烽火,照亮了香港的文化,港岛的文艺也空前繁荣起来。据有关资料统计,①自抗战爆发至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香港的报纸有数十家之多,其中就有不少是从内地来的报人所办或从上海等地迁来的,大多设有文艺副刊。例如由茅盾、叶灵凤先后担任主编的《立报·言林》,由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由萧乾、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由陆浮和夏衍主编的《华商报·灯塔》。文学杂志则有陆丹林主编的《大风》、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茅盾主编的《笔谈》。在1937年至1941年间,南来作家在香港写下了不少作品,其中就包括茅盾的《腐蚀》、萧红的《呼兰河传》、许地山的《铁鱼的鳃》等著名小说,以及戴望舒的诗集《灾难的岁月》等。在1946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期间,也有内地进步作家来到香港,如茅盾、郭沫若、夏衍、邵荃麟、周而复、聂绀弩、袁水拍、杜埃、陈残云等,香港文坛再一次呈现出蓬勃景象。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就更加密切。

收回香港,实现祖国统一,这是亿万炎黄子孙百年的宏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年的7月1日,香港就要回归,中国政府将在这一天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在这块土地上的殖民统治将宣告结束,百年的国耻将在这个时候得到洗雪。这是中国

实现统一大业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热切地期待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①见黄维梁著的《香港文学再探》第6页。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版。

文化也要互补共荣

□张 焯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内地有学者讥评香港是“文化沙漠”,而香港又有人回应:“维多利亚海边已经出现了绿洲。”沙漠也好,绿洲也好,这只是贬与褒的比喻,而比喻却往往是不恰切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香港文化繁荣的一面。香港每日出版的报纸多达76家,按每天的印行量计算,大体上香港每3个人拥有一份报纸;而世界平均数却是每10人一份报纸。香港有各种杂志期刊600多种。祖国内地、台湾、美国的一些报刊都可以在香港发行。香港有200多家出版社,4827家印刷厂,每年出版图书七、八千种。①更值得他们夸耀的是,香港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基地之一。在这个弹丸之地,竟有500多家制片厂,年产电影100多部;这里有170多家电影院,每年放映约450部电影,观众达6000万人次。②香港的电视剧不仅在华人社会的电视台上广泛传播,而且它的录相带远销世界各地。至于通俗音乐、流行歌曲不仅风靡整个香港社会,影响所及,连内地的许多城市也出现了“追星族”。为什么香港的明星能够为广大的华人社会所接受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带有浓郁的东方情调,不像西方的歌星那样疯颠和狂野。这些事实,难道能视而不见吗?

其次,要看到香港文化的特点。香港的通俗文化发达,高雅文化却显得孤掌难鸣。正当我国闭关自守的时候,香港早已华洋杂处,中西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流,比我们早了一百多年。这就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现代意义的都市文学兴起得比较早;二是逐步形成了香港的“本土文化”。深

圳、广州、上海等地都在大力提倡“都市文学”，香港的创作实践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香港的“本土文化”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具有多元混合而成的香港个性。这里面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不足。我们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也应该取其长避其短。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香港文化的缺陷，主要是高层次的哲学、人文科学不发达，纯文学在苦苦挣扎中。而这正是内地文化的长处，完全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进行互补。同样，我们内地文化也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商潮的冲击下，也出现了对时代生活本质深度的淡化和疏离。这都是值得引起警惕的。只要我们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真正搞好了，自然会对香港文化，特别是高雅文化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所以，我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文化，不仅要交流，而且要互补，以达到共同繁荣。这也是港人和内地同胞共同的愿望。

①《香港的文化·周毅之传》，新华出版社出版。

②王江先《文化沙漠长出了商业植物》，《世界知识》1994年第五期。

香港回归与文化共荣

□张振金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黄遵宪在 1890 年到香港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水是尧时日夏时，
衣冠又是汉官仪；
登楼四望真吾土，
不见黄龙上大旗。

诗人在香港所见的一切都是中国的，就是没有见到中国当时的“黄龙”大旗，表现了诗人对于香港被割让的痛苦心情。这也是全体中国人所共有的。今天，香港终将回归了，终于洗去了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耻辱，结束了殖民统治的痛苦历史，“一

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香港回归之后，不但在经济方面更紧密地与内地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香港长期稳定繁荣；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将出现一个多元互补、共存共荣的新格局。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有自己独异的品格和风貌；既有与中国文学整体的认同性，又有其与整体的差异性。就在这认同性与差异性这一点上，通过香港回归之后更密切的沟通、交流与渗透，从而实现多元互补、共存共荣的新格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不管香港与内地有多大的差异，但文化的因素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这就是同种同文。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生活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中华民族文化都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这也是他们在当地发挥智慧、产生力量、创造奇迹的文化源泉。香港回归之后，将在日益加深的文化交流中，各自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去学习和把握中华民族文化，这肯定会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更大的发扬，因为传统文化只有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更充分地显示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第二，多元互补，各擅其长。香港回归，50 年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当然包括文化艺术的基本体制、格局不变。香港文学立足现代生活，有娱乐性、消闲性，能够深入民间，流行市井，在写法、技巧、叙述方式、人物塑造和作家的思维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例如梁凤仪的小说有不少是富有新意的。但香港文学也有不少是缺乏思想的，读了以后，不能给人以美感和启发。内地的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贴近现实，直面生活，思考改革，探索人生，有较强的使命感和忧患感，但不少作品存在简单化、类型化。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景，香港回归之后，两种文化必然会在沟通、交流、渗透中，创造一个各自“扬长避短”、“合而不同”的新文学景观。

第三，共同创造 21 世纪新的华文文学。当今世界文学都面临两个共同的课

题：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学都不可能单独发展，热切地寻求与世界文学对话，趋向于人类共同的文化；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为了自身民族精神的发展，又必然强调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既要追赶世界潮流，又要发扬民族特色。香港回归之后，毫无疑问，会更加有力地促使我们探索这个共同课题，创造一种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新的华文文学。

回归前后的香港语言生活

□詹伯慧

(暨南大学)

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原则下，香港的社会语言生活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语言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应用中将会有什么样的调整？近年来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从事语文工作的人士纷纷发表意见。

我认为：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香港，无疑是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这个多元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而作为她的文化载体的语言，自然也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一方面，香港原居民主要说粤语，来自其他方言区的同胞，一般也都以粤语作为社会公共用语。实际上，粤语在香港已具有“母语”的性质。在港人心目中，母语教育指的就是以粤语为教学手段的教育。另一方面，英语随着殖民统治和西方文化进入香港 100 多年，长期以来，官方政府机构及其下属单位，一些大企业大公司，以及许多文教科卫部门，来往文书及公务交往，又常常使用英语，法律用语更是英语独尊，这就使得英语在香港成为粤语以外的另一社会用语。尽管 100 多年来不断有内地各省人民移入，国外到香港寻求发展的人士也不限于“英语世界”。然而，香港的多元语言生活，却一直保持着以粤语——英语为主要社会用语，其他国家的语言，内地的语言，包括普通话和各种方言，如闽语、客语、吴

语等等，并不因移民来港而使其所操语言能够跻身于社会公共用语的地位。实际上，香港的多元语言社会，基本上就是以粤语为主导的粤语—英语二元语言社会。尽管英语是官方法定的公务语言，其使用频率与应用范围是远远不及粤语的。香港“立法局”或“行政局”开会时，尽管议员们和港府官员都用英语发言，但又以粤语作现场同声传译，以便港人及时了解会议的进行情况。由此可见，香港社会上上下下始终都认同粤语是最具广泛性的香港社会用语，也是最具强势的共同交际工具。

近十多年来，香港人民的语言生活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港人和内地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深感只懂粤语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北上”时难免遇到不少语言上的障碍，因而不少人萌发起学点普通话的念头。80 年代以来，先后几度掀起过学讲普通话的热潮，导致普通话在香港语言社会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最近几年，随着’97 的日渐迫近，香港同胞学习普通话的热情更加升温，终于开始步入“三语”交际的社会，即粤语、英语、普通话三种语言在社会上同时并用。与此同时，在书面语言方面，香港始终是中文和英文并用，在学校教育中，既有使用英文教材为主的英文学校，也有使用中文教材为主的中文学校。这样就构成了“三语两文”的格局。而粤语则仍然处于“三语”中主流的地位，强势的地位。

展望回归祖国以后香港的语言生活情景，可以预见，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原则的指引下，按照《基本法》办事，香港必然仍将维持业已开始形成的“三语两文”格局。粤语作为“母语”，仍将以主导语言的地位广泛应用于各个社会层面，与此同时，由于普通话的日渐普及，在不久的将来，普通话完全有可能上升为仅次于粤语的香港第二公共交际语，而英语则以第三公共应用语的身份继续活跃在某些社会层面上，充分发挥其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作用。粤语—普通话—英语三语并用的局面，能够

体现出“一国两制”理念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色,既有利于香港多元文化的全面发展,也无碍于香港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无疑是顺理成章,能够受到港人欢迎的。

“三语两文”格局的形成,势必促使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面对现实来考虑具有香港特色的语文工作方针,设计、厘定有关使用语言文字的法规,并为粤语、普通话、英语三语的应用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政策,以便“三语”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当前,有必要提倡、组织语文专业人士对香港语言问题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探讨语言应用中的问题、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双语对译中的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母语教育、如何加速推广普通话的问题等等。

从香港即将回归想到的

□桂诗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在期待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不禁想起了建国初期,周总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中的一句话:“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一百多年来为了洗雪民族耻辱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革命先烈也可告慰于九泉之下了。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我当时还站在香港的土地上,心情无比兴奋,觉得殖民地对香港的统治总归要结束了。现在的心情倍加兴奋,是因为终于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

香港是一块美丽的土地,被誉为东方之珠。我曾在那里渡过我的童年,一直把她看作我的第二故乡。但是明珠的光芒掩盖了多少香港同胞的血泪辛酸。我目睹了香港的中国同胞怎样为了香港的繁荣而胼手胝足,但也目睹了他们怎样受到横行霸道的洋人的欺凌。我当时住在九龙的弥敦道,前面看到的是灯红酒绿,车水马龙,

而后街却是妓女和人力车夫聚居之所。我经常看到一些洋水兵喝得醉醺醺,坐在中国男子汉拉的人力车跑到那里去找女人。有些饱受凌辱的人力车夫忍无可忍,群起而反抗,把喝醉的水兵当街打到半死。香港回归祖国,摆脱了殖民地的统治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光彩夺目,香港的中国同胞将站起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香港和祖国大陆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记得日本侵略者在二次大战中占领香港,香港就马上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中国人只能逃回内地以求生息。解放后,有的人以为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坏。我国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有的人以为香港一切都好,盲目向香港看齐。作为来自香港的中国人,我对这两种片面性都感到不舒服。其实香港有好的东西,也有不良的东西,不能照搬。人家赌马,我也赌马,就大可不必。香港有一种所谓英文中学的办学模式,广东也有一些民办中学,标榜用英语来作为教学语言,以此来吸引学生。这也是一种盲目性。倒是香港的反面教材可作为殷鉴。60年代香港实行义务教育,要增加一些学校,结果这些新开的学校都模仿英文中学的办学模式,勉强用英文来教学。因为教师的英语素质不高,用英语授课影响教学质量,学生的各门学科的成绩既上不去,英文也学不好,导致香港的教育质量普遍下降。于是当地教育界人士提出母语教学运动,最近香港教育部门还作出“强制”实行母语教学的决定。倒是内地的一些民办的学校一个劲儿推行“非母语”教学,真是不该学的学了,而该学的却没有学。我就是这些英文中学毕业的,而且教了40年英语,当然赞成加强英语教学。但是这不能以削弱母语为代价,更不能在中学里用英语为教学语言,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

我认为,香港回归后,香港和内地的来往将会更加频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比翼齐飞,将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目跨进21世纪。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回顾

□邓开颂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用武力的手段,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香港岛、九龙半岛和租借“新界”。150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屈服英国的殖民统治,一直渴望恢复行使主权,为香港回归祖国而进行斗争。

一、清朝时期中国官民提出收复香港的主张。1841年1月25日,英军强占香港岛,香港居民立即表示反对英军的侵略行径,“香港绅民以不想为夷,联名控诸抚院”。内地官民也行动起来,林则徐对英军“闻而发指,劝怡良(广东巡抚)实奏”,怡良向道光皇帝揭发琦善“让给土地人民”之罪。1841年冬,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水勇头人林福祥上书两广总督,主张趁英军北上,“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爱国官员裕谦主张招募广东水勇“攻剿香港”,广西巡抚梁章钜也主张“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劳务”。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统治利益,清政府亦主张收复香港。1841年,道光皇帝一再命令靖逆将军奕山说“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须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

二、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提交归还新界提案。1919年1月,帝国主义列强召开了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两项提案,其中第一项就包括废弃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和租借地等七点内容。对新界的归还,英国与会官员顿时紧张起来,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联合反对让出新界。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提案。1921年12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由于其他帝国主义支持英国,使新界问题不了了之。

三、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国民政府提出

收回租借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约。”在这以后几年内,中国国内的反帝爱国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使英国当局坐立不安。香港总督金文泰提出“使新界永久化”的建议,并声明“他们绝对不会交出香港。”

四、二战期间香港问题的重新提出。1942年10月,英美两国同时开始与中国谈判,商讨废除治外法权和订立新约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在其拟定中英新约草案中,要求终止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谈判未果。1944年英美达成协议,战争胜利后,英国远东殖民地仍由英国决定处理办法,国民党政府再次妥协。1945年8月表示:新界问题“今后将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

五、新中国成立后,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收复香港的问题。中国政府多次表示,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行使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从1982年9月开始,中英两国政府经过历时两年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最终在“一国两制”为指导思想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双方达成协议。1984年12月9日下午,中英两国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的现有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标志着中国人民向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

香港回归是一曲 爱国主义的颂歌

□刘泽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

香港的回归,具有凝重的历史背景。中国人民为了香港的回归,为了洗刷这历史的耻辱,与殖民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贯穿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斗争,这种不屈不挠、坚毅不拔的精神,来源于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千百年来对待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一种深厚的思想、行为和感情,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一种高度责任感,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道德标准。不论是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迎接香港回归的新的历史时期,香港同胞都具有光荣的爱国、爱港的历史传统。

19世纪以来香港的割让与“租借”,完全是违背中国人民意志的,是英国殖民政府以武力征服、侵略的结果。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爱国官绅、士兵,与侵略者展开了反侵略、反割让、反租借的英勇斗争。

英占香港后,富于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香港同胞,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与港英当局展开了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等多种形式的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从1844年的反“人头税”罢工斗争、1858年反对英法联军侵华的爱国罢工斗争,到1884年反法爱国罢工运动;从1922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到震惊中外、被誉为世界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都

无不充分展示了香港同胞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香港有其特殊性。香港同胞不仅仅关心自己的前途,也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香港就已成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筹划反清武装起义、舆论宣传、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之一。30—40年代,很多热血青年从这里踏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在香港被赋予新的内涵。5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蓄意与中国为敌,对华实行禁运,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成了新中国反制裁、反封锁、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而改革开放18年来,香港同胞也为祖国内地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精神力量。收回香港,是亿万炎黄子孙的宏愿。和平统一,爱国爱港,迎接回归,共建繁荣,是新时期香港同胞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爱国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一国两制”理论相结合,必将在香港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逐渐成熟。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及时地作出了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定。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到随后关于《基本法》的制订、政制之争、筹建特区和政权交接的过程中,香港同胞也处处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爱港情怀。

爱国主义这一崇高而神圣的思想感情,形成了中华民族坚强的凝聚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香港同胞各阶层、各团体的爱国热情,汇成空前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香港的回归作出难能可贵的重大贡献。香港的回归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广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章海山

国人对广东的道德现状及道德建设的评价贬褒不一,我认为尽管广东在道德的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甚至是严重的,但从总体上看广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新型道德风气正在形成,积累了不少道德建设的经验,道德进步是主流。因此,认真总结广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经验、新情况,探索道德建设的新思路和新对策,不仅使广东的道德建设能够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而且能为全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风气正在形成

对目前的社会道德风气的评价之所以歧见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价方法或视角不同,我们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才有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列宁多次告诫我们,研究社会生活时切勿抓住树木不见森林,把个别社会现象当作社会主流、本质,他提出应当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因此,我们判断目前的道德状况,不能只依据个别的道德事例,或者社会道德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以偏概全作出进步或退步的结论。我们应当把道德放在新时期的现代化总体中,放在整个社会机体的文化发展中加以考察。

对目前道德状况评价歧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社会道德风气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社会道德风气概念,一般来说指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社会道德状况的总和,主要包括职业活动中的职业道德、社会公

共生活中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生活中的家庭道德。因此对社会道德风气评价不能以生活中某一领域的道德状况为依据作出判断,例如不能把社会道德风气片面地理解为就是社会公德,而对社会公德又只看其消极一面,然后作出社会道德风气大滑坡的不正确的结论。社会道德风气另一个重要体现是人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主要表现为人的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人的能动性、自主意识、人生目标等方面,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与否是评价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依据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社会主义新型道德风气正在形成,人的道德素质正在全面提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新的经济伦理观正在逐步形成,并逐步深入到企业和个人行为之中。

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经济伦理的重要性,也逐步建立了一些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企业发展,也提高了企业家和职工的道德素质。其中集中表现在实际经济操作中树立了正确的义利观,很多企业认识到只有在经济活动中“言利取义”或“求利讲义”,并把它升华到自觉遵守的企业伦理和经济活动的规范,企业才能得到

真正的发展。例如广东兴发铝型集团公司抓住质量第一这一经济伦理规范,取得顾客信任求得利,又维护了企业的伦理形象。广东凡成功的企业可以说无不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广东企业还创建了公平、诚信、竞争求共荣等经济伦理规范,经济活动实践一再证明它们的有效性,正广泛地为企业所遵循。

广东的社会道德风气的进步还主要地表现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是经济活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表现在他对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表现为某种职业活动)的态度上,是积极主动和充满活力还是消极被动和磨洋工。广东人在市场经济为他们提供的种种发展机会和施展身手的场所,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高涨,求实进取,开拓创新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付之行动,人们的智力、体力的潜能得到调动和发挥。这些正表明了他们的道德素质提高,而且全国也公认广东人的求实进取的品德。

(二)广东人的自主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发扬,逐步确认自我价值、个性和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得到表现,这是社会道德和人的道德素质进步的根本表现。

广东的商品经济发展得较早,深圳从创办特区之日起就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个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或者作为商品生产、交换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决定这些经济主体必然也必须具备主体意识,确立自己与他人的自由、平等的关系,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广东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自主、自由意识日益觉醒,在经济活动中逐步确认自我的存在、自我价值的存在,而且个性也得到培养,并且这种自主意识和自我价值观念逐渐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也得到确认,自由、平等的关系不仅在经济活动中存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其他人际关系中也逐步发扬,造成了广东的较为宽松、和谐的社会大环境,这点也为国人和外国游客所认同。

(三)对社会、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这是社会道德风气进步和道德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广东的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以广州市为例,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3亿元,1996年为1446亿元,增长了10.3倍。广东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他们都充分肯定广东十多年来的巨变,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正因为有经济的腾飞,有生活的显著提高,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我们民族开始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对广州市的较大规模调查中可以看到这点,广州市对“每个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回答,有69.2%的人赞同和非常赞同。相反,对有些企业生产有损民族尊严和国格的商品非常气愤,据调查有68.0%的人主张对此实行重罚。

(四)人生观正在升华,开拓进取、奉献社会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生观正为多数人认同。

广东的道德进步还表现在人们的人生观正在升华。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广东人积极谋利,以诚实劳动得到酬报,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并不赞同金钱万能,认为君子取财应符合义。据对广州市民的调查,69.8%的市民赞同“金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的观点,只有10.2%的赞同金钱万能的观点。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金钱是财富的象征本身并无善恶,重视金钱本身如果同腐朽人生观结合会导致拜金主义,如果与为社会奉献相结合,则会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所以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奉献社会的高尚人生观的逐渐普及正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五)向社会、他人奉献爱心逐渐蔚然成风,人们的社会公益心得到普遍提高,对改善社会道德风气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有人说广东是个金钱世界,广东人是认钱不认人的“经济动物”,如果没有恶意,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广东人的社会公益心、爱心正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断得到发扬,广东对华东水灾、丽江地震等物质援助在全国名列前茅,很多人慷慨解囊;好军嫂韩素云、新疆流浪儿、湖南卖花女等需要救助的人,广州人都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友好之手;中山市从1988年起举办第一届“慈善万人行”筹款6万元用于公益事业,到1994年就筹到2938万元。对此广东人并无豪言壮语,他们称之为“积德行善”,提倡人人做“爱心不老,慈善为怀”的好人。

(六)广东逐步探索一条适应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子,概括为“虚功实做”,这对于全国的道德建设也是有启迪的。

广东不断总结道德建设经验,逐步探索出“以立为本,虚功实做”的可操作的道德建设路子。在城乡开展建立文明村、小区、户的活动,推广广州南华西街等先进单位的经验;在企业中,开展“爱厂、兴利、求实、进取”的一系列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写的《新三字经》、广州市委宣传部编写的《新增广贤文》等通俗读物,向青少年、成人进行道德教育,取得显著的成效。评价社会道德风气好坏应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即道德教育的方法如何及教育成效如何?广东的做法正在深化和不断完善,对于改善社会道德风气和提高道德素质必有重大的作用。

二、加强道德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加强广东道德建设的总的思路我认为应该是:深刻总结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从实际出发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和发展趋势,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指导,确立到本世纪末和跨世纪(2010年)的道德建设的目标,在人民群众中逐步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道德理想,逐步树立爱国爱省爱市和社会为共的先的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在道德建设实践中,把倡导先进的共产主义道德同广泛性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有机地结合,以抓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着重抓好职业领域、社会公共生活

领域和家庭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建设,把道德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改善社会道德风气,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在实践中,增强可操作性,虚功实做,采取各种形式、措施和手段,务求实效。当前尤其要强化道德制裁的力度,把道德教育与行政、法律等手段适当结合,加强舆论导向作用,形式灵活多样,正确地对社会道德风气进行导向。在道德建设中,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问题,开创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道德建设的新路子。

(一)广东的道德建设要面向21世纪,逐步建立适应新时期的道德体系和规范,为实现下世纪的宏伟发展服务。

到本世纪末,广东力争逐步形成一个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人民的道德素质有显著提高的新格局,首先抓职业道德建设,其中把抓干部职业道德的行政伦理放在重要地位,整顿好党风政风,带动、促进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各行各业依据本职业的特点,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职业道德规范,并相应建立监督机制和制度。对社会公德和家庭道德也制订可操作的道德规范,以及监督机制和制度。加大对社会丑恶现象及不良社会风气的打击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群众的道德素质有显著提高,初步形成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环境。到2010年,能够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健全的道德教育、道德评价的制度、执行机构,社会公德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形成良好有序的社会风气。对群众的道德素质的培养、教育要面向下个世纪广东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培养高道德素质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看到道德素质是有协调各种素质且能激活各种能力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当时具备的各种先进的传媒系统、手段,使道德教育、评价的手段现代化。

(二)进一步把先进性的道德要求和广泛性的道德要求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有成效地开展道德建设。

目前先进性的道德要求是共产主义道德,这是对先进分子的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指导性的道德。我们要大力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树立、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的先进典范。广泛性的道德要求主要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是对广大群众的基本道德要求,要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把“五爱”的道德要求具体化,提出切实可行的道德要求,使它们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为此可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在有反帝革命传统的三元里、虎门等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广广州市举办的青年“成人宣誓仪式”等。如爱人民这一道德规范可以通过使慈善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从献爱心做善事中体现出来。当然爱人民的内容远不止于此,但要使之让群众看得见,能够而且乐意去做。在实际道德建设工作中,把先进性的要求和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工作的艺术,也是一个指导方针。

(三)逐步建立适合广东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经济伦理规范,逐渐完善并且体系化,促进广东的经济全面持续发展。

广东的市场经济发展得较早,不但经济上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规范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也有相当发展,不少企业、个人逐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对它们重要性的认识由不充分到充分认识,已经有一些诸如敬业、公平、惜时、创名牌、竞争共荣等经济伦理规范初步建立,不少企业都自觉遵循它们。我们要认真总结广东经济伦理的发展经验,根据现实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经济伦理的规范,并且对企业、职工等经济主体加强教育,力求建立一个初步的经济伦理体系,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促进广东经济的发展。同时,要教育经济主体能够把自己的经济活动不仅与获利相结合,也要同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与实现广东的现代化结合起来,使群众的经济伦理观升华到振奋中华、实行跨世纪的宏伟目标的崇高境界。

(四)强化道德制裁的力度,扩大道德制裁的手段,建立把道德教育与行政、法律、舆论等相结合的适当的方式,增强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调节作用。

道德对社会生活起着协调作用,它需要依靠一种制裁力来保证这种调节作用,一般来说是靠社会舆论、个人内心信念等。过去我们对此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片面强调道德依靠人的自觉性,甚至认为道德只能靠个人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调节,当前道德的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利于道德建设的。道德制裁中强调人的自觉性,这对于高层次的道德无疑是对的,但是对于一些广泛性的道德方面特别是社会公德方面,有一些道德觉悟低、甚至缺德之人,他们肆意践踏舆论的监督,劝阻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对这些人就应当采用行政、法律手段。因此,在道德的某些领域尤其是涉及社会公共生活和公众利益的领域,应当与行政、法律手段相结合来进行道德制裁。总之,惩恶需要“软”的手段(舆论、良心等)和“硬”的手段(行政、法律等)相结合,才会取得成效,才能扬善,使好人扬眉吐气。实践证明,群众是十分讨厌、憎恨缺德行为,对此惩罚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

(五)吸取国内道德建设的具体操作上的先进经验,制订一些具体措施来强化道德的扬善惩恶的社会职能,使道德建设逐步制度化。

(1)建立常设的具有权威性的实施扬善惩恶的机制,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这种机构可称为“道德委员会”,主要职能是采取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手段扬善,表彰善人善事,它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或建议有关部门惩办恶人恶事。道德委员会可以按不同社会领域设定,例如经济领域可成立经济伦理委员会,家庭领域成立家庭伦理委员会。有的可按专业系统设立,如医疗系统可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国外很多医疗机构均已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医院也在1996年10月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些按专业性性质成立的道德委员会,从道德上制约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广东社会发展

□黄明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利益问题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在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有那么一部分人,无视党纪国法、不顾人格国格而见利忘义、趋利害义,出现了一些有负面影响的问题。价值追求的金钱化、实利化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已经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如何看待利

专业技术的行为及发展方向,使得它们不致危害人类。如克隆羊试验成功之后,国外很多医学伦理委员会宣布禁止克隆人的试验,以免危害人类。

(2)行政伦理立法,在政府中成立道德委员会监督公务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通行以行政伦理立法来规范公务员的政府行为,反腐倡廉取得一定成效。例如,美国政府从1958年首次行政伦理立法,至今已有多部详细的行政伦理法规,1992年颁布《美国行政公务员伦理指导标准》,韩国政府也颁布了《公务员伦理法》。它们的目的是监督、约束公务员的违纪、不道德行为,使政府工作严格按照廉政规定运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的立法机构和监督机构也颁布不少反腐败的法规、规划,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行政伦理立法,建立道德委员会,使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化。

(3)设立道德基金会,从物质上鼓励、奖励为社会、他人做好事的个人或团体,弘扬正气,不让道德高尚的人陷于生活困境,着重奖励社会公共生活中见义勇为、乐于

益问题、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进行正确的利益导向和价值导向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获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社会全面发展再上新台阶,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加以探讨。

—

就观念形态而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义利观则是一个特殊的

助人等高尚行为。

(4)加强社会救助的功能,设立或强化一些社会救助机构,使广大群众在碰到突发事件之后能够及时得到救助。例如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有相关机构立即去救助,让广大群众都知道一旦发生这种事故之后应该向谁报告,因为社会生活中有时发生一些突发事件而个人无力解决的,有时也并非是人们见死不救,而是无法救助,这就要依靠社会救助力量。

(5)强化舆论的监督、导向作用。利用一切现代化传媒手段如电视、电台、报刊、电脑网络等,可以在固定时间、固定栏目以各种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道德评价和导向,充分发挥现代化传媒手段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道德建设也要采用现代化的物质手段来加强。

上述只不过略举道德建设操作的几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可以研究,可以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使广东的道德建设不断前进。

作者章海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冯生

价值观的表现形态。不同时代的阶级(阶层)、集团(团体)及其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乃至民族的价值导向,都由义利观充分而生动地呈现出来。那么,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内容有哪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它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它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

《决议》确认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必然。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无产阶级运动之所以从星火到燎原,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从稚嫩趋于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把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幸福、利益,乃是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即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所以深得人心,就在于它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经得住西方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根基也在于此。从现实的层面审视,牢牢地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百年也不动摇,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一条根本性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代和未来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要实现这一思想,就必须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全力以赴去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决议》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而立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一致的生产关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格局中,建立在公有制这一基础上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在本质上是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仍把价

值和利润作为追求的目标,经济运作仍具价值不断增值和资金不断积累的特征,但公有制的基础决定了其根本目的,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剩余价值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而且赋予了价值、利润和资本积累以新内容,即市场经济价值和利润的生产与资本积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同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达到高度的统一。过去由于“左”的和右的思想、路线的干扰,未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义利观内容的特质,致使人们大多讳言价值和利润,缺乏主体合法利益意识。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每一个环节,都无法离开价值和利润。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个人合法利益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全体劳动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洪流中,按照市场运行的规律和国家的法律,学会在正当竞争中赚取利润的本领,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它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鼓励通过正当途径,各尽其能,按劳取酬,从而改善公民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二

社会主义义利观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它包含了人与人和人与物两大方面的关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蕴含的基本问题,概括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公利和私利问题,二是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问题。

社会主义公利和私利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义利观认为,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不能私欲膨胀,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一味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去干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

益的非法勾当,这种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是为社会主义义利观所坚决摒弃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主张,必须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实际上,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中,包含了个人利益。国家的利益增强了,集体的利益发展了,个人的利益也必然随之得到充实和提高,正可谓“大河涨水小河满”。一言以蔽之,在社会主义义利观看来,公利大于私利,但公利包含私利,不否认正当的个人利益。在合法的前提下,还大张旗鼓地肯定、劝励公民个人的利益追求。

社会主义义利观丰富而复杂,既有广义狭义之分,又有深层浅层之别。考察社会主义义利观不能仅着眼于狭义、浅层的文化表征,而应对其广义、深层的文化本质进行分析。广义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是以利益和道德作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两个支撑点,它包括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以及人生价值等问题,在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正确认识道德理想和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乃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道德理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包含了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内容,但物质利益不是它的全部基础。否定物质利益是道德理想的价值基础与绝对地摒弃物质利益,在逻辑上并不等同。物质利益服从眼见的外在价值规律,道德理想则是用崇高的精神把外在价值规律升华为心中的神圣法则,反过来引导和规范物质利益。也就是说,道德理想的价值并不低于物质利益的价值。倘若单单囿于物质利益去谈论道德理想,单单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去解释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单单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们在大千世界里所做出的人生选择,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一种最崇高的精神

境界、道德理想,其结果只会使人利欲熏心,逐利而终归无利。当然,仅仅局限于道德理想而漠视物质利益,那也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伦理价值体系中,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但是物质利益还是道德理想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使人们在得到正当合法利益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义与利的统一,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统一,大力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树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新的道德风尚。具体言之,就是要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并处理好先富和共富、竞争和协作、效率和公平、自主和监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关系,克服和铲除“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趋利害义”等不道德的思想与行为,从而真正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三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广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双管齐下,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而且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也获得了有口皆碑的可喜业绩。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诚如谢非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省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在价值观上,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权力使用上,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以及‘三乱’等行业不正之风;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坑蒙拐骗、偷税漏税、欺行霸市等现象;在社会秩序社会风尚方面,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以及黄赌毒、封建迷信活动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②因之,笔者仅

结合自己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认识和理
解,并把它作为讨论广东社会发展的一个
视角来发表几点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1、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切入口,加强
全省人民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意识及教育,
把广东建成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特善之
省”。广东毗邻港、澳,建有3个经济特区,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驱省分。就广东的经
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运作及影响而言,
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广东作为全
国拥有经济特区最多的改革开放先行者、
对外开放的南大门、华南经济圈的排头兵,
于情于理都应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
“特善之省”。要使广东成为“特善之省”,
综观方方面面,我认为最佳的切入口就是
社会主义义利观。因此,我省各级领导、各
级部门应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切入口,要
把加强社会主义义利观意识及教育作为一
项迫切的、重要的、必要的工作,使全省人
民尤其是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理解社会
主义义利观的内容、实质、地位以及作用
等;教育他们在求利的过程中,要遵循以义
为利的指导思想,绝不能见利忘义、趋利害
义,只讲竞争而不讲规则,只讲效率而不讲
公平,更不能将市场经济追求的价值与利
润最大化的原则、等价交换的原则推广到
社会生活、精神道德生活中去;认识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深刻意义,进而开辟一条以
社会主义义利观为价值导向的保持广东社
会全面持续发展的道路。

2、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运行机制,促进广东经
济发展和思想道德文化发展同步,把广东
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大省。市场经济带
来了以义利观为核心的价值观问题,但又
增强了解决该问题的能力。而以义利观为
核心的价值观问题的解决,又成为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质言之,从理
论上看,经济建设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彼
此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

依存,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在
实践上两者也是如此。因此,我省应建立
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社会
主义义利观运行机制,如宣传机制、教育机
制、行政机制、法治机制等,使全省各行
各业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取得长足进步,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局
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相得益彰,使广东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大省。

3、以社会主义义利观建设为契机,创
办教科文银行或类似机构,把广东建成教
育、科技、文化强省。自觉树立与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既是一种个
人行为,更应当是一种政府行为,即不但
要受个人综合素质的制约,而且应当受政
府行为的制约。这是当下特别需要引起
重视的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义利观建设与经
济建设一样需要一定的投入,有投入才有
产出,多投入才会有好产出。政府投入
的多寡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义利观机制
的运行和效益,也间接影响到整个思想
道德文化建设,乃至经济发展。为此我
省可视主客观条件,创办教科文银行或
类似机构,切实保障全省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稳步、健康地发展。

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立
足现在,放眼未来,我坚信只要措施得
当,导向正确——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
导向,广东这艘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搏击
的航船终将驶向成功的彼岸,为人民幸
福、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奠定一块强大
的基石。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②《努力开创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1996年11月1日。

作者黄明喜,华南师大中文系博士、讲
师(510631)

责任编辑:冯 生

论中国商品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毛蕴诗

笔者曾在 1994 年北京“2000 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过“市场国际化趋势与外国经济力量进入的冲击”，并指出，随着国外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更多外资在国内越来越多的行业设厂生产，必然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该文发表后两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进一步证实了其中的思想。本文对有关变化趋势及影响作跟踪分析。

一、向更加灵活而积极的涉外投资体制转变

1、90 年代以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实行自由贸易、灵活而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体制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新措施。

在对外贸易体制上，中国自 1986 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一直按基本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要求进行改革。先后在外贸计划、外汇体制、价格管理、国内接收、关税与非关税、农产品、服务贸易、透明度与政策的统一性等十多个方面作了数百项重大承诺。这些承诺已绝大部分提前实施，如人民币汇率并轨等。最近中国又制定了一揽子方案，在关税、非关税约束、服务贸易方面作出让步，进一步开放市场。继前两年大幅度降低关税之后，1996 年 4 月 1 日起，中国进口关税水平进一步降至 23%，已逐步靠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①

在外汇体制方面，经过 1994 年中国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汇率并轨，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对中资企业实行银行结售汇，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取消了贸易项目和与贸易有关的非

贸易经营性支付的汇兑限制，走出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第一步，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从 1996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同时修订发布“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这些改革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与经营环境，使外资企业的合法收益得到法律保障，减少外商投资利润汇出风险，增强其投资信心。②

2、向外商企业开放的整体性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过去不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也逐步开放，如金融、保险、物流、零售、电信、能源、交通，甚至包括一些公共事业，如科教、文化、艺术等领域，从而形成了较为齐全的行业分布。据报道，到 1995 年底，我国共批准了 137 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建立的代表处已达 519 个。③在广州已有 14 家外资保险业设立了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其中美国友邦和东京海上保险已持开展业务的执照。④

在基础设施方面，诸如能源、电力、道路、桥梁建设、开发区成片开发、港口与码头建设等领域，过去外资较少涉足，现在这些领域已成为外资关注的热点。一些外资机构还设立了许多以直接投资于中国基础设施项目为目的的投资基金。基础设施项目和大中型资金技术密集项目的增多，使外商直接投资集约化程度显著提高。1996 年上半年全国批准了 3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55 个，其中 6 个为基础设施项目。⑤

从对外开放的地区政策看，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政府最近在致力于缩小地区差

距、消除贫困的同时,制定了加大西部吸引外资力度的有关政策,包括加大西部省区的开放度,给向西部投资的外商予优惠政策等。

二、外商企业品牌在国内市场上占有较高的份额

市场国际化的趋势和格局可从外商企业品牌(包括进口商品与外商投资企业商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加以研究。从总量上看,进口商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呈明显增加的趋势,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据1995年《统计年鉴》资料计算,上述份额在1985年为13.98%,1990年为13.88%,1992年增至16.67%,1994年为22.19%。

就一些全球性商品而言,国外国内名牌商品,通过采取建立营销网络系统、巨大的广告投入、灵活的定价策略、良好的售后服务等有效的竞争手段,打破了国内地方保护主义所形成的市场分割。在这些行业(主要是价值较高的日用品),统一的市场基本形成,并且外商企业产品已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势头与竞争能力。国家统计局北京中怡康经济咨询公司对全国35个城市100家大型商场的彩电、录像机、组合音响、影碟机、微波炉、电熨斗、洗衣机、冰柜、空调器、电饭煲、摄像机、组合音响等12种家用电器的月度销售跟踪调查表明,国产名牌家电已成为市场主导力量,进口名牌与外商投资企业名牌在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⑥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扩大与国际名牌商品的国内市场进入构成一种互动互促关系。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1、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引入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4》、《经济日报》(1996年8月

5日)的资料表明,按1981—1992年累计数,中国已成为引入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次为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等。若按年度外资流入量分析,中国在1985年、1986年、1989年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位;1992年再居第一,并保持到1995年。1992年,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量的份额由1989年至1991年的10%左右猛增至21.7%,几乎是1991年的2倍,也几乎是居于第二位的对新加坡投资规模的2倍。可见,自1992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外资进入的热点。

2、外商直接投资产权方式的选择——以合资和独资为主。《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表明: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大规模进入的同时,进入方式体现为以下特征:(1)独资经营有明显上升趋势。从投资规模上看,1992年、1994年的外商独资投资经营由1987年、1988年的不足5亿美元,分别上升至156.96亿美元、219.49亿美元,其在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也由12.7%、9.1%分别上升为27%、26.5%。(2)合资经营一直是投资额最大,采用最多的投资方式。80年代以来,合资部分所占整个直接投资的份额,大体保持在50%左右,是所占份额最高的投资方式。(3)合作经营方式投资明显下降。分析表明,合作经营方式投资所占投资总额的份额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但从绝对额看,合作经营增长也很快,由1988年的16.24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203.01亿美元。(4)其他投资方式。在80年代末投资规模较小的阶段,诸如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国际租赁等其他投资方式在外商投资中占有一定地位,1988年其他投资8.94亿美元,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2.97亿美元的16.88%。但是,到1992年该比例降至2.7%,1994年进一步降为0.5%。如统计数据所示,直接投资中合作开发所占比重一直很小,均低于0.5%。

3、投资主体、投资领域更为广泛,在直接投资规模扩张的同时,投资项目的质量也在提高。具体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

业分布、参与企业的特点、投资流出国地区分布的变化以及项目规模的变化等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投资的重点以食品、电子、建材、化工、机械、医药、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投资主体多为港、澳、台等地区的中小企业,因而项目投资平均规模偏小。例如至1990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的157个三资企业合同项目中,香港地区客商有124项,澳门地区客商有3项;港澳客商投资总额为14733.97万美元,占整个开发区外商投资总额的63.76%;157个批准项目中,300万美元以下的122个,占批准项目总额的77.7%。⑦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华投资的母国分布有了很大变化,已逐步扩大到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泰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许多外商企业投资属于大型跨国公司向资金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产业投资。据报道,至目前为止,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已有近200家来华投资。与此相适应,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例如,1993年广东省平均每个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为198万美元;1996年上半年全国平均每个项目协议外资金额为324万美元,比上年同期的247万美元提高了77万美元,可见项目规模增长之快。⑧

4、外商企业由输出商品、输出技术和设备转向输出品牌、投资设厂。举若干行业为例:

(1)啤酒行业。最近几年,中国啤酒市场竞争格局已完全改变、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市场。世界排名前10位的啤酒集团几乎都在华找到合作伙伴,它们主要通过合资、合作、租赁、许可证生产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品牌尚有“青岛”、“燕京”、“珠江”等几家与之抗争。从统计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啤酒市场国际化的格局与日趋激烈的竞争发展趋势。⑨

(2)饮料行业。在饮料市场,除健力宝等少数品牌以外,几乎所有国产名牌均为外商控股。仅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产量

1994年就达110万吨,占中国饮料市场的10.5%,占碳酸饮料总量的37%。⑩

(3)空调器行业。国内空调器生产厂家几年前有100多家,尽管现有80多家停产、转产,但生产能力仍大于市场需求,估计为1000万台/年:600万台/年。外资在空调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正调整市场策略,由出口产品、设备、原材料、半成品转向投资设厂。目前在中国内地设厂的外国空调企业有日本松下等20多家,这些空调企业,除三菱电机外,都由外方控股,都采用外方品牌,年生产能力超过700万台。据比较权威的部门统计,1996年中国空调市场上,洋货、合资产品已占四成。⑪

(4)洗衣机行业。80年代中国洗衣机行业适应市场高涨的需求,急剧扩张,抢先占领了国内市场,仅国内12家名牌企业就已占有市场80%,形成了国产名牌支配市场的局面。尽管国内洗衣机行业已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外资仍积极寻找机会进入。例如,通用电器公司投巨资在天津筹建年产100万台的家电城等。⑫

(5)汽车行业。中国汽车市场至今尚处于开发阶段,目前世界主要汽车公司正通过合资等方式纷纷进入。国内八大轿车厂中已有六家与外方合资。国家规划发展的“三大三小”均形成与外国名牌合资合作的格局。此外,通用、福特、丰田、本田、马自达、五十铃、依维柯、斯泰尔亦都以各种形式参与中国汽车生产。⑬

其它如移动通讯设备、计算机、日用化工产品、电视机、照相机等,外资已占有一定的支配地位或呈大规模进入之势。

四、品牌竞争成为焦点

中国市场国际化的趋势,在竞争日益激烈、日趋表面化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并体现为品牌之间的竞争,随着外资进入,逐渐演化为包括国际名牌在内的国内外著名品牌竞争格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除了不同品牌产品在销售方面的竞争之外,越来

越多的外商采用了购买品牌的交易方式。如上所述,外商企业在与中方合资过程中多采取控股方式,这实际是买断原中方企业的品牌。1996年7月8日《经济日报》报道的“中国名牌竞争卖了多少”一文中反映出在合资过程中,外资对中国若干较为有名的品牌的购买、交易方式与价格。问题是在合资交易中,一些品牌被外商无偿占有;一些品牌的交易价格明显偏低。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外资购买中国名牌后并不使用中国品牌,而采用外方自己的品牌。这实际上是外商减少国内竞争对手的做法。

五、伴随着外资大规模进入的市场零售组织结构急剧变化

从总的格局看,中国百货零售业近年来呈现出国内商场急剧扩展中的外资大规模进入特征。

1、市场零售组织及其结构的急剧变化。近几年来,中国百货零售业在其机构数量与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组织形式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与趋势。几年前,中国百货零售业的组织形式还显得极为单一,主要以传统的综合商店为主。现在经过几年的变革与发展,已形成包括众多超级市场、大型高档商场、货仓式商店(客隆商店,日本称为量贩)、连锁店、多功能购物中心、专卖店等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一些在国外历经多年发展而变得较为普遍的零售组织形式,在中国迅速普及起来。例如,1993年国内第一家货仓式平价商店“广客隆”在广州开业。1994年9月28日,北京第一家货仓式商店“顺开府”开业;其后,自称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仓储式平价商店的北京物美商城开业。其创新的形象与丰厚收入引起示范效应,使许多以“平价”标榜的货仓式商店纷纷开业。1995年11月3日,称之为“亿客隆”的商城在北京开业,此后半年内有“天客隆”、“利客隆”等数家以客隆命名的商场开业,被称为“客隆”现象。其他形式的零售

机构也发展迅速。

2、外资对国内百货零售也大规模进入。自1992年开始允许外资进入零售业领域并在部分城市和经济特区进行中外合资零售业试点以来,现国家已正式批准14家合资企业,总协议投资为30亿美元。例如,世界零售业排名第一的美国沃尔玛公司1996年初在深圳开设的超级市场与货仓式商店已正式营业。1995年12月20日,堪称亚洲第一的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的新世纪商厦正式对外营业,是日,逾百万普通市民涌进了这座位于浦东的现代化商厦。此外,由地方批准的合资企业也有四五十家。它们大多通过与地方拥有百货经营权或进出口权的单位合作,不正式享有进出口权。另据1996年10月10日《羊城晚报》报道,近日由货仓式商场的鼻祖——荷兰SHV控股公司、泰国正大集团与广州佳景商业贸易开发公司合资兴建的广州三元里正大万客隆,提供了规范的货仓式销售模式。在这座建筑面积达4.3万平方米、设有可停放700辆汽车停车场、装修简朴的大型货仓式商场,经营品种达2.5万多个。据悉,万客隆近期还将在广州开设至少三家这样的大型货仓式商场,计划到2000年,在中国扩展到15家。^⑭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八佰伴,它是国外零售业中最早进入中国的公司。八佰伴决定进入中国是在1989年,1991年与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签署合资协议,1992年八佰伴获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合资的零售牌照。该公司董事长和田一夫曾表示,香港“九七”回归中国后,上海和香港都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基地。八佰伴对华投资第一阶段计划将以上海为中心,沿长江西岸的苏州、无锡、南京等城市逐步扩展,同时计划在该地区开发、制造100个八佰伴名牌商品,使中国成为整个八佰伴集团的商品供应和流通中心,并最终形成产、供、销一条龙体系。^⑮

六、结束语

西方劳资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

□ 周长城

尽管中国对外开放时间不长,建立市场机制还在进行中,但发展迅速,近年来,商品市场国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将继续发展,最终形成开放度很高,与国际市场相衔接的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经验,抓紧完善有关开放市场、引进外资的法规、政策,加强监控,更新管理手段。特别是在商品进口、外资进入已有较大规模,并呈现出明显扩大趋势的情况下更应抓紧上述工作,以逐步实行规范化管理。在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保护国内工业,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国有资产管理部、产业管理部门、工商企业管理部、税务、海关等都应有明确的计划,消除涉外经济管理中的漏洞,提高管理水平。

①②③⑤⑥⑩⑫⑮分别参见《经济日报》1995年12月29日;1996年6月21日;1996年8月5日;1996年8月1日;1996年12月31日;1995年10月20日;1996年7月10日;1996年8月15日;1996年7月14日。

④《南方都市报》1996年9月27日。

⑦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⑧参见《广东年鉴》,1994年;《经济日报》1996年8月1日。

⑨有关啤酒行业的资料分别引自:《商信报》1996年1月2日;《广州日报》1995年12月9日;《经济日报》1996年6月20日,1996年7月2日。

⑩空调行业资料,引自1996年8月15日《羊城晚报》;1996年7月11日、1996年9月3日《经济日报》。

⑬汽车行业资料引自1996年6月28日《南方周末》;1996年7月10日《经济日报》。

⑭百货零售业的资料引自1996年5月9日、1996年7月25日、1996年10月22日《经济日报》;1996年9月13日《广州日报》。

作者毛蕴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郑英隆

劳资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劳资关系有两个含义,一是劳资关系是工作场所的工作规则之制度研究;二是认为劳资关系仅仅只是阶级冲突的一个方面,必须定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综合分析之上。对那些强调劳资冲突是不可改变的人而言,阶级不平等、结构以及权力分配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对那些持劳资冲突是工作制度研究的人而言,关于产权结构与控制的研究是偏离主题的。广义的劳资关系认为劳资关系是工作中人们的行为和互动关系。它研究的是个人、群体、组织以及机构是如何做出规范劳资双方雇佣关系的决定的。广义的劳资关系认为劳资关系包括:(1)对工人及其工会的研究、雇主及其雇主协会的研究以及规范劳资双方关系的制度的研究;(2)公共政策和法律框架在影响雇佣条件方面的作用;(3)了解工作环

境中雇主与工会的权力关系,另外,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形成和制约关系的方法也不可忽视。

劳资关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劳资关系有以下特点:(1)劳资关系是工业企业中“雇佣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ship)所产生的一些关系。没有雇主和雇工的参与,就不可能有雇主与雇工的这种关系。正是工业提供了劳资关系产生并存在的土壤;(2)劳资关系强调和解的过程,靠这种和解,参与的双方学会了相互合作与适应的方法与技能;(3)每一种劳资关系系统都形成了管理工厂的规则(rules and regulations),同时通过集体的讨价还价而制定的这些规则在劳动者和资方之间形成了以维护和谐关系为主要目的的工作共同体;(4)政府或者国家借助于法律、规则、协定和奖励制度对劳资关系起着定位导向等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或国家也强调习惯、风俗、传统、政策的执行以及通过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干涉来对劳资关系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劳资关系可定义为:为了改善资方和劳方的关系,为了总体的工业和自然生态关系的改善,关于工业事务管理的各自态度和方法而产生的工业中特别是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一般来讲,影响劳资关系的因素有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劳动法、自愿规则(Voluntary codes)、集体协议、劳动者工会和雇主组织以及社区、种姓(caste)、组合家庭、纲领(creed)、信仰系统等社会制度;工作态度、权力地位系统、动机和劳资关系。经济因素包括:经济组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公司所有制、政府所有制)、劳工的权力和雇主的权力、劳动力的组成与特征和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技术因素包括:生产技术、现代化、理性体制(rationalisation schemes)和资本结构等等。有时,外部因素也影响一个国家的劳资关系,如国际关系、全球冲突、占垄断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国际组织的运作(如ILO)等等。

劳资关系是一个由政府、商界和劳动者组成的“规则网”(web of rules),它受现有的和潜在的

经济制度和技术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劳资关系系统不是突变(caprice)或偏见(prejudice)的结果,劳资关系依赖于产生它的社会。劳资关系不仅仅是工业变化的结果,而是先前社会变迁的综合反映。劳资关系的发展和形成取决于既定社会的主要制度,劳资关系与社会的主要制度一道诞生、一起繁荣和一并消亡。劳资关系的过程与制度力量紧密相关。一个国家的外显和内显的标志通常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其政治、社会哲学与态度的反射。

劳资关系的范围及其结构

劳资关系的概念有广泛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connotation),狭义的劳资关系意味着雇主和雇工的关系限定在劳方与资方的日常管理协会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劳资关系包括一位雇主和一位雇工之间在企业的运作的过程中的关系,也可能明显地表现其超越质量控制、市场营销、价格决定和利益转让的特点。通常所说的劳资关系指狭义的劳资关系。

在劳资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与互动共同决定着劳资关系。就社会因素而言,社会群体(种姓和联合家庭)、社会价值和规范、社会地位(高和低)都影响劳资关系,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产生如“主一仆”、“富人一穷人”这样的关系,但随着工业化的进步,这些社会因素渐渐失去其重要性;在心理方面,由于工作的激烈竞争和工作的单调乏味,动机的有无、疏远、个性认同的丧失,利益和不满等导致沮丧和对工人们社会心理的需要未被满足的抱怨。为了发泄对工人们建立自己组织的不满,雇主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样,如果政府不借助于合适的劳动立法去干涉规范集体关系,“权力关系”的环境就应运而生;经济影响主要来自相对地位、群体间收入悬殊、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如果更高工资的需要不能满足,生活标准不能提高,那么冲突在所难免;政治制度和政府系统也影响劳资关系,在民主体制中,劳工和资方的合作可通过工人参与的机制来实现,相反,在一个专制的系统中,雇主自己的决策孕育着劳资骚乱。

在劳资关系中,有三个子系统,即技术子系

统(technological sub-system)、经济子系统(economic sub-system)和政治子系统(political sub-system)。在技术子系统中,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的劳资关系是相当不同的,技术改进提高了对工人技能的期望,用现代化技术的过程和方法减少手工劳动,工人获得对其工作有了更大的控制,同时也提高了产量。随着技能和教育的上升,工人对回报的期望也逐渐上升。市场和经济限制也影响劳资关系,因为需要劳动者更加熟悉所生产物品的数量和质量。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的获利是不确定的。社会中的权力平衡以权力为中心的形式存在,如工人组织、雇主和政府,权力平衡也影响劳资关系,在起始阶段,工人和雇主都表现为对各自目标的强烈要求,随着管理性权力的放弃,政府在决定劳资关系的发展时起关键性作用。

研究劳资关系的目的及其方法

劳资关系的最基本的目的是在两个参与者——雇工和雇主之间形成健康的良好关系。一个国家的劳资关系的状况与其政治管理的形式紧密相连,一个劳工组织的目的可能会从经济的变为政治的。有些西方学者把劳资关系的目的分为四种,即:一是改革现存的工业管理和政治管理的状况中的工人的经济条件;二是国家控制工业以便规范管理生产和调节劳资关系;三是用使国家本身成为雇主的办法促进本国的工业社会化和国有化;四是授予工业产权于工人。也有些西方学者把劳资关系的目的分为七个方面,即:(1)确保雇工和雇主双方的利益,使双方增进了解;(2)避免劳资冲突,在劳资双方建立和谐的关系对于工业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最为重要的;(3)在全日制雇佣阶段减少较高劳动调整趋势和经常性旷工以提高生产水平;(4)基于劳动合作关系不仅仅是为了享受组织的所得,而且是为了共同作出决定,使参与者的个性被充分认可,同时使其成为文明公民,因此必须建立和维持工业民主;(5)在雇佣双方决定合理的工资水平,改进工人的工作条件,给工人小额的优惠(fringe benefits)以减少罢工、封闭工厂(资本家压制罢工工人的一种手段);(6)使正在亏损的单位和工厂以及生产的产品是公共利益的部门变为

国家控制;(7)通过劳资关系的改善,一个国家努力在社会秩序与一种需要之间的鸿沟上架设一座桥梁,这种社会秩序是不平衡、混乱和调节失控的,这种需要即需要靠控制和规范其社会成员,调节其冲突利益,保护一些同时限制一些,使其逐渐形成一种健康的社会秩序。

研究劳资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有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雇佣关系基本上是和諧的,这种和諧只是偶尔被暂时的冲突所中断的所谓一元论观点;认为冲突是雇佣关系所固有的,但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能靠适当的规则网络去控制的多元论观点;以及把劳资关系视为资本拥有者和控制者与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阶级冲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元论方法(Unitary Approach)其显著的特点是假定每一工作组织都是有着共同目标的整合体。劳资关系被认为是建立在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合作和利益协调基础上的,假定劳资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使组织高效运行,劳资的双方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根据这一观点,劳资双方事实上是同一队伍中的成员,他们是利润、生产、报偿的享受者,是合作伙伴。根据一元论的观点,劳资冲突只是暂时的异常行为,劳资冲突可能是一些好闹事的人所为,也可能是管理不善或沟通渠道不畅所致。一元论认为工会是不受欢迎的组织,工会的存在扰乱了合作的整体结构。一元论者认为工会是在与资方争夺雇员对其的忠诚。持一元论者认为为了取得对工作和对组织的承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显然,一元论者主要强调管理。美国的组织心理学家最早运用一元论分析劳资关系问题,他们试图将组织概念化作为一个合作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资方的工作就是将个别工人的目标和组织的目标整合起来。这些理论家不否认组织内部存在着冲突,但声称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不是由于经济或组织的缘故。他们强调履行承诺的管理战略,改进交流、实行民主领导和职工参与管理,一元论有三种学派:科学管理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和新人际关系学派。

多元论方法(Pluralist Approach),与一元论的观点相反,多元论方法接受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它认为在组织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利益、不同目标的群体,而各种不同的群体为了自己的目

的而相互竞争。一元论只承认一种合法的权力源泉,而多元论则指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忠诚源泉和不同依恋的可能性。对雇工来讲,意味着在其他组织中也有与自己有着相同利益的雇工,靠在不同组织中形成以工会形式形成水平之联系,雇工则形成对其领导的忠诚与认可,而不认同各自组织的资方。在多元论的方法中有两个关键的要素,或称假设,即在主要的谈判群体中,权力是分散的,因此,不可能有一方控制另一方。换句话说讲,竞争的力量限定和检查绝对权力。尽管没有一方能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双方可能取得部分成功。另一关键要素是国家称作一种“公共利益”的公正卫士(impartial guardian),其作用是保护弱者,遏制强者;多元论把劳资冲突看作让步与妥协的过程(Comcession and Compromise),在这种过程中,一套规则遏制权力的滥用且使所有参加者有所收获,多元论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难驾驭的劳资冲突时,现代社会一直维持相对稳定。

另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Marxist Approach),劳资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一点上与多元论方法有相同之处,即认可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固有的和基本的。不过,多元论者认为这种利益冲突不是绝对的,各方至少有某些共同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资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唯一方面,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对抗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冲突的本质。工业是阶级冲突的场所,财产拥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这便是劳资关系中种种现象的基础。而且,冲突并不只是一种工业现象,它是渗透于整个社会的阶级冲突的一种反映。发生在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源者手中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集中的标志。与多元论方法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者认为劳资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总体中的一种要素,而多元论者认为劳资冲突是源于雇佣结构之中。由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多元论者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利益的对抗产生于社会层面,而且蕴藏于雇佣关系产生的生产结构之中。

马克思主义对多元论者过于强调冲突规则

的制定持批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多元论者过于强调冲突的遏制和控制,从而使其注意力忽略了争论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基本问题。多元论者一味地强调雇主、工会和其它机构是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处理过程是如何进行并如何维护工业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关注权力问题,他们认为社会生活中以及工厂里权力的不平衡是劳资关系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者对多元论者所持的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观点不赞成,而认为政府在保护掌权者的利益和维护社会主要结构特征方面充当重要角色,这种社会的主要结构对于权力、地位、金钱和资源的控制者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注意力在于发展能控制冲突和促进社会稳定性的制度化的机构。

参考文献

- [1] Mills, D. Q. (1985). Labor - management relations (fourth ed.).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 [2] Deery, S. (1986). 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2nd ed.). Sydney: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 [3] Fossum, J. A. (1989). Labor relations: development, structure, process (fourth ed.). Boston: Irwin.
- [4] Frenkel S., & Harrod J. (ED), (1995). Industrialization & labor relations: comtemporary research in seven counties. Ithaca: ILR Press.
- [5] Carrell, M. R. & Heavrin. (1991).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labor relations: case, practice, and law. New York: Macmillan.
- [6] Fisher, C. (1983). Innovation and 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aspects of the arbitral experience 1945 - 1980. Canberra: Croom Helm.
- [7] Wolters, R. S. & Holley, W. H. (1988). Labor relations: an experiential and case approach. New York: The Dryden Press.

作者周长城,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430074)

责任编辑:谭湛明

生态环境恶化日益成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并困扰它们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着重于长期因素分析,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中,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相关要素,以及如何为通过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倒 U 相关性。回顾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面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的变动趋势。在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开始之前,生态环境保持着自然与原始状态,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开始时,环境污染出现,并且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控制,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改善。下图中的曲线表明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NP 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目前正处在倒 U 曲线的上升阶段,而一些发达国家从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开始进入倒 U 曲线的后半部分。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三个阶段。以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性为依据,我们可以将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传统经济时代、经济转型时期和现代经济时代。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经历了三个时期:原始和自然生态环境时期、原始和自然生态环境失衡与调整时期和在更高层次上向原始和自然环境回归时期。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过程开始而出现的。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得到控制,并逐渐改善。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倒 U 曲线前半部分的变化表现出时间短和上升快的特点。

决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相关性的要素

经济增长通过人口变动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启动与加快,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标志和基础。它必然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加速

增长。从而打破传统社会中人口与生态环境的比例关系,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

经济增长通过投入和产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的生产活动通过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联。从投入方面看,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除了劳动、资本、管理之外,还有自然资源。经济增长通过自然资源消耗数量与方式影响生态环

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

□陈广汉

境。从产出方面看,经济增长除了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之外,还会排放出影响生态环境的废弃物。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看,传统农业都能比较好地同生态环境建立起平衡和协调的关系。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以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为特点。这种以工业为主体的迅速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资本稀缺、管理经验不足、劳动力的素质低,经济增长往往是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的粗放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依赖自然资源消耗来维持,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是依靠资源密集产业发展启动经济增长,那么发达国家则是依靠能源密集性产业支撑着经济大厦,而这些能源的较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从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生态环境演变的总体趋势中得到了反映。

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快速城市化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结果。但是,过快的城市化会对现有基础设施、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医疗和教育设施造成巨大压力,导致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因此,城市人口规模从迅速扩张到基本稳定,最后出现的分散化趋势,与城市生态环境变化具有一致性。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欲望与需求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欲望产生需求,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需求的效用函数的变化同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具有内在联系。在传统经济时代,人类生存的需求比较单一,粮食占主要地位,农业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欲望和需求结构朝着多样化发展,从而推动工业发展,制造品开始进入消费领域。从客观上看,工业发展与农业相比对生态环境形成的压

力更大。从农产品为主的消耗结构向工业品需求的转变,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活水平的数量扩张逐渐向质量改进方向变化,生态环境作为能够体现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和消费品(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类)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消费者对能够体现生态环境质量的各类产品的效用评价比其它商品会更高。消费欲望和需求的这种变化是推动生态环境改善的基本动力,它会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多种政策和手段,增加良好生态环境的供给。由于生态环境能比其他消费品给消费者提供更大效用,因此在生态环境中的投资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同时,企业和政府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为这种投资的增加创造了条件。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环境的污染,对地球生物圈产生了巨大压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可能使生态环境遭到损害,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多种因素的变动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与增长相伴随的多种因素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方向变化,使生态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倒U型态势。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政策选择

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衡量发展水平的尺度。在50年代,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与落后。因此,追求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它们的首选目标,当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速度成功超过第一个10年发展的预期目标而跨入70年代时,面临的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失业和贫困问题,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开始不仅仅关心 GNP 的增长,而且关心它的构成和分配。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又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思考人类的自然资源是否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极限,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个经济学的古老话题又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从战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不断调整可以看到,从开始他们就缺乏对经济发展目标的总体思考,从而使发展战略和政策处于顾此失彼的被动调整状态。这是经济发展理论与决策的失误。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不能不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在估算经济增长速度时,除了计算物质资本的成本外还要核算自然资本损耗的成本,将自然资源的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中,要建立一套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使生态环境的质量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于人类来讲,清洁的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其它消费品一样重要。优良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效用可以为社会和每个成员所分享,而高质量的消费品只有那些能为它支付货币的人才能获得,因此,从生态环境改善利益的分享来看,它更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我国,政府不仅应该将生态环境作为考核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内容,而且可以设立国家奖,对环境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它不仅是一种物质鼓励,更重要的是一种荣誉,可以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控制人口增长和有效利用人力资源,减轻生态环境的压力。建国以来,由于我们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使我国在本来较大的人口基数上,在短短 40 年间人口增长了 3 倍。近十多年来,我国人口控制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但巨大人口规模对就业、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还会严峻地显现出来。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出生率控制仍然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些

人口过渡处于第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低下的生活水平和动荡的社会秩序,使它们的经济难以发展,生态环境恶化。在人口问题上,国际上存在着发展主义和计划主义之争,前者认为与人口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经济发展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得到解决。后者认为过快的人口增长是贫穷的原因,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必须控制人口。事实上,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是相辅相承的。人口的控制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鼓励节约资源型的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粗放型经济增长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的过渡。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重点放在资本积累、技术变化、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以及收入分配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与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相比,它的最大悲哀就是忽视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哈罗德—多马模式告诉我们 GNP 的增长率主要取决于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储蓄率。新古典主义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分析了资本和利润率的变动引起劳动与资本的互相替代,对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关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制约的担忧在上述理论中消失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使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大大缓解;另一方面经济学忽视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厂商的生产成本只包括了个人成本,没有计算社会成本。在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一致,而且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也相等。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在资源无限供给的假定下,研究决定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实现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增长的转变。而发达国家要逐步改变能源密集型经济增长的趋势。这需要有劳动和资本替代自然资源

的技术创新,也需要建立起能反映生态环境价值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

推动区域经济和城乡平衡发展。城市人口爆炸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则是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新古典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价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使区域经济发展从非均衡走向均衡。至今为止,这一理论并没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得到证实。在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机会的不均等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规模失去控制,同时也导致了农村经济衰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过快城市化所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危机,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发展农村经济和推动地区平衡发展的责任。

建立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由人类设计和制定的,它的重要功能是人类交换(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激励机制。因此,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提供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原因,单个企业不可能承担它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的全部成本,同时它也不能获得自己改善环境进行投资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误会使企业宁愿生产更多的环境污染而不愿意投资改善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使传统经济分析方法失灵。克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消除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性是建立能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关键。政府可以通过责、权、利的界定,使外部问题内部化;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和环境改善的收益引入企业总成本和总收益的方法来提高企业改善环境的推动力。这需要建立反映生态环境状态的价格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法规,防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环境

污染,建立生态破坏限期治理制度。制定生态恢复治理检验或验收标准,坚决贯彻开发利用与保护环境并重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利用谁补偿的方针,将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结论

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恶化的倒U型变动趋势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在经济发展初期,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种种动态因素,如人口、投入结构、城市化趋势、人类欲望与需求以及技术变化都会使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一种压力,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这些动态因素的变化又会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是生态环境变动的这种趋势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上,政府约束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改善起决定作用。环境保护机制从政府约束为主向市场约束为主转变是社会环境意识提高、经济发展和制度规范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来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加快。倒U曲线的前半部分迅速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成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生态保护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加上国内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调整,使倒U曲线的转折点提前到来。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初始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差异,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在总体趋势相似的情况下,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作者陈广汉,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企业家：特殊的劳动力及其独特的价值内涵

□邓伟根 蒋盛辉

一、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

在我们探讨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之前，首先要研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劳动力商品，而研讨此问题的关键又在于研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经济条件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具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经济条件。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经济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时，曾指出：“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①也就是说，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客观经济条件即：（1）劳动者有人身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力；（2）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计。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具备了上述两个客观经济条件，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这可以根据马克思的原理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客观经济条件：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即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这一条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特权与个性给予承认，这一点无论在我国法律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得到了承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

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②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个人的天然特权，就是承认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其二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计，这一条实际上是指劳动者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其它的谋生手段，这一点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一无所有，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间接所有者，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者所处的地位不同。间接地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享有部分权力，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则不是主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不能直接占有和支配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生产资料，不能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直接结合，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点与马克思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第二个客观经济条件是一致的。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仍处在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商品。例如，个体劳动者运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经营，其劳动力就不是商品。在真正由劳动者提供资金和生产资料而形成的集体经济中，劳动者自然就业、共同劳动、按劳动和资金分配劳动成果，他们的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实际上，劳动力商品体现着一种雇佣或聘用的经济关系，只要劳动力不是处在这种关系中，就

不成为商品。

企业家作为众多劳动力中的一种,在没有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时,其劳动力无疑也是一种商品。从形式上看,企业家与一般劳动力相同,都要直接与资产所有者签订、履行劳动合同,但是企业家的劳动是以管理企业为特点的,他所拥有的并不是一般劳动力对某种具体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操作权,而是对企业全部经济资源(包括一般劳动力)的调配使用权,他们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因而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自然其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商品。

二、企业家的特殊价值内涵

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当然具有与一般劳动力不同的价值内涵。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才能确定企业家的特殊价值呢?这是我们在培育和造就企业家阶层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大大地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则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阻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具体来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主要由下列三个部分组成:(1)维持劳动者自身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于再生产他的劳动力;(2)劳动者养活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3)劳动者接受必要的教育和训练所支付的费用,用以培养出适合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此外,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还受劳动者的生理条件以及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的影响。

我们说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其特殊的地方并不是指他能够创造出比他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而是指他能创造出比一般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要大得多的价值。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其价

值内涵要比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内涵大得多,具体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一般价值(基本价值)、风险价值和贡献价值。一般价值相当于企业家作为一般劳动力时的价值。风险价值是指企业家敢冒风险而得到的报酬,一般而言,其风险价值与其冒的风险大小成正比。根据约瑟夫·熊彼特的定义,经营者只有在从事创新活动时才能成为企业家,而企业家在从事创新活动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根据日本学者上野明的分析,企业家的冒险创新活动,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1)标志攻势经营的先行投资。其标志就是看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这两项先行投资的费用。(2)经营者在企业成长关键时刻的决断。(3)不满足于现状的不断进取精神。始终抱有勇于进取,向更高目标挺进的雄心壮志。这是企业规模即使扩大而企业活力丝毫不减的根本所在。(4)促进公司内部的竞争。企业内部缺乏竞争,领导者很难掌握优先发展何种产品,确定哪个部门对全公司的收益作出贡献,有朝一日企业活力也会消失殆尽。当然,企业家敢冒风险的创新活动并不是盲目的,正如美国学者彼得·杜拉克所说:“企业家的革新,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找‘风险’,而是一种有目的、有系统的活动,是刻苦的追求与科学的变化,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努力从中捕捉革新的机会”。③贡献价值是指企业家对企业所做贡献而获得的报酬,其大小与其经营成果成正比。

在企业家价值内涵的三个组成部分中,一般价值是基本固定的,其大小可根据企业家作为一般劳动力使用时的价值来确定,而风险价值与贡献价值则是浮动的,也是企业家价值区别于一般劳动力价值的独特之处。

三、企业家的社会经济功能及其作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是政府计划的一个具体执行单位,企业本身没有经营自主权。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物资由国家统一供给,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

政,亏损也由国家承担,企业的生产活动与市场需求完全脱节。这时企业领导者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具体执行国家计划,并按国家计划的要求来组织企业生产,没有独立运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功能。当然这时的企业领导者也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已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国家经济的运行方式将逐步由以政府行为为主体向以企业和个人行为为主体转变;企业经营的决策风险将逐步从由政府和社会承担向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转变;企业的经营战略逐步由依赖政府向自我发展型转变。正是由于这种转变,才使得企业家应运而生。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为了使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经营管理业务知识又敢于冒险、善于经营、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现代企业家来经营管理企业。这时,企业家完全享有对企业法人财产的经营自主权,不再是国家计划的具体执行者,其社会经济功能是通过对企业资产的运营活动以实现资产增值的目的,这也是市场经济赋予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决策者、组织者与指挥者,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家起着联结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政府制订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等都是通过企业家去实施的,而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也是通过企业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这些反映上来的要求又是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依据。这样便通过企业家把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政府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紧密联结在一起。

2、企业家是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内在驱动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诚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拥有明确的法人财产权,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和独立的法人实体。但如果离开了企业家,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也依然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因此,企业家是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内在驱动力。

3、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角,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企业家是企业的领导者,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企业家的主导作用是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据有关资料测算表明,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每增加1%,生产增加0.2%;工业劳动力每增加1%,生产增加0.75%;而每增加1%训练有素、懂得科学管理的管理者,生产则增加1.8%。^④由此可见,企业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何等之大。

4、企业家起着合理组织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企业家拥有对企业各种经济资源的经营使用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职能来合理组织企业内部的各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

③(美)杜拉克,《企业家与革新》,转引自(日)上野明,《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上海翻译出版公司,第14页。

④崔鹤同,《培养和造就宏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决策借鉴》,1995年第4期。

作者邓伟根,博士,蒋盛辉,硕士,广东
顺德市北滘镇委(528036)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钟少华

一、口述史学义界

人类原始发展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语言。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这既与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

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

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学家鲁迅也曾写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费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身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⑧而史学家翦伯赞则说得更明白：“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⑨翦教授把政府文告和民间言语绝对地对立，这恐怕过分了一点，关键还是具体的真实性。所以笔者比较注意姜蕴刚教授的一段话：

“古史固然是由于传说得来，便是现代史乃至新闻材料，也都传说的。司马迁的最好史料是‘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淮阴侯列传赞）等，固是传说；而现在成都正在闹米荒问题，米荒的真正的内容怎么样，也多半是传说的，因为政府堂堂皇皇的布告着说米荒是由于四川人民之囤积不售，而人民则又说是由于政府中人之收买操纵。两者都由于传说，所以甚为含混。要是将来有人作史而根据这些传说，甚至以为实录的无过于当日报纸登载的新闻消息，则就无法明了这段史迹了。……因此若真要明了真相，恐怕还是如何去采择传说了。传说毕竟还是历史的动力，历

史的存在还是依存于传说。”^⑩

今天的时代向历史学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求解决大量过去没有探索过的问题；要求面对现实而追索过去根由；要求更充分地体现各种人群的特征；要求内容更翔实、更生动、更能从多方面说明或探索历史因素；要求不单有固定的、死的史料，还应当寻找活的、可能不稳定的、但远非死资料所能代替的史料；要求历史学者不单会在书房中寻找书本里的言外之音，还应该会田野作业，以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作武装，从书本以外抢救新史料；还要求历史学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作更密切的有机联系，依靠现代科学工具，同时又抵制外界非学术性的利诱。等等。总之，社会和读者都向历史学者提出更科学、更迫切又更基本的要求。

现实明摆着与要求的距离相当远，中国史学相当部分落在历史的后面太远了。就以近年十分热门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来说，大家很容易就看到：介绍外国文化理论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多，（并且多是在50年前就介绍过的概念）；而实实在在描述中国文化实况的书则太少，在文化理论方面则还没有达到50年前黄文山教授的水准。为什么一些浅薄的抄袭反能够哗众取宠？原因之一，正是认真地收集第一手中国文化状态，并能够客观地描述出来的基本工作很少人去做。人人都知道了解文化基本状态的重要性，人人都希望别人去提供调查，但很少人想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大缺陷，自己去下决心在史学上搞田野作业罢了。

三、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时代对当代史学者提出新的迫切的要求，当代世界上许多历史工作者早已注意到了，并且纷纷在各自领域内探索新方法。口述历史方法就是其中一种经过验证的好方法，并且早已有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美国，早在1938年，芮文斯（A. Nevins）教授就提出了倡议并进行了研究，终于在1948年录音机商品化并有了雄厚财力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收集与研究。到70年

代形成高峰,有研究和收集口述史料的机构 300 多个,有口述史协会(OHA),协会的刊物为《口述史评论》,协会还出版《口述史书目》以及大量口述史书,其中包括有关口述史学方法及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涉及许多方面的口述史料。在欧洲各国也有相似的团体和成果,口述史学成为历史学界承认的一门新分支。日本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使用在民俗学、社会学、生活史、女性史、技艺史等方面特别多,以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早期工作为代表,其代表作为《远野物语》(明治 42 年)。70 年代日本出版了许多口述史书,例如:《被差别部落的传承和生活—信州的部落·古老闻书》,柴田道子著;《证言米骚动》,北日本新闻社编;《新编我的昭和史》;《三十五年目的被爆者》;《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野添宪治著;《闻书—丹波的庶民史》,奥谷松治著;《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山本茂实著;《民众的座》,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海女》,濑川清子著;《生女的痛哭》,广田知子著;《日本的放浪艺》,小泽昭一著;《我是盲女》,大山真人著;等等。另外在 1993 年 9 月 3 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纸上,介绍了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 10 个人的录音带,其中有町野武马大佐在 1961 年口述的“张作霖爆死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在 1963 年口述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在 1981 年讲的“日中关系”等。由新加坡政府管理的新加坡口述历史馆,也工作几十年了,其中有工作者 20 多人,访问了 1 千多人,收藏有录音带 1 万多盒,出版有《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1984 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1989 年)、《口述历史手册》(1988 年)等。

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 1957 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他对口述历史的见解是:“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

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①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可惜不能作为定义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领导时,接受了胡适先生和唐教授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②此计划从 1959 年 12 月开始执行,至 1972 年 9 月,由沈云龙先生负责,访问过 70 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 1982 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形式发表,到目前已有 30 多本出版。该所于 1984 年 1 月 26 日又成立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 160 人以上。他们还在 1989 年 10 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企图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他们的近况由于联系中断,难以详述。总之,在台湾的口述史学,由于近代史所的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 30 多年工作经验,收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相比之下,我们内地虽有了一些零星的口述历史整理,但尚无系统的工作计划和措施;虽有了一些热心的口述工作者,但缺少一个牵头的学术机构来安排;而更主要的是口述史工作经费匮乏。(据说在美国,整理完成一盒录音带的平均费用是 100 至 500 美元)

开发口述史学,是对死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以下,而且是档案中的一种。当前更因欠缺过多,而形成“抢救”活史料问题!回忆 60 年代初始,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呼吁老人们写下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情,

遂产生大量回忆录,以《文史资料选辑》名称发表了 100 余部。限于当时情况,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书写过程,没有历史工作者参加,而且主题内容有限定。到现在,了解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老人多已风烛残年,此时不“抢”,更待何时?笔者就经历过,两天前的约会,因老人去世而作罢。而且,许多老人愿意把经历介绍给年青一代,其中不少人是不愿意动笔而愿意讲述。那么,只有依靠科技设备和访问者合作,才可能获得活史料。还要注意一点,现在有一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 1985 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本来口述文学在中国是相当发达的,但它与口述史学范畴不同,历史的真假在史学中是不容混淆的,假得再合理也不能够算是真的。

总之,中国口述史学的展开和研究,已经急迫地提到日程上了。我们应该承担时代的责任,不能再假装视而不见,更不能等待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完成此项任务。

笔者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 80 岁至 100 岁老人近 200 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经费自筹,设备是朋友赠送。今年完成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起因是 1993 年笔者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间理解之困难。回国即向早年留日前辈 18 人请教,将其中 14 人的录音整理出来成为此书。显然,笔者的访问计划与前述台湾近史所的计划有一点较大的不同,即不是以人物生平为中心,而是以研究主题为中心,请不同的人来谈同一个有意义的主题。笔者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是经费严重短缺而逼出来的办法,不过这办法颇有特色,很适用。

四、口述史学的基本方法

口述史学的方法是一种生动的综合方法。对于每一位有志者来说,需要在基本训练和认识观念方面进行综合培训;在准备、进行、整理、著书等各个阶段,需要掌握不同的条件与因素,以对应不同的难点;尤

其在与受访者进行录音谈话时,文化修养和聪明的头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惊人的效果;还有,对工具的运用也有多种技巧。可以说,当你决定尝试用口述方法时,你已经开始冲破传统方法的拘束,已经在进行严肃的分析和勇敢的探索,值得在笔记中记下来了。笔者曾经听某人说过:“中国口述历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这是一种遁词,是懒汉的时间表。笔者也曾经见人写过,说是搞口述史学的人,要具备五大条件:(1)基本的史学素养。(2)足够的近代史知识。(3)写真传神的大手笔。(4)绣花针的细密功夫。(5)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这几条可是够吓人的,笔者要是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看见,恐怕就会不敢干口述历史工作了。倒是如果将时间先后反过来看,即通过搞口述史,在这五方面都会有长足进步,我是愿意自我作证的。

口述历史工作者除了有明确的思想性以外,还要运用复杂又细致的组织技巧。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要从众多因素的配合中争取得到最佳收获,绝非容易成功之事情。组织者必须能够判断口述史主题和访问范围,还要进行筹集资金及管理工作。例如一个有意义的、有可读性的、可操作性的主题,也并不是一想就来的。组织者在主题范围内,要安排对访问对象的了解和制订访问计划,还需要申请和控制适度经费,约集访问者,配备设备,对访问的事前训练,访问中的资料管理,对录音的文字加工等一系列工作,组织者都必须照料到,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严重影响工作进程,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安排;访问者需要热情又实在,有训练的头脑及配备现代工具,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要准备吃苦头;受访者一般年龄偏大,事情较多,干扰因素也偏多,所以应该做好谈话的精神准备。又由于受访者回顾经历时,往往会受到事后经历的影响,使原来事情增加了变形的色彩。因此,当受访者与之谈话时,访问者警惕不要被动陷入受访者的变形观念中,但也不能够与受访者形成语言上的大冲突,这无疑是对访

问者的更高要求,因为他是谈话的主导者;整理者及研究者在访问结束之后,利用宝贵的录音和相片,配合文字史料及遗物,将录音的声音提炼升华成口述文字稿,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要将重复多余的言语删去,要处理好谈话中的矛盾不妥处,要处理好谈话与文字史料间不一致的地方,既要保留受访者谈话特色,又要文字通顺;最后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再经受访者审查签名同意,就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以上各个环节,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合适的方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这些相关人士如想圆满成功,最重要的是密切合作和严格的工作程序,因为调动不同资历的老人为一个访问主题而向你“口吐真言”,这本身就说明工作的难度和乐趣,其间很大程度是依靠访问者的准备和现场的表现。

五、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困难

经过70年代国际上口述史学的发展高峰后,目前国际口述史学是进入轨道的平静,他们抱怨的是录音太多,多到了难以整理出其中有用的部分。

笔者在1989年曾著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⑬呼吁将中国口述史学安排进国家研究计划中,并希望至少有一个学术机构出面来承担。但是很遗憾没有得到回应。1995年笔者又写了两个申请报告,也是如石沉大海。

国内学术界中一些人对口述史学各有各的看法,有兴趣尽管谈,象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可行性,还提出不少方案,涉及社会史、生活史、妇女史、心理史、民族史、戏曲史等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口述史的重要性来呼吁别人做此项工作,而笔者略有不同之处就在起而行,从几个迫切的主题展开口述访问工作。

目前国内热心的探索者太少,这恐怕与我们的学风有关系。学术界中坐而论道的学者颇多,评头论足的也不少,深受门户派别、官位职称的干扰。要想认真尝试田野作业与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实践,用一用

口述方法,尚非易事。因为只有历史才永远承认这种辛苦劳累的价值。

其实很多人都明白,中国口述史学目前的关键困难,是缺乏经费。至于愿意进行中国口述史的朋友们,肯定都不会在没找到经费前就去开展工作。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①见托什的文章:“口述的历史”。译文载《史学理论》1987年4期,P89。

②汤普森文章,转引自沈固朝文:“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载《史学理论》1995年2期,P103。

③见顾颉刚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载《史学年报》2卷2期,1935年,P211。

④⑤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一版,P148、P42—43。

⑥见梁启超编著:《中国新史学》甲编“论中国之旧史学”文。公利活版所一次印刷,光绪年间,P3—6。

⑦见顾颉刚编:《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P94。

⑧见鲁迅著:《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

⑨见翦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一版,P32。

⑩见姜蕴刚著:《历史艺术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7月一版,1944年12月再版,P4。

⑪唐德刚文,载台湾《传记文学》45卷4期,1984年,P12。

⑫见台湾《口述历史丛书》第一部上之“弁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2年。

⑬拙文见《史学理论》1989年4期,P123—127。

作者钟少华,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100101)

责任编辑:郭林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汉书·儒林传》中有一段文字：“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这一段文字至少对后世的司马迁研究产生了三点影响：其一是导致后人认定司马迁师承孔安国；其二是认为司马迁习《鲁诗》是受孔安国影响；其三是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载“年十岁则诵古文”就是从孔安国读古文《尚书》。这三个观点，核心是司马迁师承孔安国问题，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其他两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如果将《汉书·儒林传》这一节文字逐一认真推敲予以落实，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之事不见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不知《汉书·儒林传》此说的根据是什么。从《太史公自序》详载乃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乐毅列传》详载黄老之学传授系统、《仲尼弟子列传》载《易》学传授系统、《儒林列传》论列经学传授系统、《孟子荀卿列传》及《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诸子渊源关系来看，司马迁非常重视学术师承关系。如果他真是受业于孔安国，那么对这件大事《太史公自序》无论如何不会不予记载。

其次，《汉书·儒林传》说“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也是不够准确的。司马迁时代尚未有今古文经学之争，他利用皇家图书馆的特殊便利条件，广泛地阅读了今古文经典，他的《史记》中既有今文经说，又有古文经学的观点，而今文经说的成分更大一些。

《史记》中确有一些古文《尚书》经说。例如《殷本纪》所载《汤征》，不见于伏生所传 29 篇和孔壁古文《尚书》，当属中古文《尚书》，幸赖《史记》保留了《汤征》古义。《汉书·儒林传》论列的《尧典》等篇章的古文经说，在《史记》中也可以找到若干例证：

如《史记·五帝本纪》：“肇十有二州。”今本伪古文《尚书》亦作“肇”。但伏生《尚书大传》写作“兆”。陈寿祺《左海经辨》认为司马迁在此采用古文《尚书·尧典》经说。

又如《史记·鲁周公世家》：“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据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自以为质”，是今文经说，“自以为功”是古文《尚书·金縢》经说。

又如《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周本纪》：“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史记集解》：“嘉，一作‘鲁’，今书序作‘旅’也。”《史记索隐》：“徐广云，一作‘鲁’，‘鲁’字误也。”章炳麟《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云：“案《说文》：𡗗，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此壁中古文作𡗗，孔安国循例读之为鲁。鲁义虽未

合,然可知最初古文家不敢妄下己意也。”《嘉禾》今已不存,伪古文《尚书·微子》篇末附录有《嘉禾》书序。

再如《史记·夏本纪》:“淮夷蜃珠鬲鱼。”今本《尚书·禹贡》写作“淮夷蜃珠暨鱼”。《史记索隐》:“鬲,古‘暨’字。暨,与也。”顾颉刚《尚书讲义》亦云,鬲,“暨”字之古文,篇末“朔南暨”,汉志亦作“鬲”。这是司马迁采用古文《尚书·禹贡》经说。

以上数例表明,司马迁确实阅读了古文《尚书》,并采用了一些古文经说。但《史记》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采用今文《尚书》经说。

《史记》采用今文《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从中分出《舜典》)经说凡9条:

1、《史记·五帝本纪》:“便在伏物。”《史记索隐》:“《尚书》作‘平在朔易’,今案:《大传》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据之而书。”这说明今文《尚书》大师伏生在说《尧典》时就说成“便在伏物”,司马迁是按照伏生的经说而记载的。

2、《史记·五帝本纪》:“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今本伪古文《尚书·尧典》写作:“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认为,“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为今文《尚书》。王充《论衡·感虚篇》云:“尧之时,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帝尧吁嗟,博求贤者。”王充习今文《尚书》,《论衡》所用《尚书》经文与《史记·五帝本纪》句式相近,这是《史记》采用今文《尚书》经说的佐证。

3、《史记·五帝本纪》:“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史记索隐》:“《尚书》云‘纳于大麓’,《谷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录,言令舜大录万机之政,与此不同。”按伏生所作的《尚书大传》训麓为山麓,而古文家则训麓为录,说帝尧命舜录用政务,《史记》说“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显然是采用今文山麓之说。

4、《史记·五帝本纪》:“舜让于德不恠。”《史记集解》:“徐广曰:音亦。今文《尚

书》作‘不怡’。怡,恠也。”《史记索隐》:“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恠也。谓辞让于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悦恠也。俗本作‘泽’,误尔,亦当为‘恠’。”《史记》不用古文家的“不嗣”,而是将今文家的“不怡”意译为“不恠”,这是采用今文《尚书》经说。

5、《史记·五帝本纪》:“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史记集解》:“郑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史记索隐》:“《尚书帝命验》曰:‘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古文家以文祖为五天帝中之赤帝,而今文家则以文祖为尧之太祖黄帝。《史记》采用了今文经说。

6、《史记·五帝本纪》:“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史记集解》释“五玉”云:“郑玄曰:‘即五瑞也。执之曰瑞,陈列曰玉。’”崔适《史记探源》云:“郑君兼注今古文者,《白虎通》引亦作‘五玉’,此今文也。《汉书·郊祀志》亦刘歆作,故作‘五乐’。……此古文说也。”《史记》用“五玉”而不用“五乐”,这是采用今文说。

7、《史记·五帝本纪》:“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史记正义》:“《尚书》作‘宅’。孔安国云:‘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也。’案:谓度其远近,为三等之居也。”崔适《史记探源》云:“此今文《尚书》也。古文《尚书》作‘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王制》注引之,《正义》引郑玄注曰:‘宅读为咤,惩罚之器,谓五刑之流皆有器惩罚。’知作‘宅’为古文,作‘度’为今文者,《尚书》‘三危既宅’,《夏本纪》作‘既度’;‘是降邱宅土’,《风俗通》作‘度土’,此其例也。”《史记》用“度”而不用“宅”,是采用今文说。

8、《史记·五帝本纪》:“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史记集解》:“徐广曰:‘今文《尚书》作祖饥。祖,始也。’”《史记索隐》:“古文作‘阻饥’。孔氏以为:阻,难也。祖、阻声相近,未知谁得。”《史记》译“祖”为“始”,可见是采用今文说。

9、《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

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按此记载，舜刚好活到 100 岁，这与今文《尚书》“舜生三十征庸，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相合。古文《尚书》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王肃注：“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载。”“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据此今文家认为舜年寿 100 岁，古文家认为舜活到 112 岁，两者相差 12 岁。《史记》从今文说。

《史记》采用今文《尚书·禹贡》经说有两材料：

1、《史记·夏本纪》：“海滨广瀆。”《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泽’，又作‘斥’。”今本伪古文《尚书》即作“斥”。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作‘斥’者，古文《尚书》也；作‘瀆’者，今文《尚书》也。”据此《史记》是采用今文说。

2、《史记·夏本纪》：“今天子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今文家认为五服皆在天子之国外，面三千里，为方六千里。古文家则主张甸服在天子之国内，加侯、绥、要、荒四服，面二千五百里，为方五千里。《史记》记述五服都在天子之国以外，显然是采用今文说。

《史记》采用今文《尚书·金縢》经说的材料凡 4 条：

1、《史记·鲁周公世家》：“旦巧。”今本《尚书·金縢》写作：“予仁若考。”伪孔传：“我周公仁能顺父。”可见古文家以“父”训“考”。司马迁以“巧”训“考”是采用今文经说。

2、《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

‘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今本伪古文《尚书·金縢》写作：“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这是古文经说，认为周公因流言而避居东方二年。今文大师伏生《尚书大传》云：“管叔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杀禄父，遂践奄。”今文经说不承认有周公避居东方之事，认为是周公奉成王命而平定武庚叛乱，这与《史记》所载相合，可见《史记》是采用今文经说。

3、《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繆卜乎！昔周公之德，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今本伪古文《尚书·金縢》写作：“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君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此为古文经说，认为周公避居东方，上天动威以彰周

公之德，成王开金縢之书后乃知周公忠心，于是迎周公西归。伏生《尚书大传》云：“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乃葬周公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按今文家的说法，周公至死时与成王之间尚有误会。周公死后，上天动威，成王开金縢之书，方知周公勤劳王家的一片赤诚忠心，于是为周公举行隆重的葬礼，上天也因此风调雨顺。今文家之说与《史记》所载相合，《史记》采用今文说。

4、《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今本伪古文《尚书·金縢》写作：“公乃自以为功。”今文经作“质”，古文家写作“功”，《史记》此处从今文经说。同篇又有两处写作“自以为功”，是古文经说。这是司马迁博采今古文经说的极好例证。

《史记》采用《尚书·微子》今文经说的可考材料有两条：

1、《史记·宋微子世家》：“乃问于太师、少师。”《殷本纪》：“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本纪》：“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古文家以太师为箕子，以少师为比干，而今文家则以太师、少师为殷王朝乐官，《史记》采用今文说。

2、《史记·宋微子世家》：“我其发出往？”《史记集解》：“郑玄曰：‘发，起也。纣祸败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记索隐》：“往，《尚书》作‘狂’，盖亦今文《尚书》意异耳。”崔适《史记探源》据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郑读“狂”为“往”是从今文，《史记》采用今文说。

《史记》中的《尚书》今古文经说远不止以上诸例，只是因为孔壁古文《尚书》以及今文《尚书》经说亡佚殆尽，所以尽管后人不遗余力地辑佚考证，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到司马迁时代今古文《尚书》经说原貌

的水平。只是上述诸例已可以说明《史记》兼采今古文《尚书》，而采用今文经说的频率远远高出古文。《汉书·儒林传》说《史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采用古文，是一种极不可靠的说法。《汉书·儒林传》与《艺文志》互为表里，而《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好古文的刘歆《七略》写成的，所持的是古文家的立场，因此不惜广搜证据以助其说。退一步说，即使真有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之事，那么也不能据此认定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及门弟子。极有可能是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时遇到了疑难，于是便持此疑点向《尚书》大师孔安国求教，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请益，而非受业弟子。这表明司马迁受孔安国的影响极为有限。因此，我们应当推翻司马迁师承孔安国的说法。

在推翻司马迁师承孔安国传统学案之后，我们对与此相关的另外两个疑案就易于破译了。

既然《史记》中的《尚书》经说尚且不为孔安国所囿，那么《史记》中的《诗》说受孔安国影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因此清代学者陈乔枬、王先谦等人从孔安国这一线索来追溯司马迁的《诗》学渊源，这个思路同样不可行。司马迁采用《鲁诗》作为《诗经》的学习蓝本，这是由《鲁诗》的自身价值决定的。在汉代四家诗中，以《鲁诗》最为先出，说诗最精，影响最大。汉武帝即位之初，重用《鲁诗》学者赵绾、王臧以实施改制，并安车驷马礼聘《鲁诗》大师申公出山，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春秋公羊学未尊之前，五经之中实以《鲁诗》的学术地位最高。司马迁采用世所公认的《鲁诗》作为自己的读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可以从《鲁诗》的自身价值来说明司马迁的《诗》学渊源，而不应该以孔安国作为司马迁的《诗》学老师。

至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年十岁则诵古文”，也不应该狭隘地理解成司马迁10岁时从孔安国读古文《尚书》。《史记》中8次提到“古文”，有的指古文经，有的指没有译为隶书的古文典籍，有的则是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

□杨仁飞

茶叶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一项主要的出口商品。1685年以前,我国海上茶叶贸易主要为荷兰、葡萄牙商人所控制。英国商人虽从1658年起想通过广州口岸直接与中国从事茶叶贸易,但由于受到葡商的排挤和清廷的限制而无法在广州进行。直到1685年,粤海关建立,英国商人才开始以广州为中心的中英茶叶贸易。本文通过对清朝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发展过程的研究,分析清代封建性的对外贸易如何演变,并为外国洋行所控制、最后成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

一、广州中英茶叶贸易发展的三个阶段及趋势

1685—1783年是广州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

最初,茶叶是由葡萄牙、荷兰商人从广州运到伦敦。1657年,伦敦有了第一家茶馆。1669年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和南洋采购茶叶。在该公司的宣传下,茶叶逐渐流行于英国。1701年之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和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已有很多,其

中不少是从广州运出去的。1701年由中
国出口的茶叶总量为121417磅,其中由
广州输出的为66738磅,占54.5%;1721
年从中国出口的茶叶为1241629磅,从
广州出口的为282861磅,占总出口量的
22.78%;而到1751年,从中国出口的
茶叶为2855164磅,从广州出口的为
2710809磅,占94.94%。①1757年,因
发生了洪任辉事件,清政府关闭江苏、
浙江和福建三个通商口岸,独保留广
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从此中英
茶叶贸易也就移到广州一地进行。1761
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的茶叶为
2862772磅,1781年为4061830磅。②

第二阶段是1784—1833年,这是东
印度公司和中国的洋行商人垄断广州
茶叶贸易的阶段。这一时期,茶叶贸易
处于繁荣期。

英政府为了扩大从中国的茶叶进口,
于1783年公布了《交换法案》,这一法
案使得东印度公司成为经营中国茶叶
的唯一垄断公司。这个公司与广州的
对外贸易垄断商人十三行商一起,垄
断了中国茶叶向英国与其殖民地的
出口。这一时期,广州的

泛指产生于古代的典籍,含义不尽相同。为什么《史记》中的“古文”有这么多的歧义?这是因为司马迁时代虽然有今古文的区别,但却未有今古文经学派别之争。司马迁绝不会想到他的《史记》中的“古文”一词会引起后人那么多的论争。在无法考实司马迁在10岁时究竟读的是什么“古文”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从泛指的意义上去

理解,即司马迁10岁时开始诵读古书,这个“古文”的含义与《史记·封禅书》中所说的“古文”大体相同,不必将司马迁诵古文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联系起来。

作者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515063)

责任编辑:郭林

中英茶叶贸易增长极快,运出的茶叶从1783年的69000担增长到1784年的229270担。③茶叶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货物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759年的88.3%④上升到1825年至1833年的94.1%;1783—1833年东印度公司茶叶运出量占中英茶叶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0—60%强,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⑤由此可见,从1783年起茶叶贸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1833—1840年,这是广州中英茶叶从垄断进入自由贸易的时期。

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取消,允许其他私商到中国贸易,一向被视为禁区的茶叶贸易也向所有英国商人开放。随着大量英国商人到广州运输茶叶,运往英国的茶叶大幅增长,但出口量呈不稳定的趋势,如1838—1839年出口的茶叶达40223866磅,而1839年—1840年则下降到25962919磅。⑥

在清前期长达200年的中英茶叶贸易发展中,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1、中国输英茶叶量稳步增长。

1701—1761年,广州输往英国的茶叶增长了五、六十倍。⑦以1701年至1760年增长最快,1760至1795年增长二倍左右,⑧1795至1833年增长一倍多;1838年至1840年又几乎增加一倍。⑨到1840年前,茶叶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

2、输英茶叶品种日渐增加。

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有武夷、工夫、小种、熙春等几种,茶叶品种尚不多。随着18世纪英国公众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中国输英茶叶品种也日渐增多,一些新的品种为适应英国市场的需要而在中国专门生产,如在广州加工的花薰茶19世纪成为伦敦茶叶市场最富有特色的茶叶品种。到1840年,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已有十多种,如广东、福建的武夷、屯溪、小种、珠兰、白毫、安溪、花香、红梅、拣培、雨前、园珠、芝珠、熙春、皮茶等。⑩

3、出口到英国的各个茶叶品种量波动较大。

比如武夷茶,1785年前,它是广州出口量最大的茶叶品种。1775—1785年东印度公司运出的武夷茶占广州当时红茶出口总数的77%,占该公司茶叶总运出数的53%。但从1785年以后,武夷茶出口量大减,在1785—1795年十年中,公司运出的武夷茶只占有输英红茶的31%,占公司运到英国茶叶的21%,⑪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再如工夫茶,在1783年以前,东印度公司从广州很少购买此种茶叶。1783年以后由于英国公众的口味发生一些变化,及武夷茶的价格较高,较为廉价的工夫茶开始受到欢迎。1797年从广州运出的工夫茶量已超过其他茶叶品种成为最主要的品种,1838—1839年达到29262600磅,占当时中英茶叶贸易总量的80%⑫左右。

至于屯溪茶,在1812年以后,成为中国出口到英国茶叶的第二大品种,出口量呈稳步增长趋势。

二、鸦片战争前中英茶叶贸易的特点

1840年之前,随着形势发展的变化,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在贸易方式与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垄断了广州的茶叶外销。

英国人虽然来广州的时间比葡萄牙、荷兰、西班牙人都要迟,但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很快把这些早期的西方殖民国家排挤出去。到18世纪后期,英国已全面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1783年,东印度公司通过《交换法案》确立了自己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该公司从广州出口大量茶叶到英国,降低了英国国内的茶叶价格,将欧洲其他国家不仅排除出英国市场,而且也把他们排除出广州的茶叶市场。

尽管 1784 年美国独立以后,美国商人也到中国大量采购茶叶,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 1784—1839 年间,成为中国茶叶的第二大出口国。但其比例一般在 10—20% 之间,^⑬一直没有威胁到英国在中国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2、中国的茶叶商人和英国的自由商人不断向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

广州的行商是由清政府特许的出口贸易垄断商,东印度公司则是获得英国政府允许的垄断商业集团,他们共同垄断了中英进出口的茶叶贸易。而在中国国内市场中,还有一批实力很可观的茶叶商人,他们对行商长期控制茶叶出口并不满意,为着自己的利益经常起来反抗。1818 年,茶商向广州地方当局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抱怨他们的茶叶受到被大量退还、降等级、降价格等不公正的对待。1819 年茶商组成了联合会,向全体茶商倡议,在东印度公司接受两个著名茶行 PUAN—LNY—LAN 和 HENGCHUN 的茶叶之前,其他的茶叶商人不得向公司运送一箱茶叶;提出茶叶的等级一旦被确定就不能任意更改和退回;在向外商交货之前,茶叶应放在茶商的货栈,而不是放到行商的库房里;茶价得由茶商来确定。^⑭不过茶商的这些要求遭到了行商与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方面的反对与拒绝。就在茶商继续向公司提出抗议时,一些低级的行商却向东印度公司的监理会暗示,如果东印度公司向行商提供订购茶叶的预付款,那么行商就会以停止到茶区收购茶叶威胁茶商,迫使茶商放弃他们的行动。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对这些行商的建议并不在意。但当行商写信给公司,说他们准备答应茶商的要求时,东印度公司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于是开始拉拢行商,并让行商贿赂粤海关和地方官员,让官府出面干涉。到 1820 年 1 月,有几名茶商支持不住,同意以每担 17 两的极低价格将冬季茶出售。1 月 22 日,南海县衙贴出告示,称这次茶商的行动是非法的,下令逮捕组织这次行动的领袖。茶商的反抗斗争以失败

告终。1825 年,安徽的茶商向南海县衙递上禀帖,指控行商缺斤少两,少付茶价。^⑮行商声称做这些事的人是一些行外的商人与铺主,否认他们有这种恶劣行为。此事也不了了之。由于行商的对外贸易得到清朝廷的特别准许,致使中国茶商的反抗行动总是归于失败。

在英国,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声音也与日俱增。1813 年由于英国散商的不间断坚持,东印度公司表示可以允许散商从事与茶叶无关的其他对华贸易,如纺织品等,但仍将茶叶贸易视为绝对的垄断商品,不容染指。据统计,在 1833 年以前,散商及公司船员私人从广州运出的茶叶量不到公司出口量的 1%。^⑯

东印度公司虽然将茶叶贸易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公司购买茶叶需要大量的现金,尤其是白银。这使得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周转不够,与中国的贸易处于逆差中。而散商通过从事棉花与鸦片贸易,对华贸易出现大量的顺差。东印度公司需充分利用散商的资金,为其长期从事对华茶叶贸易打下基础。这使公司对散商的财政依赖程度逐渐加深。

长期不允许散商从事茶叶贸易,使散商对公司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他们不断要求分享茶叶贸易的利润。东印度公司鉴于散商贸易对公司的重要性,曾一度允许发执照给英国的散商,让他们前往澳大利亚。1819 年新到中国经商的英国散商就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放出运装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号。1830 年威廉查顿的一个合伙人拉德船长用奥斯丁号将茶叶与生丝运往贺巴特城。^⑰到 19 世纪 20 年代,散商利用东印度公司由广州前往印度或印度前往英国的船只不需要有执照的规定,通过 1826 年刚刚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发展起与欧洲的直接贸易,新加坡一时成为散商贩运中国茶叶的转运港。1829—1830 年,从新加坡运出的中国茶叶有 29786 西元,1830—1831 年为 32873 元,1831—1832 年为 10774 元。据格林堡研究,1831 年每一季度就有 4 只“自由商

船”往来于广州与伦敦之间。^⑱

1831年起,这些散商还用其他国家的名义直接参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如有以瑞典、丹麦、俄国等国商人的名义在广州的十三行街居住下来,以东印度公司无法控制的方法来突破公司的垄断。而英国国内由于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强烈反对东印度公司的旧式垄断,迫使英国政府于1834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3、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行商的贸易关系变化较大。

在1840年前的广州中英茶叶贸易中,除了垄断与自由贸易的竞争之外,还存在着中英两大垄断商东印度公司与行商之间贸易关系的变化。

茶叶贸易合同对改变中英关系具有很大的作用。中英茶叶贸易采用的是茶叶合同制的方法。这种茶叶贸易合同制包括了茶叶预付款、毛织品与茶叶份额的分配等几个方面。所谓茶叶预付款是指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以前,先与行商订立一份供应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的总价值,向行商预付50—60%的款项;贸易份额分配是指东印度公司为了推销英国的毛纺织品,强将毛织品分成各种等份搭配给行商,公司向行商购买茶叶,行商就要向公司购买一定比例的毛纺织品。

18世纪末以前,中英茶叶贸易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的行商手中。这主要表现在公司要购买中国的茶叶,行商才会接受英国的毛织品,不买茶叶,行商就不会接受毛织品。这说明合同的先决条件是由行商来决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行商如果接受毛织品,只表明行商是为了照顾公司的生意。许多行商并不愿意购买毛织品,只愿单独出售茶叶,公司对此也无可奈何。

中国行商在茶叶贸易中掌握主动权的另一表现是,行商对茶叶与毛织品的价格有决定权。1720年,在十三行的公行组织成立之初,即规定了行商应共同议价。1755年清政府制定了“防夷五则”,这一法令中虽然没有规定行商可以确定货价,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却认为,这些规定的

真正目的是要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于少数行商之手,而他们可以随意制定价格。^⑲1778年大班抱怨“如有公行交易,货低价高,任公行主意,不到我夷人讲话”。^⑳由此确反映出行商在较长的时间里掌握茶叶出口的定价权。

然而从18世纪末开始,东印度公司凭借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控制了茶叶贸易的主动权,而且对行商施加压力,使之在经商中对公司作出让步。

19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控制茶叶贸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茶叶贸易份额的分配权。19世纪以后,在茶叶贸易合同制之下,一般划分20个左右的份额。经济实力较雄厚的高级行商往往取得3—4个份额,其他行商一般只能取得1—2个份额。本来这种份额的分配是以公开协商的原则来决定的。1811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罗伯特向伦敦的公司董事会建议,以秘密的方式分配茶叶贸易的份额。^㉑此建议很快被公司的广州理事会所采纳。东印度公司以此对不满公司的行商进行制裁,如在1793年高级行商潘振承因反对公司改变预付款方式而遭到订立茶叶合同数的减少。

(2)公司操纵茶叶价格。由于茶叶贸易份额的确定,一些行商为了获得较多的份额,往往在茶叶价格方面作出让步,东印度公司也就乘机操纵茶叶的价格。1791年,当行商因进口的毛织品太多,推销不出去,不打算再向公司购进毛织品时,公司就以提高购买茶叶的预付款对行商进行诱惑,但要行商接受茶叶价格减少1—2两。由于行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使公司各个击破,达到了减价的目的。^㉒1804年东印度公司又要求行商接受更高价格的毛织品,并以降低茶叶价格相威胁。^㉓

(3)对行商身份的成立与否发表意见。本来公司并无权决定哪些中国的商人有资格充任行商,因为这种权力只属于清政府、粤海关和公行。但东印度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行商对其在贸易上的依赖性,便在此问题上向清政府和公行施加压

力。如 1791 年,清政府选任了 6 名新的商人充作行商,但公司只承认卢观恒有资格,同意另一商人叶上林在 1793 年后再任行商,认为其他 4 个商人尚无资格成为行商,不肯与他们签订生意合同。以后公司还找各种借口,不与清政府新任命的行商做生意,使这些新行商成不了外贸商人。

(4)扶植低级行商,加深他们对公司的依赖性,从而达到控制低级行商与获取厚利的双重目的。18 世纪以来行商的经济恶化日益成为中英贸易关系中比较严重的问题,而茶叶预付合同制使每一个行商都成为公司的债务人。行商欠公司的越多,公司越不愿意行商即时破产,因为一旦行商破产,公司的债务就有可能收不回来。东印度公司援助低级行商的办法有直接贷款、增加茶叶预付款的数量及重新安排茶叶合同。在 1811—1820 年的 10 年中,东印度公司共向行商提供了 4814960 元的贷款,^{②④}使行商有能力向清政府交纳税款、行佣、军饷和捐输。当然公司的援助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行商必须把获得的商业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债务”,^{②⑤}而不是清政府所规定的“各行将所得生意余羨银两,陆续拨出,分还各欠”;^{②⑥}条件之二是接受援助的行商得将其行务置于公司债权人管理,公司可以对行商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管;条件之三是行商得为公司推销毛织品。尽管公司通过茶叶合同制已经为公司推销毛织品创造了条件,但公司还想出一种新的推销办法——让低级行商充当掮客,并承担经营风险。

由此看来,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实行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行商采用传统的贸易手法从事中英茶叶贸易,使得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显得过分保守,行商的经济力量得不到壮大。而与此同时,英国商人在华的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在贸易中控制经济力量较薄弱的十三行商人,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利益,他们的野心更大,那就是要求清政府开放门户,将其强权加于清政府的头上,使中国真正屈

服于英国的统治。

三、清前期中英茶叶贸易的影响

尽管中英茶叶贸易在 1840 年以前经历了许多变化,但作为中英贸易的主要形式,它对中英两国社会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英茶叶贸易的发生与发展对中英贸易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前,茶叶贸易是中英贸易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它的盛衰对中英贸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8 世纪末,由于茶叶生意的发展,使英国对中国其他商品的兴趣增加,中国的丝织品、棉织品与瓷器大量被运往英国。如在 1800 年左右,出口到英国的生丝年平均为 1100 担。随着茶叶贸易的增长,1830 年,出口生丝达到 7900 担。^{②⑦}茶叶出口的迅猛增长还促成了中国、印度、英国三角贸易关系的形成。英国商人从中国运走大量的茶叶,但其国内没有足够的硬通货支付茶叶款,他们就利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如印度的棉花等来顶替。1775 年从印度运到中国的棉花平均值为 28834 两银,到 1830 年增加到 4097033 两银,在 50 年中增长了 17 倍。^{②⑧}但这些原材料尚不能抵消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的巨大逆差,于是英国的商人便把罪恶的鸦片贸易引进中国。正是靠着这种贸易,英国才扭转了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而鸦片贸易促使英国政府发动了 1840 年的侵华战争。

2、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广东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福建等茶叶产区经济的发展。清代,由于茶叶贸易的发展,广东一些地方也开始种植茶叶。广州郊区珠江南岸,“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每日清晨,从广州来的茶估“涉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②⑨}南海县的西樵山号称茶山,“山中人率种茶”;^{③⑩}河源县上管、康禾诸村,居民多依赖种茶为生,其生产的霜茶,远近有名;道光年间“近则涌口至附近,无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③⑪}

广州茶叶的大量出口,还使广东地区

出现了外向型的茶叶加工区。为了适应英国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广州的一些茶行商人设立了茶叶加工厂,多设在珠江的南岸。外销性的珠兰茶和花熏茶就是在这种茶叶加工场里完成的。

除此之外,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还促进了其他省区茶叶经济的发展。如福建省是当时销往英国茶叶的主要产区,武夷茶在宋代已有种植,到清代得到很大发展,武夷山周围形成了众多的茶市。崇安的星渚是一个茶贸中心,史称“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嘉庆以来还在武夷山区附近开辟了建阳、瓯宁新茶区。这些新茶叶区的发展与茶叶出口量的增长有很大的关系。

总而言之,广州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广州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广州中英茶叶贸易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社会的消费结构和生活习惯。自茶叶运入英国后,英国的公众很快对它产生了兴趣,茶叶的消费从上流社会波及到普通大众。到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工人家庭的日常饮料。而且还因中国茶叶输入量的增大,使原在英国最受欢迎的咖啡销量下降。19世纪初英国茶叶进口量还超过了咖啡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进口商品结构与饮食结构的变化。

同时,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格林堡估计,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100—150万镑。^⑳而茶叶贸易的真正得益者是英国政府。1820年英政府的茶税收入为300万镑,1833年为330万镑,1836年为460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㉑这巨额的利润不仅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为保护这巨大的利益,英国政府不惜对中国动

用武力,最终发动了鸦片战争。

①邓瑞本《广州港史》第192页;查得霍尔书,第538—539页。

②⑦邓瑞本《广州港史》第192、192页。

③④⑧⑩普里查特《中英关系的关键年代》第345、165、345、164页。

⑤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第14页。

⑥⑩⑫姚贤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282、282、282页。

⑨根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数字统计。

⑬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5期。

⑭《英国蓝皮书》第36卷。

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第112页。

⑯Mui - Toh - Cheung《垄断经营—1783至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第109页。

⑰⑱⑳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70、90、3页。

⑲马士书,卷1,第163页。

⑳许地山《达忠集》,卷下,第34页。

㉑㉒马士书,卷3,第159、112页。

㉓㉔㉕马士书,卷2,第198、418、261页。

㉖《清代外交史料》卷4,第38页。

㉗㉘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第11、11页。

㉙《粤东笔记》卷十六《粤中诸茶》。

㉚《广东新语》。

㉛《河源县志》卷十一,道光《鹤山县志》。

㉜Mui - Toh - Cheung 书第142页;《鸦片战争》第642页。

作者杨仁飞,厦门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361012)

责任编辑:郭林

试论新历史小说的比喻结构与动机

林 明

80年代的文坛有众多的变革潮流,它相继促发了“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浩大声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小说。这批历史小说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被称作“新历史小说”。但实际上,要试图说明“新历史小说”的内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包含了众多作家(如苏童、叶兆言、余华、格非、孙甘露、池莉、利震云)风格迥异的历史小说创作,它跨越“先锋”、“新写实”两大阵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新颖的艺术方法层出不穷,也引发了单个作家历史小说创作的激烈蜕变。其中包含的诸多理论命题,如历史小说的虚构性,历史的迷雾化、空间化、颓败化、平俗化、消费化,给传统的历史理论递上了一份挑战书,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误读这一大批作家的精心构思。它需要人们的理解与宽容。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新历史小说摆脱了追寻历史本真的硬性规定,在小说虚构的空间自由地飞翔。它们讲述的不是历史上确有的故事,对历史事件的兴趣降到了最低点,而以或生动或紧张或琐碎的故事叙述取而代之。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分别讲述了四个家庭的故事,在明静流畅的叙述中渗溢出晚清世事人情和生活气息。池莉在《预谋杀入》、《凝眸》中讲述了杀人的故事和两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苏童在《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中调用古旧的历史

肖像,将笔触伸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活史。这些故事不再涉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而是转向以往被历史所忽略的凡俗小事或民情风俗,这就避开了先验文本的历史规定,为虚构创设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先锋小说先行一步,已经将历史真实远远地驱逐了,他们解构意识很强的形式策略迷失了历史的本相,这在格非设置的叙事空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先前传统历史小说恰恰是将历史的真实放在首要地位的,叙事人呈退隐状态,并竭力弥合小说叙事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红岩》采用革命回忆录的形式保证了小说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红旗谱》、《红日》是作者亲自参与或间接参与的社会斗争的反映。对于取材于时间较久远的历史题材小说如《李自成》、《曾国藩》、《金瓯缺》、《星星草》,作者无一不是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充分的史料与“建构的想象力”(柯林伍德语)的有机配合,共同修筑了遥远的历史情境,为“逼真”的历史状态作出承诺。

如果说“虚构”和“真实”在古典主义那里还是一对互相排斥的范畴的话,那么,随着现代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凯歌行进,它们之间的差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现代语言学对语词的“再现”能力普遍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词语仅仅是在世界其它事物之中的事物而已,它们既显示其力图表示的对象,又将始终含混不清”。^①因而,后结构主义再现批评认为“再现所依凭的是歪曲的再现”,“一切再现活动都会产生一个边缘化的或遭到排斥的他者(other)”,^②历史小说中真实的基石——语词

的透明性遭到了怀疑。历史由于时间的流逝成为一种永恒的“不在”，它永远无法达到那个曾经实有的历史存在。所以，对历史小说而言，它决不是代表了“作为人类活动的总和和相互作用的历史”，而只是一种“对过去的记录叙述或诠释”。^③历史小说是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的文本性质暴露了它的虚构性。在文本中，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会遭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融会与改造，散乱的历史事件被一种情节结构或意义结构重新组织，陌生的、混乱的历史被现代人按自己的想象加以解释，类似的工作在历史小说中司空见惯，而且是必不可少，但这将会使历史偏离真实的轨道。因此，在那些极力宣称真实的历史小说中，历史虚构大量存在，这也是历史仿真的必要手段。

如果说传统历史小说在虚构的时候依然有一个基本事实指向的话，新历史小说则完全属于虚构一路，作家的大胆想象早已溢出了历史史实的现实性规定，设置一个确定的时空，如“一九三四年”、“枫杨树故乡”（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只不过是让事件得以落实在人们的时空经验构架上，它已经失去了为事件的确定性论证的原初意义，许多小说只是在叙事背景上略略勾画几笔时代风云，暗示时间的位置与流动。历史真实的淡化并没有减弱小说的魅力，这得归功于作家“建构的想象力”，它建筑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在现实的一系列推论关系中将结论置于历史进程中具有人类生活体验意义上的真实。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个显而易见的虚构文本，众多活动的人物由于丧失了历史性的根基而漂浮在那个古老恒定的文化时空里，但人物之间的明争暗斗，封建制度的强大无意识力量，人性卑琐丑恶的一面却如此真切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真实。由此看来，“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原貌”这样的批评标准不再适合于大批的新历史文本，它要求历史小说批评寻找新的尺度。

当代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历史是作为文类，一种特殊的文本而存在的”。无论是编纂学意义上的，还是文学意义上的，历史总是以某种叙事话语的方式存在，福柯将它称之为“历史叙述”或“历史修辞”，以区别于客观存在的历史。海登·怀特则进一步认为，历史文本深层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文学的想象和虚构，从而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彻底拆除了。历史文本无法达到与客观的绝对同一，它总是在追踪那个永恒的“不在”中呈现出话语的意识形态追加，因而，新的批评标准应当以历史话语作为切入口，摆脱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思维格局。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历史随着经典著作的产生而前进，但经典著作不会同科学的主要概念一样容易失效或被否定，“永久性说明了历史经典中根本的文学性质。一部历史杰作中有不可否定的东西，这不可否定的东西正是其形式，历史杰作的虚构在于他的形式。”^④这种形式不是指黑格尔“形式/内容”范畴意义上的形式，而是指导小说家剪裁史实的情节组织模式，形式的意义不在于如何使内容表达得更充分、更完美，而是为历史小说家提供一个前理解结构，它指示小说家在处理混沌的历史事件时应该往何处去思考，采取何种情感与价值取向，不是内容决定了形式的样式，而是形式主导了内容的取舍，形式揭示了小说家的策略性和理解力。

现代解构主义大师保罗·迪曼在他的名著《阅读的寓言》中讨论了隐喻和换喻（转喻）在本文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结构及其相互关系。郑敏在《〈保罗·迪曼〉的解构观与影片〈红高粱〉》一文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文学及一切有关文学意义的文字和语言都具有双重结构，它们是‘换喻结构’和‘隐喻结构’。和换喻结构相应的是理性的逻辑思维、语法、故事的陈述、评述插话，因此它给作品提供了故事的时空细节和具体的秩序和情况。而隐喻结构则是带有浓厚的

作者个人和读者个人的主观色彩想象与象征的产物。和隐喻结构相应的是朦胧的修辞格,想象力所萌生的隐隐约约的含义,因此隐喻结构为作品和文字带来某种神秘性、象征性、不可定性。通常评论者与写作者总是将隐喻结构放在首要地位,而换喻结构则企图在万象纷纭中说出一些规律,作出一些选择,给作品增加某些条理性、可定性。但由于两重结构的相生相克,换喻结构当受到隐喻结构的渗透时就会发生变形,这时它就失去某些清晰性和逻辑道理。迪曼管这叫做‘修辞化的语法’,我们或可以称之为隐喻化的换喻,在相反的情况下,隐喻结构由于受到换喻结构限制就失去某些朦胧及象征魅力,这就是迪曼所谓‘语法化的修辞’,我们或可称之为换喻化的隐喻。”^⑤

历史小说文本的比喻结构是小说家采用的比喻模式与历史事件相遇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小说的形态和演变。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文本的比喻结构,新历史小说兴起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冲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稳定而强大的比喻结构,将历史小说从单一的编码模式下解放出来,完成了历史话语的当代换形。

双重比喻结构的对抗与对话

传统历史小说在政治主流话语的不断引导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比喻结构,表现为强大的换喻结构和潜藏的隐喻结构的统一,对历史事件的描绘表现为清晰和谐的图式结构,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之间的关系均被交代得清清楚楚,各种结构性的因素被和谐地统一到事件的连续流程中去了,隐喻隐藏其中,内在地起着指导调节的作用。《红旗谱》的换喻轴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朱、严两家三代贫农和冯家两代地主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而换喻轴却指向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作出论证,这一思想作为潜流折射于情节的总体流向、

人物的思想言行、环境的精心营构上,二者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传统历史小说中,这两种结构总的说来相生的多于相克的,当然也存在矛盾,隐喻轴被强大的换喻轴所改造而显得清晰单一,指向性十分明显。

新历史小说不再满足于隐喻结构的潜在状态,隐喻结构不再躲在换喻结构后面,通过间接的影响显示自我的存在,而是直接切入文本的表层结构,结果导致了换喻结构的稳定性、统一性、联贯性的解体。

格非是一个先锋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初期小说如《迷舟》、《大年》、《褐色鸟群》通过在叙事中设置空缺,驱逐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消解了换喻结构的清晰性。这种策略表面上看是受了博尔赫斯的影响,但深入到比喻结构的层面,我们就会看出,这事实上体现了充斥着强大的哲学意念的隐喻结构对换喻结构的一次冲击。在《迷舟》里,格非设置了战争/爱情两重情节结构,故事从旅长萧潜入棋山下游的涟水要塞开始,战争场景置换为情爱场景,仅留一个警卫员若隐若现地揭示战争线的存在,当萧去榆关看望杏时,两条线索迅速重合,由于警卫员没有介入情爱线,又未曾跟从萧的这次行动,因而形成了空缺,警卫员并没有进行考察,凭当时的战争气氛认为萧是去传递情报的,他自认为这一填充合情合理,因而遵照旅长的命令,用六发子弹打死了萧,而事实上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在这里,格非对历史揣想的合理性提出了诘疑。历史与人的永恒差距使历史本文的换喻结构常常蕴含着虚假的一面。那些貌似清晰、逻辑严密的历史进程,那些自命为最合理的想象也许最不可靠。其文本的隐喻结构指向的不是真实,而是探寻真实过程中的一种荒诞与错位。对历史话语的哲学沉思使这篇小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如果说《迷舟》还保留了故事情节的连续性的话,《褐色鸟群》的情节链已经被拆解得支离破碎了。历史在一次次讲述中不是变得更加完善,而是逐渐变得丰富芜

杂,小说的换喻结构在一系列事件的碰撞中显得扑朔迷离,而隐喻结构则在不断提醒读者:历史是无法确切认识的,甚至回忆也不可靠。隐喻结构正是以对换喻结构本体意义上的反思侵入并消解了换喻轴的清晰性与完整性。

比之于格非哲学意念很强的拆解,苏童更愿意将拆解定位在叙事结构的层面,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里,家庭故事从“我”的想象中汨汨流出,众多先辈的生存活动在“一九三四年”这个定格的时间背景上广阔地展开,叙事人从各个角度进入历史,造成了故事的中断。另外,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预言句式插入了故事的运行流程,造成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小说开始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告诉读者:“你知道吗?一九三四年是个灾年。”而小说中“我”的祖父陈宝年在新婚之夜就不无根据地预言他的妻子蒋氏是个灾星。苏童的另一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也同样以预言句式出现于老宫役孙信的口中(“燹国的灾难就要降临了”)。预言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对未来神奇不可思议的洞见力量,它不需要现实因果关系的推演,相反,它指导着、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作为一种叙述动机,还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结构策略,预言句式使小说在舒缓流畅的叙述中笼罩了一层神秘宿命的色彩,让人物命定地朝着预言指示的方向衰颓或覆亡,原因则被预言隐藏起来了。历史小说文本的隐喻结构依靠预言机制挣脱了换喻结构平滑严整的表面,显露出其隐含不定的真实面目。

从换喻走向隐喻

新历史小说初期的形式试验引发了隐喻轴的膨胀和换喻轴的破裂,一度使历史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质。但随着先锋派的逐渐衰落,由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念激发的形式冲动逐渐和缓,文本的隐喻轴在短暂的亮相后再次退居幕后,换喻轴的清晰性、条理性重新回到叙事表面,这体现在苏童的《妻妾成群》、《米》、《我

的帝王生涯》,池莉的《预谋杀入》、《凝眸》,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格非的《敌人》等小说中。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历史重新获得了自足的显现,对历史氛围的细腻的心理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生活味很浓的口语对白,消尽了探索期的躁动不安而归于平静淡远,从容纾徐,双重比喻结构的设置同传统历史小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历史小说只是在先锋派那里转了一个弯,走出先锋后,又回到了传统创作的旧路上去了呢?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再考察两种历史叙事的比喻性动机,就会发现它们的相异之处。传统历史小说由于受“真实性”支配,作者首先做的工作往往是收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对历史回忆或历史文本进行换喻式的编码,将历史面貌尽可能完整有序地描述出来。例如,唐浩明在创作《曾国藩》之前,就翻看了“七八种近代史著作,其中包括解放前及港台出版的,同时大量阅读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也读了不少曾氏同时代人的文集、传记、年谱……并且旁及各种笔记杂谈、稗官野史。”^⑥隐喻式编码(即扭转历史加于这个人身上的种种偏见,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在换喻叙述中逐渐清晰可见,隐喻层面的多向突破显然不是作家任意猜想的结果,而是受到了换喻层面的支持与制约,其编码动机是从换喻模式走向隐喻模式。

新历史小说作家将这一次序作了一个颠倒,他们首先确立的是历史的隐喻结构,这种结构大多来自于作者主体对历史的先验感悟,并以此去决定其历史换喻编码的内容和方向。正如苏童所说:“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我没见过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蓓珊或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⑦而《妻妾成群》在纳妾、争宠、偷情、赏花、唱戏、约会、性爱等显在的叙事代码下,展开了个性、自由、爱情与封建家庭之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将人的自然属性、生存本能

和生存竞争同恶之间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在小说的换喻轴上,我们很容易找出同巴金《家》的相似之处,即恶的强大、恶与善的冲突构成了故事的基本框架模式,笼罩着颓败、没落的气息。不同的是,《家》中的恶紧密地联结着其时代背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垂死没落的象征,是一个阶级为维护自己的脆弱统治而作的最后挣扎,也是历史走完一个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妻妾成群》中恶的隐喻指向来自于作家的主观预设,不是历史产生恶,而是由各种各样的恶(如陈佐千的愚昧残暴、妻妾之间的阴险关系、家法制度的惨无人性)推动、制造了家庭的历史,“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事实上是对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隐喻意象(如性、暴力、恶、死亡)进行富于个人风格色彩的转喻式编码而已。

《苏童文集·后宫·自序》表述得更清楚:“《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构造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了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惶。”

格非后来推出的长篇小说《敌人》体现了相同的叙事动机。“恐惧”这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原命题被植入了故事,它随着一场原因不祥的大火潜入了赵少忠的心里,随后,猴子、哑巴、赵虎、柳柳相继莫名其妙地死亡,古怪的事件呈现出既不能接受又无法拒绝的含义,赵少忠设置了一个隐含的“敌人”,为后来一连串的事件设定可解释的原因,因而他一直生活在假想敌人所带来的恐惧中。表达恐惧是这篇小说叙事的主要动机,种种换喻因素如恶梦预感、失踪、死亡被精心组织在人物周围,成功地烘托了神秘、可怖的气氛。

从隐喻走向换喻结构,使新历史小说把对历史事件的转述改换成对隐喻结构的无穷填充过程,换喻结构由于失去了史实背景的支撑,或是遭到隐喻结构的拆解,或是为隐喻结构作注解。一个总的趋向是:

历史隐喻(结构或动机)支配了历史换喻(结构或动机)。而新历史小说的隐喻主题已经超出了以往政治意识形态的单向规定,开始显现多种指向。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相处流传》在怪诞的表层结构中寄予了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权力怪圈和权力无意识的深沉思考;池莉则企图切入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追寻他们的生存动机和生存状态;叶兆言从文化释义的角度走入晚清四个家庭,将历史风云贯穿于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抒发了对传统文化、世事人情的无尽感喟。许多新历史小说文本还将隐喻结构指向存在主题,我们经常可以从苏童、余华、格非的小说中感受到恶、恐惧、隔绝、暴力、死亡、罪孽等存在的具象主题,领悟到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的哲理蕴含。

比喻结构的换形,仅仅显示了新历史小说文本形式的新变,但它却折射出这一代作家的生活经历、时代特征、西方思潮及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的多重影响,具有特定的文化涵义与价值取向,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必然要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脚印。

参考文献:

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苏童文集》、《格非文集》、《叶兆言文集》、《池莉文集》。

注释:

- ①海登·怀特《解码福柯:地下笔记》。
- ②布鲁克·托马斯《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话题》。
- ③伊丽莎白·福克斯一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
- ④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 ⑤见《电影艺术》1989年第二期。
- ⑥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六期。
- ⑦《苏童文集》《婚姻即景·自序》。

作者林明,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10093)

责任编辑:陶原珂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德国学者尧斯和伊瑟尔创立的接受美学,主张从读者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给西方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东进西渐,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美学大潮。

在面对涌进中国大门的西方当代接受美学,对它进行研究消化的同时,考虑到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固有精华,我国许多学者便以西方接受美学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读者审美接受的理论思想。这种情形在近几年来愈演愈烈,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景观。

从历时的流变过程来看,以接受美学为参照

系对中国古代文论有关接受过程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移植阶段。其时间大致为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广泛而深入地介绍和翻译西方接受美学的各种流派及理论。1983年12月张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一文,1984年9月又在《百科知识》撰写了《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二文较早系统地介绍了西德、东德和前苏联接受美学产生、发展的状况及有关理论主张。在这期间,1984年3月《读书》也刊载了张隆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文,介绍了阐释派的发展、尧斯伊瑟尔的理论以及费希的读者反应批评,粗线条地勾勒出现代西方文论重视读者的理论倾向。1985年7月章国锋在《光明日报》撰写了《国外一种新兴的文艺理论——接受美学》,该文着重介绍了西德尧斯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与这种主观性阐释的同时,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西方接受美学进行了理论文本的翻译。1983年6月冯汉津在《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中翻译了意大利梅雷加利的《论文学接受》;1985年1月孙津在《江苏美学通讯》译出福克玛和库恩合写的《对文学的接受:“接受美学”的理论与实践》。1985年1月《文艺理论研究》刊载了罗弟伦译介的西德格林的《接受美学简介》。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斯和霍拉勃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该书展示了接受美学产生、发展、影响的过程,探讨了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其论述全面精辟,使我们对接受美学获得了总体的认识。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又出版了伊瑟尔的《审美过程》一书,三联书店出版了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廷琛主编的《接受美学》。至此,本文接受美学的翻译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的评述和译介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设置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二、尝试阶段。其时间大致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不断移入,当代文论的研究者们也初步以西方接受美学来对古代文论作尝试性的审视与研究。1986年第五期《四川师大学报》刊发了董运庭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一文,作者从作品存在、作者认识与读者作用三个

方面探讨了“玩味”说所涵容的接受美学意蕴,颇有启迪意义。张小元则在1988年第一期《文艺研究》上撰写了《从接受美学看意境》一文,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意境并不是一种自在的稳固的存在,只有当它成为接受者艺术意识的对象时,它才真正存在着。据此,他把意境分为两部分:文本中的意境即意境结构、读者的意境即意境状态。前者具有多层次性、暗示性,是具有“召唤结构”等待读者积极参与的潜意境;后者是读者由意境结构而创造的,是读者审美的心灵中存在的境界。二者只有通过读者的妙悟直觉才能真正成为审美意境。他把读者机制引入意境,并视为意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意境理论的研究。1986年12月至1988年6月,加拿大籍华人叶嘉莹在《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从现象学到境界说》、《张惠言与王国维对美学客体之两种不同类型的诠释》、《“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文本之依据与感发之本质》等系列论文。后来由岳麓书社在1992年结集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作者主要用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来反观中国传统词学理论,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某些暗合之处。作者认为接受美学主张一切作品均有待于读者完成,否则便毫无生趣。王国维以“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来说李璟的《山花子》词,又以“三种境界”来说晏欧诸人小词,主要就是透过读者的感发,给作品赋予新鲜的生趣。这是与接受美学理论暗合之处。当然,由于中西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如何接受和反应,以及如何对之作出诠释等方面,也有极大差别。叶嘉莹曾把它概括为西方重有心的设计与安排,侧重理性的成分,中国重自然的感动和兴发,侧重感性的成分。叶嘉莹借用西方文论来探讨、反思中国传统文论,试图藉此为中国传统文论在世界文化的大座标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其努力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4月巴蜀出版社出版了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该书在挖掘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上,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的方式寻找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接受美学相通的东西。虽然在论述中对接受理论的理解未必正确,比较中西理论似乎有些牵强,但他以接受理论来审视中国古代文论,其探索精神是可贵的。1989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立元的《接受美学》,作者意在吸收、综合接受美学

各派的合理因素和独创成果,结合中国文学、美学的现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切入,对相关的重要问题作出与传统美学不同的思考和回答,初步建立了一个有自己内在逻辑联系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接受美学理论框架。其中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空白”理论与西方接受美学进行了比较,并应用到接受美学体系的建构中去。这一尝试是成功的。邓新华在1990年第一期《江汉论坛》撰写的《“品味”论与接受美学的异同观》,则把“品味”作为中国特有的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集中探讨了“品味”在作者、作品、读者所隐含的接受美学意蕴,并且从文化学的角度说明了中西接受美学思想的不同。程地宇先后在《探索》1990年第六期和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空纳万境 白多余韵》和《文之本体与道之本相》二文,较系统地论述了艺术作品的空白性特征,认为追求空白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种特质,具有“格式塔”完形审美心理效应,颇类于伊瑟尔的“召唤结构”。作者更进而探讨了中国古代美学“空白”论与接受美学“空白”论的哲学基础,显示了其文化意蕴的差异。

三、系统探讨阶段。90年代以后,随着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以接受美学为参照系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其视野更加开阔,更趋向整体化、系统化。笔者与殷杰在1992年第三期《华中师大学报》合写的《中国诗论的接受意蕴》一文,从作品审美特性、读者接受过程、读者审美期待视野的培育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诗论的接受美学特色。1992年第六期《文学遗产》和1993年第一期《学术研究》分别刊载孙立的《“诗无达诂”论》和《“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两篇文章,实则亦是讨论读者的接受思想。前篇从逻辑的角度,认为“诗无达诂”作为中国阅读活动中的一个普遍命题,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文学作品具有“片言可以明百意”的开放性结构,一方面在于读者见仁见智的积极参与和创造。后篇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展示了读者意识的流变史。1993年2月龙协涛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点》一文。同年8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结集为《文学读解与美的创造》一书。作者通过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嬗变的分析,认为

文学读解理论经历了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三个明显的阶段。在这一视野下,该书从作品的虚灵性、读者的地位与作用、创作论与接受论合流三个方面审视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读解思想,认为中国传统的审美理论虽然没有“接受美学”这一字眼,但是体现接受美学基本精神的思想材料却十分丰富,并且有着自己的特色。该书是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原则整理爬梳中国古代文学读解理论的成功之作。

之后,1994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紫地的《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该文从“兴”、“逆志”、“入情”、“味”、“悟”、“各以情遇”等接受命题入手,阐述了中国古代鉴赏接受理论的历史流变,总结出中国古代文学鉴赏重整体感受轻逻辑分析、创作论与接受论合流、强调读者参与创造的特征。唐德胜在1994年第二期《广东社会科学》上撰文《中国古代文论与接受美学》,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接受思想特征,并从文化学角度阐述了古代文论重视读者接受的深层原因。1994年第二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普慧的《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解释学思想》,文章从文献解释学的兴起、主体参与的意图解释、解释者与文本的时空距离、文本的随机性与解释的再创造性等方面,论述了古代文学批评中强烈的读者意识的萌动。

从共时的横向展开来看,以接受美学的视野审视中国古代文论,亦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从作品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诗文的空白性、虚灵性在客观上决定了读者积极的介入。针对中国古代诗文的这些特点,董运庭把它视为“味外味”,叶嘉莹把它视为“幽深要眇”,程地宇把它称为“空纳万境,白多余韵”。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特别讲究以小见大,以少总多,以简驭繁,以无胜有,追求若有若无、空灵淡远的审美风格。这种空白和简化的特性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可谓幽深绵渺,难以穷尽,具有多层性、未定性的特征。它为读者进行再创造提供了“卧以游之”的审美空间,诱发读者思之有余,久而更新。这与西方接受美学所提出的“召唤结构”有某种相通性。金元浦在1995年《东方丛刊》上撰写的《空白与未定性:中国诗学的内在精蕴》一文,认为古代艺术中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作为中国诗文化的内在精蕴,具有中国文学精神的某种全息性,既

关涉作品文本论,又关涉读者接受论。就文本看,是言与意、虚与实、显与隐、形与神的矛盾对立运动,是感兴的起端、虚实的转换、含蓄的寓意、曲致的妙着。就读者的接受而言,是对兴会的引导,对体味的召唤,对顿悟的企待和对兴象的营造。当然,由于中西文化背景、思想基础、审美视角不同,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空白论和西方接受美学的空白论又不尽相同。程地宇和张道葵分别在其《文之本体与道之本相》和《空白与接受》二文中,给予了精细的阐说。他们认为,西方接受美学的空白论是关于艺术本体论的一种现象学——阐释学的理论,而中国古代艺术的空白论则是一种宇宙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本质之道的艺术引申。所以“空白”被抽象到哲理的高度,它是氤氲邈远、生息流动、变化无端、蕴意无穷的宇宙意识。西方接受美学的空白论所引发的“具体化”只是一种阐释性活动,透过阐释达到对作品意义的把握,而中国古代艺术的空白论则是诱发特定的审美态度,它不像西方接受美学那样靠形式的推理,理性的认知来把握世界,而是以直接感悟的方式去认识宇宙之精神,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西方接受美学中的“空白”本身并不能构成审美对象,不具有稳定的审美价值,而中国艺术的“空白”因与一定的意境相联系,本身就构成了审美对象,并获得了某种价值。所以,“空”是心灵的自由境界,它能吐纳万象,破有限为无限,形成圆融的意象。

二、从作者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泛接受美学,其中作者、作品、读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从来不脱离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来孤立地考察作品,这与晚出的接受美学有所不同。西方接受美学因把着重点转移到读者的审美接受活动,矫枉过正,相应地把对文学作品的生成给忽略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接受思想在注重文学作品审美接受的同时,还重在探讨诗作生成与审美接受的关系。这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中读者接受对作家及创作过程的反馈,又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笔者在1996年第四期《华中师大学报》上发表《论中国古代文人的读者意识》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作家特别重视读者、渴求知音,空白意识、创新意识和真实意识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接受美学特色。张思齐在其《中国接受美学导论》一书

中也认为整个文学接受过程是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过程。作者企盼读者,有一种“作者难,知音尤难”的知音意识。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论强调重其人,逆其志。邓新华在其《“品味”论与接受美学的异同观》一文作了精辟的论述。

三、从读者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也像西方接受美学那样,非常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书亦国华,玩绎方美”。中国古代文论家认为文学作品虽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现实存在,但它本身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审美评价。文学作品的审美效应有赖于读者去生成,文学作品的良莠也必待读者去品鉴。这与接受美学所畅言的“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可谓异曲同工。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一书反复论述了王国维以三种境界说解晏欧诸人之小词,其意在证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是通过想象而形成的一种创造性背离。紫地和龙协涛分别在《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色》两文中,就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命题,如“兴”、“悟”、“味”、“自得”、“作者不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等给予了新的阐释,旨在表明审美接受是读者通过想象,积极与作者共同参与创造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只是重复作者的发现,而是有鉴赏者自己独到的体验。它是要求读者按照自己的审美视野来重新建构文学作品的内涵。1996年第五期笔者在《文史哲》上撰写了《中国古代诗论“入出”说的接受美学意蕴》一文,认为“入出”说是中国诗论对审美接受活动的一种独特概括。所谓“入”就是读者设身处地地进入诗作中,再现其境,体验其情,深观其意,其审美机制在于求同。具体表现为:“瞻言见貌”、“披文入情”、“得

意忘言”。所谓“出”就是读者在体验诗作的基础上,还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思维活动。读者通过想象,结合自己的“审美期待视野”,从而对诗作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其审美机制在于求异。具体表现为“熟读玩味”、“想象自得”。“入出”说揭示了阅读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规律,透视了中国诗论的接受美学意蕴。但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对读者的认知上又体现出差异性。邓新华在《“品味论”与接受美学的异同观》一文中,认为西方接受美学因受现代反传统、求创新文化的影响,过高地抬高了读者的地位与作用,不免滑向了偏激的泥坑。中国古代文论因洋溢着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中和精神,所以,在对作者、作品与读者的认识上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接受美学既不认为作者是文学作品的最高主宰,也没有无视作者其人;既不认为文学作品等同于作品的语言符号,也没有忽视作品自身的审美特性;既不认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是机械的反映,也没有把读者当作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独创者。因而,中国古代文论在对作者、作品和读者关系的认识上更富有辩证意味,从而可以弥补西方接受美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文论美学研究者通过上述“互为主观”的阐释,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和20世纪西方接受美学之间既有相通的“共相”,又有着不同的歧异性,但它们共同作为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丰富了世界接受美学的思想意蕴。这种碰撞、交流,有益于人类艺术水平的提高,也会有益于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

作者樊宝英,山东鄂城师院中文系讲师(252059)

责任编辑:陶原珂

在1994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谢非提出全省人民动员起来,为把广东建设成为教育强省而奋斗的号召,并由省委、省政府相应作出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它抓住了加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1995年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关于教育的根本大法。它的颁行,充分体现了全党全社会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共同意志,也为我们把广东建设成为教育强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

建设教育强省的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根据广东目前的人才队伍状况和“九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到2000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要达到196万人,其中,工业类33.7万人,农业类3.9万人,文教卫生类112.6万人,科研等综合技术服务类45.8万人。另外,根据广东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省

教育发展目标要做到:2000年以前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省各类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6%;2010年全省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的各类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2%。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逐步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规模、教育层次

和教育结构,建立起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共同办学体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构合理、机制灵活、开放多元、具有广东特色的教育体系,普遍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教育现代化,把广东建设成为教育强省。

教育强省的强弱,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总的来说,它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与全国各省份相比,教育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包括经费投入、师资质量、教育综合水平以及扫盲和“普九”等要居前列;二是教育要与本省社会经济同步协调发展,包括办学机制和办学效益、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要与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三是教育要与国际接轨,要达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省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普通教育,1995年我省已通过国家教委扫盲的达标验收,全省青壮年文盲率降到0.12%,实现基本

扫除文盲。省定于1996年内最后完成“普九”任务的17个山区县,10月16日已经分别通过省、市组织的“普九”评估验收,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目前,全省122个县、市、区(含中山、东莞两个地级市)均已分期分批通过省、市组织的“普九”评估验收,全省“普九”复盖率达100%。至此,广东基本实现“普九”。在高

关于依法建设教育强省的思考

□朱源星

等教育方面,以 1994 年与 1982 年相比,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增加了 17 所,在校生从 4.09 万增至 13.74 万,每万人口的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由居全国第 20 位上升到第 14 位;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 58 所,函大、夜大、电大、业大、职大等成人高校在校生由 3.37 万增至 13.7 万(未包括研究生),初步扭转了高等教育长期落后的局面。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我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基础薄弱,十多年来来的发展还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教育事业在全国所处的位置与我省经济在全国的位置比较,还是不相称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教育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广东国内生产总值等几项综合指标在全国居前列,但其高等教育的综合水平仅处于全国中等略偏上的位次。广东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185 亿元增至 1994 年的 4175 亿元,年均递增 21.5%,而同期普通高校在校生年均递增 9.34%。成人高校在校生的增长率也是这一水平。广东省 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9.53%,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只占全国的 4.9%。全省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我省每 10 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为 1388 人,低于全国平均 1422 人的水平,比辽宁省少近一半,仅相当于北京的 1/7;每 10 万在业人员中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5400 人,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 18 位。每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全国平均为 3.3 人,而我省仅为 2.4 人。大中型企业科技开发人员,每个企业平均为 22 人,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 28 位。全省乡镇企业职工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 29%,基本上没有受过系统的职业训练。人才数量的相对不足与经济发展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极不相称。

二、与全国各省相比,教育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仍有较大差距。虽然在有关评价普通教育综合实力的 91 项指标中,广东有 60 项进入全国前 10 名,其中 30 项进入全

国内前 5 名。但贫困山区的“普九”工作、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则更是广东教育的薄弱环节。以职教为例,目前我省在校生虽已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比例的 55.6%,但部分职业技术学校却是有名无实,有的甚至只是挂了块招牌,教学质量及办学效益令人担忧。据统计,现在我省职业中学平均每校学生数仅为 27.4%,职业中学平均每校学生数及班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数。高等教育虽有较大发展,1993 年我省普通高校数量在全国排第 13 位,每万人口拥有在校大学生 20.8 人,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数字与台湾、韩国相比,差距则更大。这不仅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成为教育强省的极大障碍。

三、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紧缺,年龄结构老化。我省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中,初级职称占 64.5%,高级职称仅占 3.6%。中国科学院士 10 人,工程院士 3 人,博士点 94 个。博士后流动站只有 11 个,占全国总数 244 个的 4.5%,在全国排第 12 位,在站人数 80 人,占全国总数 1000 人的 8%。到本世纪末,现有的高级专家中 90% 将达到退休年龄。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力量薄弱,40 岁以下的高级职称人员只有 1298 人,仅占高级职称总数的 3.3%。有些国内生产总值少于广东的省份,拥有的院士、博士导师和各类高级专家却远远超过广东。这都说明,我省高层次人才的实力与广东的经济地位仍不相称。

以上事实均说明,要建设教育强省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加大力度促进教育的发展。

二

在我国法制逐步健全的今天,依法兴教是建设教育强省的有力保障。

《教育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工作和教育经费预算、决算情况,接受监督。”这是事关教育事业发展的,确保依法建设教育强省的重要法律规定。它从法律上

明确了人大对政府教育工作监督的职责和权力。

当前,加强和完善人大对政府教育执法的监督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无论是工作方面的监督还是执法方面的监督都是人大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要依法建设教育强省,如何加大监督力度呢?我认为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尤其要重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这是建设教育强省的关键。《教育法》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法律确认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最核心的内容应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在制定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时,保证发展教育事业优先;二是在安排年度财政预算时,保证教育经费投入优先;三是在规划城乡建设和制定年度基本建设计划时,要考虑学校布局,保证学校用地和基本建设优先;四是在开发重点工程和提高科技产业时,保证人才培养经费的安排优先;五是配备干部时,选拔优秀得力干部到教育领导岗位优先;六是改善教职工住房、福利和医疗方面待遇时,保证落实教师待遇优先。如果在上述六方面不能满足教育的需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会落空。各级人大监督的着眼点应是检查监督同级政府依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

二、在执法检查中,要坚持省检查与市、县(区)自查相结合,上下齐动,形成声势。一般在法律法规实施一年左右就下去检查,督促学习、宣传和实施的部署工作;实施二年以后,再下去了解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帮助整改。执法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当集中力量,精心组织,以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组成人员要精干。要提高透明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及时宣传、报道执法检查情况,弘扬执法正气,对一些严重违反教育法律法规

的事件要予以曝光。

三、要特别检查监督的重点和难点。教育投入,历来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是法律制定和讨论的热点部分。在《教育法》中,教育投入的条款约占五分之一,可见其重要。教育财政拨款“三个增长”的原则,是确保教育投入的重要原则,也是衡量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又一重要标准。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最近联合对1995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执行情况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达1028.39亿元,比上年增长16.34%;去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8.58%,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仅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2.24%。全国有14个省、自治区的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幅最大的是西藏,达30.46%,而广东仅为8.88%。各级教育的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也有了明显提高。1995年,全国普通初中和普通小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分别为492.04元和265.78元,比上年增长9.25%和12.59%,其中农村普通初中和普通小学生人均事业费支出分别为392.59元和219.31元,比上年增长6.86%和10.38%。这两项经费增长最快的是上海,分别达到25.92%和34.73%,广东只分别达到21.38%和18.15%。全国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分别为985.23元和897.42元,比上年增长11.61%和6.62%,增长最快的是西藏和新疆,分别达到87.25%和90.78%,广东只有14.18%和14.49%。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为5442.09元,比上年增长7.82%,此项经费内蒙古增长最快,达37.01%,广东仅为1%。1995年,全国普通初中和小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增长29.69%和28.54%,增长最快的湖南、湖北达96.21%和99.72%,广东只有23.49%和12.27%。全国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增长30.52%、28.07%和13.39%,增长最快的江西、新疆、

内蒙古三省区分别达 161.15%、150.90% 和 53.03%，广东只有 42.63%、25.27% 和 10.10%（根据 1996 年 10 月 7 日《中国教育报》第二版《1995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分析整理）。显然，这跟广东的经济实力比较是很不相称的。全省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 12.27%、23.49%、42.63%、25.27%、10.10%，考虑到上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有些方面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实为明增暗降。我认为，要落实财政中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就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做到真正增长，预算增幅必须考虑物价增长因素，不然，“三个增长”就没有意义。

今年，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生委员会配合全国人大把检查监督教育投入作为《教育法》执法检查监督的重点和难点。检查监督内容分五个方面：是否做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长；是否做到“三个增长”；教育经费支出是否做到事权和财权相统一，财政预算单独列项；教育费附加是否足额征收，并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合理使用；各级政府是否向本级人大或常委会报告教育经费预算、决算情况，并接受监督。今后，还应重点检查监督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效益问题、教育乱收费和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等重要问题。

四、要逐步改变检查监督方式。目前的检查监督方式是以上级人大对下级政府为主，这已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法律检查监督的一种经常的、重要的形式。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普遍运用这一检查监督形式，不断加强和改进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检查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究其原因，检查监督下级容易，检查监督同级难，归根结底是怕影响关系。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进一步学习和深刻领会《宪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的精神，结合自身的实际和教育工作特点，逐步改变检查监督方式，做到以检查监督同级政府为主。

五、要在检查监督政府进行整改上下功夫。这是执法检查监督是否能取得实效的关键。当前，各级人大在对政府教育执法的检查监督工作中，提出建议和希望多，提出具有约束力和限期整改的意见与决议较少；自始至终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的更少。各级人大应当按照《宪法》和《组织法》，完善和严格对政府的监督程序，加大检查力度。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组不仅要听取同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执法情况汇报，还要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实际检查，掌握执法的真实情况，研究存在问题。执法检查报告要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并回答询问。常委会要提出审议意见或作出决议，以书面形式连同执法检查报告交同级政府。政府应切实改进执法工作，并在六个月内将改进措施和效果向人大常委会或者教科文卫委员会作书面报告。必要时，政府的书面报告要由常委会审议。

六、要进行实质性监督，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权。对政府教育执法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不仅要听汇报、视察，还要对违法案件进行质询和询问，政府有义务提供信息或情况。人大对政府的检查监督，关键是对违法案件的处置（作出决议、组织调查委员会、提出批评和受理申诉）和实施制裁（对违法或失职的政府领导人进行罢免、撤职、免职、接受辞职、撤销违法文件）。对违法大案要公开，并依法处理，维护《教育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要建设教育强省是十分艰巨的。但只要加强党的领导，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教育法》，依法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建设教育强省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朱源星，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510080）

责任编辑：陶原珂

步出书斋*

□徐中玉

国华同志将分专题汇集出版他近十多年来在古代文艺理论批评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更广泛地公诸社会。他的这些成果,历年在专业学术刊物发表后,已深受同行注意,得到好评。对他多年来的勤奋,取得这些硕果,我都深感欣喜。他的论文也给我不少启发。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已有相当显著的进展,无论在资料的蒐集整理,还是在专题或系统探究方面,不但成果数量增加,质量也颇有提高。这是很可喜的事。但有个问题,即如何贯通古今,融汇中外,使研究能有广阔的视野,既总结过去,发现规律,又关注现在,把丰富的艺术经验与知识积累,得以真正成为开拓前进,繁荣当代文艺事业的宝贵资源,实还有待进一步有所建树。研究古代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今天的需要。认识懂得了过去,就便于站在历史的顶峰上,高瞻远瞩,开创未来。凭借前人的优秀遗产,研究古代的学问,既不能就事论事,脱离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背景,亦不能脱离现代的时代实际,改革需要,满足于成为一种书斋之学,仅在少数同行圈子里起一点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既知古,也知今。所知之古,不仅是往古的文论本身,所研之古,也要知其已经到达的程度,还有哪些局限,应如何进一步发展,理解中间蕴有何种普遍合理的因素。用力的重点可以在古代,却也需要知道今天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关注存在的问题,经常想到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那些历史经验与合理观点,同今天感到的新问题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是否能够从中取得解决的借鉴。如果经常保持这样的自觉与关注,我认为就有可能突破彼此孤立,似乎原可不必相关的隔膜状态,以致很少融通,难于在总体上迅速打开局面,使书斋之学发挥出很大的潜力,成为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事

业。我深深感到,学科发展之所以都有螺旋形上升的态势,即因古今中外的学问,特别像文科的学问,当然包括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在内,虽有时空的距离以及民族思维方式之类的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确实存在许多共同性,某些规律至今有其巨大生命力,使得存在过并且还会存在下去的上述某些差异,显得乃是比较暂时,局部次要而非决定不变的东西。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互补不断增加,和平发展的趋势无可阻挡,人类社会共同前进,趋同倾向已愈来愈明显。优秀文化遗产中存在有可为今天发展之帮助的因素并非只是可能性,而是确实有许多可以加以运用。很多蕴含在文艺精品中的丰富内涵,至今尚未得到开掘。实在说,艺术创造的感悟,审美经验,绝不都是后出愈精的,并不是时髦的一定高明,虽然我们也需要鼓励创新。创新的动力有时也在于从古代资料中取得启发,进行了比较,同从前人遗产中取得参照、借鉴毫不矛盾。我们再也不能划地自限,止于一隅了。要做到这一点对谁来说都不容易,但如在观念、习惯上来个转变,不断共同努力下去,我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

国华同志这部著作,是努力地结合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各个时期哲学、宗教、历史、伦理等广泛的文化背景以及创作实践来进行分析的。对问题的理解、探讨比较深入。由于文艺各领域的理论批评有更多共性,可以互相证明的东西多,所以他在讨论文学的时候,随时兼及古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等领域的理论批评,因而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他对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情况,存在问题等也颇关注。我很赞赏他这样的研究方法。循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相信他能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匆匆写这些话,略表我对国华同志多年认真努力已取得重要成果的喜悦,并重申我对这项研究的一点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 本文是为阮国华《中华古代文论溯源》写的序,题目为编者代拟。

作者徐中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200000)

责任编辑:童 轩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

——读《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有感

□高齐云 黄椰婴

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结合,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丘挺、张先贤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以下简称《市场》),正是这个研究热潮的最新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哲学与经济学可以实现结合,而且为二者实现进一步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多方面的启迪。我们力求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目的是为了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运动规律,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这正是《市场》提供的重要启迪之一。

坚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市场经济哲学,首先必须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过程。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逐步形成、发展的。因为这样,有的人陷入认识的误区,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和特殊标志。邓小平突破了这个误区,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据此,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是,有的人却陷入了另一个认识误区,以为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是不确切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分配手段和经济运行方式,是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结合,才能实际存在与发挥作用。《市场》一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且阐述了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这是应该加以

肯定的。然而,坚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就必须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际、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化运动,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历史上未曾存在,但现在却在我国生成中,是通过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建设实践而生成着的新事物。自觉地看到、承认这一点,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其次,坚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市场经济哲学,应该把市场经济的一般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结合起来,揭示、阐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内在关系、矛盾以及相应的理论范畴。在这方面,《市场》一书也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个性、市场经济的二重效应、“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的有序和无序的辩证关系等的阐述,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和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矛盾和相应的理论范畴。不足的是,该书的阐述带有静态和平列的特点,没有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主要矛盾和在它的运动、转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范畴之间的联系。为了做到这点,应该先寻找、确定这个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时,以商品范畴为起点,阐述商品——货币——资本的转化,再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具体的运动。我们

认为,从共性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也应该以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但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是和不同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制度结合的,故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所包含的内部矛盾也有不同,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探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品内部的主要矛盾必然受这一整体特征的制约。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0页)他还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同上,第679页)在这一目的和绝对规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商品的内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包含在商品价值内部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资本主义商品的矛盾胚芽的发展,逐步演化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各种矛盾与相应的范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从整体上看,它不以生产剩余价值和榨取剩余劳动为特定内容与目的。不断增加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细胞的内在的主要矛盾,就主体方面来说,是包含在其内的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由这一矛盾胚芽演化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以及相应的范畴。例如,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生产目的、企业自主经营与国家宏观调控、市场信息与企业反馈、平等交换与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科技进步与市场占有、市场建设与精神文明以及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等。所有这些,都应通过深入的研究,揭示、阐述它们与起点的联系与逐步转化。

再次,坚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市场经济哲学,还必

须研究、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改造,以实现互相适应、互相结合。在这方面,《市场》一书阐述了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与道德观和价值观、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为进一步深化有关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我们认为,为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要素,与其他方面、要素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一般看来,发达的社会经济制度由几个重要方面组成。一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的劳动方式;二是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组合成生产关系制度;三是以协调生产中各种关系为目的的,如包括生产任务的制订、生产者的调配、生产工具的运用、产品制作的要求等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四是以资源分配、商品交换等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社会经济制度以上的几个组成方面,其地位、作用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必须是互相适应的。因此,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完善、有机结合,必定要经历过互相摩擦、互相改造,才能做到互相适应、有机结合。第二,把握市场经济与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实质。上文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同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前者规定后者,后者必须适应前者的需要,这是处理它们的关系的首要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是离开唯物主义。第三,在承认上述两点的前提下,必须看到市场主体对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具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内在素质(如一定的文化科技水平、独立自主的活动

内容丰富 刻意求新

——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

□魏宏运

历史创造了孙中山,孙中山也创造了历史。他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其思想曾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其遗产迄今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孙中山逝世 70 多年来,中国和世界众多学者都在研究他的思想和事业,发表了大量专著与文章。现在刘曼容博士又撰写了《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一书,展现在读者面前。

国民革命是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他在遗嘱中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可以了解其思想的实质与根本。刘曼容博士以此为主题,阅读了孙中山原著及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从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角度阐述了孙中山思想的产生、历史活动及其功绩,回顾了孙中山仿效西方模式革命的历史,以及从护法运动走向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理论与战略的制定、国民革命物质力量的奠基、民国革命从广州推向全国、全国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比较系统的综合研究,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孙中山一生连续不断的崇高感情、追求与事业。

孙中山胸怀远大理想,努力在中国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时时刻刻都在研究中国

和周围世界。他对周围的环境从不屈服,总想制服它、改造它,多次遭到失败也不气馁,而是继续组织反攻。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奋起,每一次都有所不同。他的思想总是随着社会的潮流不断前进。这部书的突出之处,是把孙中山与国民革命置于中国社会总体性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既置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又置于整体世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横向考察,这就比较容易揭示孙中山思想的内在联系与外在联系,阐明其思想是怎样在历史发展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

关于国民革命始于何时,是颇有争议的问题。该书明确宣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国民革命,只有国民党一大后才真正开始了具有广泛性色彩的国民革命。

该书作者认为,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独到之处是其非西方模式、非俄国模式的独特革命。这个革命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新旧民主革命过渡交替的中介和桥梁,不能单纯以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眼光来看待,也不能单纯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视角来看待。他在仿效

能力、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等),对市场经济的性质、规律、原则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善于把主体的“内在尺度”与市场客体的“对象尺度”统一起来的市场主体,才能成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动的主导的力量。否则,就只能发挥扭曲、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面对当今的现实,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市场经济实际活动中出现的种种扭曲的畸形的现象,同时加强理论的研讨,维护、引导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良性运动。

我们期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更深入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哲学作出新贡献。

作者高齐云、黄椰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冯 生

西方模式中有许多独特性创造,如既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主张师法俄国,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通过坚信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强调中国革命的先行性和三民主义的先进性,以及坚持平等待我和有选择接受的原则,从而坚持了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保持了中国革命的独立性。这两方面问题,是众人所熟知的,经过作者予以理论的说明,就更清楚了。

孙中山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何看待五四以后,孙中山对新思潮、新阶级力量冲击之回应呢?作者认为,既有顺应潮流的一面,又有主宰潮流、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意识。顺应潮流不是随波逐流,是在回应中不丧失自我,始终保持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国民党的主体性。如在组织上坚持大国民党主义,思想上恪守三民主义,在国共合作中强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等。

事物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仅以某种因素说明,尽管这一因素比其它因素的影响更大。该书采用主体研究方法,运用合力因素阐释国民革命的兴起,从直系军阀贿选、广东讨伐陈炯明军事失利、西方列强激烈反孙的态度,到苏俄开始实质性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

国民运动、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要求合力救国等方面展开论述,使这一历史过程更丰满、形象和具体。

孙中山晚年政治思想上最大的突破是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个问题,近几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该书指出,三大政策的文字未见诸于国民党一大宣言,却是一大会议期间通过演讲讨论形成的既成事实,它是在否决反对意见,以及其它文件作出规定时以特殊形式确立起来的。

一部好的作品总是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以汲取资料、发掘资料到分析、沉淀以求真知方面,都是下了功夫的。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描绘了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在孙中山研究领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人们总是希望从众多的资料源泉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从不断研究的成果中深化自己的认识。孙中山研究在今后学术交流和探讨中,必然有更大的突破。我们期待作者不断努力,创出新的力作。

作者魏宏运,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300071)

责任编辑:林有能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创造性成果

——评苏新春的《当代中国词汇学》

□宋永培

苏新春的新著《当代中国词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出版)从文化语言学的视界对本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作了有价值的归纳,对当代中国词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作了创造性的探讨与阐释。这对于清除西方语言学研究模式对中国语言研究的不良影响,建立有中国特点的中国语言学和中国词汇学,是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的。

一

作者从“语法研究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兴衰史来考察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进程,其背景广阔,线索明晰。作者指出:《马氏文通》“以西方语言理论为基准”的学术规范在研究的内容、方法、目标上给现代中国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定下了框框,同时,“这种习惯于向西方寻找理论支撑点的作法影响了汉语研究的几代人”,导致中国语言的现代研究“走上了纯形式化的道路”,而与人有关的、与语言的文化功能有关的研究则基本上没有开展。在近、现代之交,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西方文化思潮的长驱直入,以及“五四”狂飙对传统文化的震撼荡涤,造成了近百年中国语言学在发展中处处与中国传统语言学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传统语言学(简称“传统”)是以语言与历史、与文化的密切结合来对文、史、哲、语作整体贯通的研究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简称“现代”)却把文、史、哲、语强行割裂,抽掉了历史、文化的精髓,作尽量单一的、纯形式的研究。“传统”是以训诂、词义为基础、为重心进行汉语研究的,“现代”却在力图排斥、回避训诂、词义的前提下作照搬西方模式的语法研究。“传统”是以先秦语言为源头来进行古今贯通的研究的,“现代”却在切断了先秦源头的条件下搞近代、现代汉语的研究。苏新春此书清醒地把握住这种背景与线索,从学术代表人物、传统研究与现代

派研究的关系、研究成果、词汇学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等方面加以考察,就词汇研究观和方法论进行剖析,认为汉语词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的前 80 年中处于未曾充分展开的次要学科的地位,人文性词汇研究最为薄弱,五、六十年代虽有功能的研究、结构的研究在词汇学界冒头,但都未能形成气候。这些客观、公允的分析,具体地展示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传统词汇研究的延续和发展”、第二节“社会功能派的汉语词汇研究”、第三节“结构形式派的汉语词汇研究”、第四节“汉语词汇人文性研究的萌芽”等篇章中,其见解之透彻、论说之明晰颇能使人佩服。

作者肯定了传统词汇研究在努力成长为独立的学科,关注于历史词源学理论问题,扩大研究材料的范围等几个方面的成就,同时指出,传统词汇研究的基本方法仍是诠释注疏式的,理论性研究的开拓面不广,词汇研究的学科化、独立化还远未成熟等等。作者还揭示了结构形式派的汉语词汇研究主要关心的是“词语的形式标志”和“词的内部结构”两个问题,其“所侧重的是词语的结构特征与规律,而不是词语的意义特征与规律;即使在涉及到词义的研究中,也主要关心理性味浓重的概念义、指称义,或是比较抽象化、规则化的语法义、搭配义”。

该书对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大势以及各派的特点、得失所作的评价不但能究其底里,在表达上颇有分寸,而且善于从中总结出理论性的认识。通过对词汇研究中各个派别的评论,进而阐述汉语词汇人文性研究的萌芽及其特色,指出其中对史的研究、不同民族词汇的对比研究较多,解释性的特色很明显。在此基础上,该书将认识加以升华,提出了几条重要的有关汉语词汇研究的规范:(1)把词汇学置于它应有的基础学科、综合学科的位置。(2)词汇研究不能照搬语法学的

方法,研究词的形式时,应以词的意义为核心。(3)必须对词汇进行独立的全面研究。(4)研究汉语词汇应有自己的词汇理论作指导,不能照搬西方语言理论。这些有价值的见解,得之于作者对汉语词汇史的深入剖析,以及作者在开展汉语词汇研究中的敏锐眼光与坚定信念。

二

苏新春此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优点,就是能够总揽现、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全局,详细收集与这种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材料和论著的材料,善于去粗取精,梳理经纬,在此基础上详说之。此书有重点地论列大批新型的论文与著作,认为这些论著实践了研究词汇必须从词义入手,必须以词义深层的人文内涵作为主导这一重要的学术规范。通过这种论列,该书深刻地展示出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词义化趋势和人文化趋势。

顺应着这种趋势,凭借着对词汇词义实际材料与学术规范的思考,作者对当代中国词汇学的理论、方法作了一系列的探索、论证、概括,不少见解具有创造性的价值。

关于语义为主、语形为辅的语言结构观,作者认为:词语的意义不但是指经由语音形式表达的对象,也指经由语法形式、文字形式表达的内涵,还指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赋予词语的各种文化意义。词语的意义可以划分为表层义、深层义、语法义、文化义四种类型。所谓汉语词的文化义,作者在阐释结构与人文相统一的语言本体观时论证说,就是通过词的意义和词的形式所反映出来的汉民族文化的种种要素。

关于汉语词汇人文研究的层次,该书分出“词语单体、词语类聚、词语形式”三个层次,指出单音词在其中处于基础的与核心的地位。作者对这些词汇单位内在的文化因素逐一考察:从词语的产生、消失考察文化因素的决定作用,从词语命名考察民族的思维方式,从词义演变考察民族文化的延展等。对于词语类聚,作者指出,汉语基本词汇长期存在于一种宽缓不迫、连续不断、自我繁衍的文化氛围之中,因而形成高度稳

定的特点。至于词语形式,则更多地受到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影响,其人文意义要比词语单体、词语类聚来得抽象和隐蔽。谈到复合词时,作者论说了复合对象的文化选择、复合方式的思维模式与观念意识,以及同素复合词的文化背景。以复合词的从众心理为例,一个新复合词产生时,对于词素的选择以及它的构成方式总是呈现“随大流”的倾向。例如“坛”本来指古代用土筑成的高台,多用于祭祀。它的意义特点是地势高显、场面盛大、引人注目。所以,后代就造出了“祭坛”、“论坛”、“文坛”等复合词。今天大批出现“政坛”、“报坛”、“拳坛”、“泳坛”、“足坛”等词,显然是从众心理在起决定作用。

关于研究方法,该书认为,在语言结构与人文意义的关系上,应以“参照”为手段,“认同”为目的。在词义与词形的关系上,应由形及义,相互参证。作者还挖掘多种汉语词义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认为这些方法的演进反映出人们的认识由词义外部深入到词义内部,由单个词义扩展到众多词义的相互关系,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模糊的揣度趋向于精确的把握。

三

当代中国词汇学,只有凭借着中国几千年传统语言学 and 传统学术研究的广远深厚的根基及辉煌的成果,并且在当代磨砺其包容中外的学术眼光与创造精神,才可能坚实地得以确立。本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融贯中国传统语言学与传统学术的根基和成果方面尚多欠缺。对古代词义的解释也存在着失误。在引文与表述上时有错失,如引用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时刚好漏掉了其中重要的几句,致使引文与原文的含义刚好相反。又如把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写作《读书笔记》,把东林党人顾宪成说成是顾炎武,误认“机械”之“機”是《说文》之“机,木也”等等,凡此等本可避免的疏忽,使得本书留下了一些遗憾。

作者宋永培,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6100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坚定信心 抓住机遇 再上台阶

——广东省理论工作会议综述

□刘小敏

4月10日至11日,广东省理论工作会议在广东省番禺市召开。会议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本钧主持,广东各地级市市委宣传部、省属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单位和其它有关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在会上作了题为《抓住有利时机,紧密联系实际,把我省理论武装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主题报告,与会代表在讨论中广泛交换了意见。现将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要认真总结广东理论工作的成效,坚定信心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近两年来广东理论工作成效显著,大家应该坚定信心。归纳起来,广东理论工作的经验体会主要有五条:

一是领导重视是搞好理论工作的关键。省委常委中心组每年在自学的基础上集中学习3至4次,交流学习理论用理论的情况和经验体会。1996年7月,省委还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建立和健全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的决定》。在省委的带动下,各市、厅局一级抓一级,坚持和健全了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是理论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广东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

大局并密切配合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深入地总结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研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做了大量工作。

三是理论工作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广东各地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一批有质量的理论著作、文章。如由省委宣传部、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共同策划组织,省内近50名专家集体攻关撰写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丛书》首批12部著作1996年出版后,北京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主要新闻媒介给予了充分肯定。丛书还获得中国图书奖第一名。

四是理论工作必须寻求有效的形式和渠道。广东在理论学习方面和理论宣传方面,积极探索多样化、生动活泼的形式,尤其是探索运用文艺和电视手段进行理论宣传工作的新路。

五是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队伍。在广东,从省委宣传部到基层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理论工作队伍建设,扶持优秀中青年社科理论工作者,对加快社科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与会代表还认识到,广东理论工作的现状,与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与中共广东省委的期望和广东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进一步作出努力。

要正确认识当前理论工作的形势,抓住机遇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前,广东的理论工作正面临着好的形势,大家应该抓住机遇。形势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邓小平理论在党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我们的理论工作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光辉的旗帜。代表们认为,邓小平同志虽已与世长辞,但他崇高的品格和宝贵的思想,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高举起邓小平理论这面光辉旗帜,而且这一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在广东正在日益深入人心。这是广东理论工作深入持续发展的最为有利的思想条件。

二是全党学理论、讲理论、用理论的大环境已经初步形成,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等广东也已出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就为理论学习的深入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近年来,经过全省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和全体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广东理论研究已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的局面,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广东理论宣传也探索了许多新的方式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就表明,广东的理论研究、理论宣传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正在朝新的高度迈进。

三是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既渴求和呼唤着理论的指导,又推动理论工作向前发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新阶段。当前,广东在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两个文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澄清一些理论是非问题,以更好地坚持

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而科学解答新形势下的许多新问题,必然会使理论工作出现新的突破和发展。

要努力增强开拓前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上台阶

为使广东的理论工作再上新台阶,于幼军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当前广东应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正确把握和准确宣传邓小平理论。要加大力度,掀起新一轮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要有计划地组织一批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阐释邓小平理论基本观点,解答人们关心的理论问题的文章。另一方面,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倡导和推动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紧密切联系广东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要紧密切联系广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实际问题,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要紧密切联系广东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的实际,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于幼军强调,当前广东理论宣传工作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把握基调,不受干扰。当前广东理论宣传的基调,就是坚决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定地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二是正面宣传,不搞无谓的争论。要正确把握理论与理论宣传的联系和区别;要继续坚持先干后说,看准再说的原则;对思想理论界出现的一些“噪音”,对来自“左”的或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想、思潮,我们应该掌握动态,见微知著,心中有数、沉着应付,坚持正面宣传引导,理直气壮地宣传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中去。

“审美心理流变与文化转型”

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学兰 朱艳卿

广东文艺心理学研究会和华南师范大学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心于1996年12月28日举行了“审美心理流变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来自华南师大、中山大学、广州美院、《学术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审美心理流变与文化转型”这一主题，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审美心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当前广东审美心态与文化走向、中西审美心理碰撞与文化选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综述如下。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审美心理关系的阐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心理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今后的发展趋势？与会者各抒己见。

刘伟林(教授):市场经济与审美心理有密切联系。市场经济的独立性、自由性和竞争性,促使了人的审美心理需要的个体化、自由化和多样化。但市场经济的负

面又给人类造成“精神的污染”,如人的物化、价值的扭曲、审美力的丧失等,需要从精神和心理上加以疏导和治疗。

王宏维(教授):经济体制的变化决定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审美价值作为价值体系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无疑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例如日常消费行为。从总体上说,与经济相关的审美价值观念变换是正向的、积极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这还需要正确的引导。

潘智彪(副教授):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是与审美文化相抵触的。商品社会中经济奇迹的获得往往是以牺牲审美文化乃至整个精神文化为代价的。市场经济是在功利目的的牵引下,以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准则。正是由于这一准则,才造成了人们普遍的浮躁心理,它只能产生浮浅的消遣文化和快餐文化,而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审美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努力而且完全可以避免出现

三是围绕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召开两件大事,深入开展理论宣传教育活动。四是加强指导和协调,形成全省理论宣传合力。

于幼军的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大家还就如何加强我省理论工作提出了一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要特别注意用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来证明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我们不应以书本去框现实,而应以实践去检验真理。二是要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一些关系。如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关系上,“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但研究成果一旦发表就具有了宣传功

能,而不发表又难以发挥其作用,具体如何把握大有学问。又如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与舆论支持的关系上,也有个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否则不仅不能帮忙,而且会添乱。三是要加强对理论工作的业务指导,努力建设一支高效精干的理论工作队伍。高校的同志希望能长期得到宣传部门的业务指导;各市的同志则希望多派些专家教授到基层,并加强理论前沿信息的传递。

作者刘小敏,广东省委宣传部(510082)

责任编辑:童 轩

一般市场经济的这种弊病。

刘斯翰(副研究员):审美是人类的一种需求。每个个体需求从本质上说,既是相互之间有差异的,就其自身而言也是多层次的。因此,审美需求就会有层次之分,强弱偏胜之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满足人们(包括群体和个体)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向度的审美需求提供了良好条件,大大推动了审美文化朝着丰富多样的方向发展。这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一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当代中国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建构。

刘学兰(讲师):在文化转型期,人们的审美社会心理发生着深刻变化,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多元共存(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上),小型群体(体现在审美主体上)和非线性互动(体现在传播过程上)。从总体上来说,当前审美社会心理的变换促进了审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大众审美文化的繁荣。当然,对于相应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容忽视。

汪放(硕士研究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科学的发展揭示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美,另一方面美的精神却离人越来越远。由于美常常依附于商品或以商品的形式流通,人们心安理得地对美进行消费,导致人们对美本来应有的崇敬感被交易关系稀释了。我们只有对美心怀崇敬,才能最终接近美。

刘伟林: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我们正由物理学时代过渡到生态学时代。在生态学时代,审美精神是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重要标志和最后依托。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的进步,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比较美学、比较文学的时代。总之,审美文化在21世纪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如何看待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存在已为人们所承认。但究竟应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形成大

众文化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确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

陈少华(副教授):大众审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象征。大众化的审美活动为许多人的平等、体验的欲求提供了一个场所——虚拟的要求可以在虚拟的体验中得到部分的满足。当然,大众审美文化也带来了其局限性——表面的丰富和本质的贫困。但也应当看到大众审美文化之所以发生的更深层的心理和动机,肯定其中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欲求。

柯汉琳(副教授):世俗文学在消解文化专制主义,在创造多元化的文学格局方面以及使文学走近平民百姓方面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世俗文化一旦泛滥成为文化主流,那将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不幸与灾难;世俗文学一旦走向庸俗化,世俗文学也必将面临自身的毁灭,其社会价值必将化为乌有,这对于整个文学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邓志远(副教授):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很难互补。世俗文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世俗文化也不能由精英文化同化或指导,它应当有自己的传统与创作规律。如果要把两者强行互补、融合,就会阻碍艺术的发展。

金岱(教授):目前文学的至大使命应当是,重新要回文学的真理性来!文学固然不应该是唯政治功利的,但也不见得就只能是唯形式和纯消遣的。或者说,文学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形式的和消遣的。但更可以是真理的,且最重要的文学一定是真理的。艺术的真理不仅用头脑,也用血肉,用骨髓,用灵魂,用整个身心来思考。正如伽达默尔所云:艺术“能把握我们整个存在”。

三、当前广东审美心态的特征

广东的改革开放使这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对广东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东审美心态具有什么特征,广东审美文化走向如何,

这是与会者所关注的。

朱艳卿(助教):当前广东审美心态的五个较为显著的特征是:多样化、娱乐化、传媒化、消费化与趋热化。这些特征的产生与市场经济给广东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变化是紧密相关的。这几个特征的出现也表明广东已存在大众文化。应该说,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刘伟林:商品经济越发达,大众文化就越加占领着文化市场,就越加发展。广东当前的审美心理具有世俗化(题材),平民化(对象),边缘化(作用)的特征,其追求的是娱乐性,休闲性和刺激性。

王宏维:近年来广东经济发展较快,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文化思想素质方面的进步不完全同步,文化品味滞后,加上注重实利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文化的消费娱乐功能强化,教化熏陶功能弱化,社会审美价值显现某些粗俗化、商业化、流行化的倾向,具有深刻内涵的、高雅的、崇高的审美取向还有待引导和培植。

谭天(教授):广东美术整体风格最大

的特征是实用主义。实用的艺术理论导致实用的艺术情趣,实用的艺术情趣导致实用的艺术手法。美术家在创作上迎合大众口味,追求时尚承认的技法,缺乏某种探索和创新。广东美术给大众的是那种一看就懂的通俗艺术,给大众创造的是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团温和的气氛,一丝甜密的感受,一种愉悦的情绪。在这里极难找到一种悲壮的美,极少能找到一种崇高的美。因此,广东美术为实用价值笼罩着。广东美术昨天走过的实用的路程,很可能就是今天全国美术要走的路。

邹长海(副教授):西方音乐审美观,强调音乐审美是主观意识的反映,注重主观审美想象。而中国音乐审美观,则较强调音乐是自然美、社会美及生活美在音乐作品中的反应。中西音乐审美观的这种差异,也是我们认识和分析时下审美文化趣味时应予注意的。

作者刘学兰、朱艳卿,华南师范大学讲师(510631)

责任编辑:童 轩

本地学界刍谈“广东社会语用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大潮与跨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有力地冲击了相对较为封闭的语言环境和语用模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语言现象和问题。为了促进“广东社会语用建设”的研究,1997年3月28日,由何自然先生牵头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社会语用建设”课题组和《广州日报》理论版和英文版、《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组织了“广东社会语用建设”座谈会。来自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广州教育学院等高校的24名学者及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高一虹、河南大学徐盛绥参加了座谈。

与会代表分析了广东(特别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运用方面的形势变化,注意到在不少公共场所、传播媒介、以及一些新兴的信息环境中出现的语用现象,它们反映出广东的社会语言心理受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失范、大众的语文素质低、文明素质低等问题,因而有必要加强社会的语言文化素质培养,加强广东的社会语用建设。

有的代表指出,目前由于来自北方地区的各种专业人才和大量民工涌入广东,为广东人使用普通话增加了许多人际交往的机会,有效地促进了普通话在广东的推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粤语作为广东的代表性方言,在经济活动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位越来越高,又使一些崇拜粤语的人以懂粤语为自豪,以此为一种身份与身价,或赋予粤语以某种特权,甚至会鄙视不懂粤语的外地人。这是一种语言拜金主义的心态。

有的代表则指出,随着对外开放和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和书面语言都受到外来语(特别是英语)的介入,外语词汇不加改造地直接嵌入汉语中使用的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语言

中已经成为“时髦”的标志,在普及型的科技报刊读物写手那里也已成为圈子中的语言时尚。这种现象大有泛滥之势,已经明显地妨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交际和阅读。因此,不少与会代表感到,有关部门很有必要对这些现象作一番全面的摸底考察,积极引导,及时清理,使我们的语言运用能够更自然、通畅,使汉语的发展更健康、纯洁。

语言使用还在诸如广告、路牌、启示告白、标语口号以及单位名称等方面,更广泛地构成社会语言环境。会上有学者披露了目前广东不少社会语言环境中误用中外文,或滥用外文与拼音的现象,认为它们在语文上反映出我们整个社会的许多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现实,有损于我们正在建设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为此,会上有学者迫切地呼吁,尽管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善我们整个社会的语用环境,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口岸、广场、交通等方面的语言使用状况,实在有尽快采取纠偏勘误措施的必要。

从语用研究学科的特点和社会语言现实的角度出发,有的代表认为,作为一种语言规范行为,社会语用建设也应该关注到言语者、语域和语境等因素,从言语者的角度来看,社会语用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应该着重从根本上促使人们重视语言文字的运用,提高语言素质。目前,应该注意发掘和发挥双语(或多语)人才在广东社会语言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从语言使用的范围来看,目前似乎还存在着对语言规范“北严南宽”的倾向,为了使语言规范适度,看来语言规范化的工作应该对语言采取分区与分层对待的策略。比如,在广东这样的多方言区里,除大力推广普通话、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外,也应该允许使用方言,允许方言文化与共同语文化共同发展;对书面语的规范标准的

要求不能用以规范口语：书面语的要求可以严一些，口语的要求可以松一些；对文字的要求可以严一些，对语词的要求可以宽一些，特别是在目前大量词语处于活动新变的时期，不宜轻易判定词语的形变正误。新词、译词出现之后，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能够定形，但是，如果大量存在不定形的语言因素，又会影响语言的使用和交际，因此，待新出的词语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制定语言规范的部门又应及时整理、制定出词语的规范来，以便我们的语言能够得到必要的整合，健康地发展。

从现实语境的角度来看，对正规场合语言的要求应该严一些，对非正规场合语言的要求可以宽松一些。对文类的语体要求也不妨可以区别对待，对于法律、公文、

社论、新闻、创作、论文等的语言规范可以严格一些，对于某些特殊的行业评论或方言区特有的娱乐文体的规范要求，则不妨宽松一些。像股评和马经上特有的标新立异和动感刺激的表达方式，明显受到香港同行文体的影响，常有蛊惑、误导的倾向，虽然为圈内人所耳熟，但对其中的消极因素却应有所警惕。

与会代表充分意识到，语用学在中国是刚刚起步的学科，“广东社会语用建设”也是刚刚开始进行的课题，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还在后头，因此，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热心人参与或投资、支持这项有益于语言环境的改善、有益于塑造良好的都市形象、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

（王 可）